



Education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

- 丛书英文版主编\弗兰克·帕金
- 丛书中文版主编\周殿富 韩冬雷
- 丛书中文版执行主编\曹海军

资本主义

——一项社会审视

[英]彼得·桑德斯 著
张 浩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Capitalism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高等教育最权威的社会科学教材之一
中国10余所最高学府知名学者联合推荐

策划编辑：崔文辉

责任编辑：崔文辉

装帧设计：陈 东

Capitalism

作者简介：彼得·桑德斯，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社会学教授，同时还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德国拥有访问教席。他是七部作品的作者，研究领域涉及政治社会学、城市社会学以及社会分层。在其最近的作品中，他探讨了英国政府私有化规划的社会后果。目前，桑德斯教授正致力于过去三十年间的社会流动模式研究。

ISBN 7-206-04588-X



9 787206 045882 >

ISBN 7-206-04588-X/D. 1398

定价：14.00元

资本主义 ——一项社会审视

[英]彼得·桑德斯 著
张 浩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主义:一项社会审视/(英)桑德斯著;张浩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

书名原文:Capitalism

ISBN 7-206-04588-X

I. 资… II. ①桑… ②张… III. 资本主义—发展史—西方国家 IV. D0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1875 号

Peter Saunders

Capitalism

(Original ISBN: 0-335-19141-X)

Copyright©Peter Saunders

Original language published by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jointly published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 Co. and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和美国麦格劳-希尔教育(亚洲)出版公司合作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封面贴有 McGraw-Hill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05-1367

资本主义

著者:彼得·桑德斯

译者:张浩

责任编辑:崔文辉

封面设计:陈东

责任校对:闫勇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网址:www.jlpph.com 电话:0431-537801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431-5395845

印刷:长春市永恒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6 字数:12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4588-X/D·1398

版次:2005年1月第1版

印次: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 000册

定价:14.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编委会名单

主 编：周殿富 韩冬雪

学术咨议(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俊人	马德普	马敬仁	孙晓春	李 强
任剑涛	应 奇	何怀宏	林尚立	姚大志
胡维革	贺照田	高 建	袁柏顺	徐湘林
夏可君	顾 肃	梁治平	曹德本	葛 荃
谭君久	薄贵利			

编 委：孙荣飞 朱海英 刘训练 彭 斌
叶兴艺 赵多方

第一期执行编委：孙荣飞 朱海英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

总序暨出版说明

自 19 世纪中后期西学东渐以来，在西方思想和相关书籍引入方面的成就可谓蔚为大观，但总的来说，大都强调系统理论的引进和评介。自 20 世纪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介绍和翻译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著作成为了“文化热”的先导，其中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以及《现代西方思想文库》等丛书曾经滋养和影响了数代学人的学术生命。

本套丛书立足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基本概念，虽名曰基本知识，却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学术普及，每本小册子的著者皆是该研究领域专业权威人士。以往这类书籍的引进通常表现为编纂学科史的教材形式，将知识的引介停留在教科书的层次上。故此，作为单纯的基本概念的追本探源式的梳理工作略显不足，这也就使得研究者对各家各派的观点难以获得系统的了解。而从可读性和理论的深入性上来说，本套丛书既适合于初次涉猎该领域的非专业人士、本科生，成为他们的领航性的参考文献，也能够满足于对此领域具有相当知识积累且有一定专深研究的研究者的专业化要求，因此能够将系统性理论的引入与基本概念的拓展齐头并进，可谓一举两得。

需要指出的是，该套丛书以社会科学自诩，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反映了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文化内涵和根本的价值取向，因此它并不具有自然科学本身拥有的客观性和普世性。毫无疑问，这套丛书是西方社会科学家以西方特有的文化视野和价值取向为基点，看待西方世界和社会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集中反映。对此，我们应该确立批判与扬弃、借鉴与建构并举的思想立场。毋庸置疑，在与西方世界的文化交流与相互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并吸收西方有益的社会科学文明的普遍性成果，借鉴和利用有益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理经验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分析框架。与此同时，我们也坚决反对食洋不化的崇洋心态和西化倾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观，在坚持学术自主性的“洋为中用”的前提下，实现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规范化、科学化。

编者

出版导言

当下关于资本主义的讨论已经日渐变为一个褪色的话题，虽然作为一个争执的对象，它已经盛行了一个多世纪。但是，这个话题又是如此威名赫扬，以至于忽略它又是不可想象的。

虽然，作为一部为特定概念下定义的作品，彼得·桑德斯的《资本主义》显得远远不够充分和完整，但是，如果把它看作观察西方一些正统自由主义者观点的窥镜，那还是非常值得一读的

通过这部著作，我们可以考查到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西方一些学者因为自由资本主义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优势状态，而所持有的一些简单乐观的观点，他们把人类现代技术社会的成就武断地归于资本主义名下，并对来自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外的理论批评横加指摘，甚至得出了一些关于资本主义未来不恰当的预见，非常明显，这些观点让人难以苟同。尤其是，作者在一些文字中，着力于反驳马克思主义关于

资本主义的理论表述，但是自己却割裂了经济制度和其他制度之间的关系，只从经济制度的运行状态去描述资本主义，甚至把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等列齐观，从而得出一些支离破碎的有偏见的结论，这显然是作者的观察角度的局限性所致。从作者的一些观点可以看出，他对于其他价值体系的理论路数并不了解，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认识和体会，所以其批评也显得苍白。而且，作者对于中国、苏联等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也持有偏见，把一些挫折和弯路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缺陷，这是武断和错误的。这些缺点在文章中是显而易见的。在此提醒读者注意，我们在阅读过程中，一定要坚持正确的价值判断，采取拿来主义态度，进行恰当的取舍。

编者

序 言

本书试图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引领我们的路向做一社会审视。

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资本主义的未来一直遭到严重质疑。今天的情形完全不同了，因为来自社会主义的挑战已经土崩瓦解。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做过尝试的地方，社会主义都遭遇了失败并被迅速抛弃。资本主义俨然成为一种真正全球性的现象。

因此，一部在今天讨论资本主义的作品，就需要展望和识别一些主要论题。在一个奠基于柏林墙的碎石之上的世界里，这些论题或将引起我们的极大兴趣。这些论题将无涉资本主义能否生存——它能够、而且几乎肯定将存在下去，而与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扩张的意义相关。

我认为，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引发了三个主要问题，这三个问题在不同指向上都关涉现代资本主义作为经济“增长机器”的本质。第一个问题是，贫穷国家，包括非洲撒

资本主义

哈拉地区、中南美洲、南亚、中国以及东南欧洲等，能否有希望赶上北美、西欧和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还能够像它已经为 20% 的富裕人们所做的那样，根本改善世界其余 80% 的人口的生活水平吗？如果能，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的地球能否支撑如此大规模的工业产出扩张？正因为资本主义在控制自然增加产出方面是如此成功，它似乎威胁到地球上脆弱的生态平衡。西方国家里绿色观念的日益增长的力量，也正反映了我们也许正在逼近无可避免的环境灾难的悬崖。最后，还有一个最大和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即使和当资本主义已经使得全世界的人们脱离贫穷和悲惨的境地，而且已经成功地解决生态灭绝危机，仍然会遗留一个争议，那就是人类能否比以往生活得更好。资本主义所引发的迅速增长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会因此而更加幸福吗？

这三个问题在本书三个核心章节里予以讨论。第二章考虑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第三章关注环境生存问题；第四章涉及资本主义是否最终与人类幸福所需条件根本一致。此前，我（在第一章里）概述了资本主义何以能够如此成功地促进了技术革新和经济增长，以及这一社会和经济组织的革命性体制是如何首先形成的。本书最后（在第五章）简要讨论了，在一个作为替代选择的社会主义已经衰落、新的分裂和挑战正在出现的世界上，资本主义的未来将会如何。

本书得益于朋友和同事对各章节草稿的批评性评论，我要特别对大卫·哈里森（David Harrison）、朱莉·科奇（Julie Koch）和卢克·马特尔（Luke Martell）的有益建议和意见表示感谢。

序 言

由于他们三人对本书的许多观点抱持怀疑和保留态度，我当补充声明本书的最终责任由我个人承担。

编辑启事

从我们角度看，出版业的目的可以简约为一句话：让更多的人分享有价值的思想。所以，我们不仅坚持一贯的主推严肃学术作品的出版宗旨，而且，在将来的岁月里，更会奉此为主臬，倾力推介品质优良的学术著作，以促动中国的学术繁荣和人文复兴。

不过，由于我们的学养和视野的局限，常常会犯遗珠于外、奉蔽为珍的错误，以致贻笑大方。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获得知识界的援手，也企盼得到真知灼见者的棒喝。如果各位读友有具价值的学术作品的选题，或者建议（当然更欢迎直言不讳的批评），甚至只是一些闪光的想法，请不要吝惜，提供出来与我们一起共享，（一经我们采用，提出者将获得我们赠送的数量不等的学术图书，书目见附录）一齐推动中国的学术出版事业的进步。

同时，我们经常接到一些读友的反映，说有些书难以买到。所以，我们开通了学术图书的直销渠道，各位读友可以任意购买附录中开列的图书。购买方法是：通过我们直销通道，请读友将需要的图书书目告诉我们，我们会立即回复告知是否有存余。如果有存余，请购买者将书款汇给我们并告知邮寄地址，我们接到书款后，立即安排邮寄和开具收据发票。凡购买我们图书者，均免除邮寄费用。一次性购买图书金额在 40 元人民币以上者（含 40 元），将享受 75 折优惠，同时免除邮寄费用。

建议通道:

联系人: 崔文辉

电话: 0431 - 5378029

e-mail: cui1209@sina.com

通信地址: 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吉林人民出版社
学术著作出版公司

邮编: 130022

直销通道:

联系人: 崔凯

电话: 0431 - 5378030

e-mail: cuikai1502@163.com

通信(汇款)地址: 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吉林人民
出版社学术著作出版公司

邮编: 130022

吉林人民出版社学术著作出版公司全体同仁 敬启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增长机器 1

第二章 资本主义与贫穷国家 40

第三章 资本主义与环境 73

第四章 资本主义与人类幸福 110

第五章 资本主义的未来 145

译者后记 171

第一章 增长机器

1851年，全世界受邀参加英国政府举办的旨在展出工业产品和机器的“万国工业博览会”，展厅设在伦敦海德公园一座专门建造的由钢材和玻璃构成的“宫殿”内。水晶宫博览会是一个新的工业时代的庆典，是英国毋庸置疑的首要工业国地位的庆典。但它还可以被视为一个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理想的进步、启蒙和现代性的庆典，借助于机器征服自然的庆典，欧洲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胜利庆典。非凡的宫殿为机器和商品而非侍臣和镀金装饰而造，这一事实生动地象征了基于上帝和国王的权力的旧时代向基于蒸气机械和企业家的权力的新时代的转变。^① 水晶宫博览会是庆祝一个新的社会经济体系的出现的第一场重要聚会，这一体系注定要根本改变地球生物的生活——这一体系，我们今天称之为资本主义。

^① 参见 E. Hobsbawm, *The Age of Revolution* (London: Weidenfeld&Nicolson, 1962), p. 52。

资本主义

据《牛津英语词典》的追溯，“资本主义”一词首次被使用是在威廉·M. 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54 年的作品中，这是在万国工业博览会三年之后、资本主义最著名的批评家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开始使用此一术语至少 15 年之前。^① 但是资本主义并非始于 19 世纪中期，它要早于工业革命。因为早在工厂主出现以前很久就先有了商业资本家，广泛采用的工资劳动也比工业劳动力的出现早得多。

现代资本主义植根于贸易，植根于欧洲历史的深厚土壤。早在 11 世纪，诺曼人（Norman）、撒拉逊人（Saracen）和马扎尔人（Magyar）入侵欧洲的浪潮让位于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商人们已经开始开辟商业贸易路线，开拓新的疆域，并通过汇票的使用初步创造出一种国际货币和借贷体系。^② 贸易的扩展最终导致低地国家和意大利城市——比如佛罗伦萨（Florence）——中新的商业和制造业中心的成长。

到了 16 世纪，当欧洲国家开始向西进入美洲、向东进入东方以扩大其贸易和疆域的时候，商业资本主义在北欧得到很好的发展。到那时，一些城市，诸如安特卫普（Antwerp）和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已经成为主要的商业贸易中心，南

① 这一点分别被 E. Hobsbawm 和 T. Bottomore 提到，参见 E. Hobsbawm, *The Age of Capital* (London: Weidenfeld&Nicolson, 1975), T. Bottomore, *Theories of Modern Capitalism* (London: George Allen&Unwin, 1985)。

② M. Mann, 'European Development: Approaching a Historical Explanation' in J. Baechler, J. Hall and M. Mann (eds), *Europ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8)。

美的金银、波罗的海沿岸的木材、远东的香料和英格兰的纺织品，都在这里交易。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已经开始向工业和农业渗透。

在中世纪，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工业和农业都是围绕封建原则组织起来的。领主生活在大庄园里，农奴被迫为其劳作；各行业的学徒和熟练工则受制于城镇中的行会师傅。早在 13 世纪，在英国和荷兰，这一制度开始瓦解^①。到了 16 世纪，一些地方已经明显地被基于货币薪酬的生产体系所取代。贸易的扩展极大地侵蚀了封建主义，因为它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扩散一种货币交易体系，逐渐以现金支付取代了封建义务，形成了一个土地和借贷市场。城镇工匠和农村佃农日益为商人工作，商人将原材料提供给他们，并在市场上出售他们完成的产品，而市场远远超越了当地区域。当欧洲一些地方的领主和王子们设法将其权力和社会地位很好地保持到 18 世纪乃至 19 世纪时，他们所代表的体系却早已被从经济上侵蚀殆尽了。

到了万国博览会的时代，资本主义已经彻底革新了西欧的生产体系，且已处在发展成为一种全球性体系的进程中。在 19 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在英国巩固了其根基，并开始征服整个世界。

在 20 世纪即将结束的今天，我们见证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最后胜利。无论是以前时代的国王和王子，还是我们自己

^① 参见 M. Dobb,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2nd edn (London: Routledge&Kegan Paul, 1963)。

资本主义

时代的委员和代表，都发现了政治权力在抵制这一世所仅见的最为强有力的经济体系所释放出的变革力量时的无效。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数个世纪，而一旦建立起来，它就将以前的一切一扫而光。

那么，这一征服了整个世界的体系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资本主义体系如何运作？它怎样促成了空前规模的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这一令人敬畏的体系又是如何从欧洲一个狭小角落偶然地发展起来？

私有产权、利润和市场

斯堪的纳维亚的资本主义与香港的不同，德国的与美国的相异，19世纪英国的与21世纪泰国的迥异。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时代，资本主义有着不同形式。但是，识别出一些特定的关键要素，借以综合起来定义这一独特的体系，却也是可能的。在据以界定所有资本主义体系所共同具备的基本特征时，有三个要素是最为根本的。

第一个要素是财产的私人占有，包括土地、植物、原材料等资源，用以生产人们需要的物品和劳务。财产的私人占有要求三项可强施于他人的至关紧要的权利：对财产的排他性的控制和使用权，对财产开发利用所得的排他性的收益权，以及对财产的任意处置权。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产权在多大程度上是归属个人还是归属组织。例如，在前苏联，诸如土地、

房屋、机械等资源的所有权主要归于公共政府，私人没有排他性的控制权，无法区分哪些份额属于自己哪些份额属于他人。对于名义上拥有的财产，私人也缺乏有效的处置权，无法将其出售、交换以获益或者遗赠他人。当一个国家从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时，首要的一步往往必然是私有产权的再造。比如，从1991年以来，俄罗斯政府推行私有化，将国家财产按份额分配给国民，许其自愿持有或转售。不到三年时间，私有部门已经占据全部经济的一半。中国的情况亦类似——在那里，从197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开始在几个经济特区（一定程度上包括其外围）发展起来——一个官方股票交易市场已经被当局建立，以使人们能够从企业购买自己的份额，从中得益和自由转售。^①

当然，绝大多数资本主义社会中都有社会主义产权因素。西方国家的政府常常拥有并经营着主要工业，包括诸如汽油、用水等公用事业，乃至轿车制造，比如法国的雷诺汽车（Renault），尽管近年来兴起了一场世界范围的将这些公共财产私有化的浪潮。^② 政府还经常建造并管理房屋，并向其国民提供

① 同时，一个非官方股票交易市场也以近乎公开的形式兴盛起来，并得到中央政府的容忍，尽管没被予以批准。再加上朝向货币可自由兑换的改革，以及废除工业审批、降低一系列进口物品的关税、取消多种工业品价格控制，官方股票交易市场的创立标志着从社会主义指令经济向资本主义体制的根本改变，虽然个人所享有的自由仍然很少。参见 Ding - Xin Zhao 与 J. Hall, 'State Power and Patterns of Late Development', *Sociology*, vol. 28, 1994, p. 220。

② 参见 P. Saunders 与 C. Harris, *Privatization and Popular Capitalis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4)。

资本主义

其他资源，比如保险劳务和学校。也许世上根本就不存在基于完全的私人产权的“纯粹”资本主义，毋宁说，不同社会处在一条连续线上，在这条线的一端，财产绝大多数属私人占有，在另一端，财产则主要归属国家。因此，资本主义并不排除国家的角色，但它的确尽量限制政治的作用。^①

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个体对自己身体的拥有权。不同于奴隶制度（个体可以隶属于他人）、封建制度（个体基于终身义务而被束缚于他人）和社会主义制度（劳动可被公共当局支配，通常缺乏就报酬讨价还价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体拥有自己的身体，他人只有通过自愿契约才能获得对其的使用权。当然，正如马克思所争辩的，一无所有的个体也许除了选取每天某一特定时段将自身的脑力或体力出卖给雇佣者，此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② 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拥有决定选择哪位雇佣者以及就雇佣的期限和条件进行谈判的自由。所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使用过程是基于合约，而不是强制、习惯或者义务。强制劳动（例如 19 世纪英国殖民地中的契约劳动制，或者今天很多国家中的被强迫征募“兵役”）亦的确存在于资本主义中，但它并非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使用的独有特征。

资本主义的第二个主要特征，经济活动围绕对利润的自利

① A. Seldon, *Capitalism* (Oxford: Black Blackwell, 1990), p. 10.

② 当然，在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福利国家的存在意味着工作的必要性要比马克思的时代低——参见第五章。

性的持续追逐组织起来。这正是私有产权对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具有根本的重要性的原因，因为只有当财产权利和利用财产获益的权利归属于个人，“利润”动机才能发挥其作为经济活动主要动力的作用。正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认识到的，资本主义是一个激发个体自利动机以作为创造财富的机制的体系。^①

对利润的追逐本身并非资本主义的独有现象。自从私有财产出现以来，人们就开始通过强制、手艺或者欺诈等各种手段以增加其个人财富。^② 商人、海盗、冒险家和暴君对财富的追逐充斥了自有记录以来的整个历史；即使在社会主义政权下，那些负责管理国家资源的人也在竭尽所能（而且往往成功地）利用其位置攫取私利。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其独特之处则在于，日常经济活动是由对不断变更的利润的有体系的持续追求构成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体生产物品和劳务，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即时消费，亦非对奴隶主或者经济计划者制定的受政治支配的目标的响应，而是出于获取利润的希望和预期。

这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生产通常并非目的，而仅是达致目的的一个手段。哪里有一个能够获取利润的合理预

① “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多了。”（A.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Harmondsworth: Pelican, 1970), p. 118).

② “对金钱的贪婪并非为现代所专有”（Dobb,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p. 8).

资本主义

期，物品和劳务就被生产出来；在不存在这种预期的地方，情况则否。因此，资本主义可能会生产出我们很多人认为是不必要乃至有害的物品和劳务——它既生产海洛因又生产阿司匹林，既生产色情文学又生产艺术，既生产无品味的琐物和华而不实的小说，又生产拖拉机、计算机和透析器。这还意味着，资本主义可能并不生产在我们很多人看来是必需的东西。它不会为赚不到生活费的人生产食品，不会为付不起学费的人提供学校，不会为掏不起租金的人建造房屋。马克思正确地指出，资本主义所关心的，不是需要而是利润，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

生产相对于利润积累的从属地位，意味着资本主义很大程度上具有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称的“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① 的特征。在韦伯看来，这一理性精神的典型，是复式簿记（double-entry bookkeeping）制度，一种能够记下每一宗支出并使其与每一收入来源相等的会计制度。但是专门的会计实践并非这种谨慎的和系统的计算的仅有例子。新的产品市场被专门的研究机构详尽加以分析，然后小心地通过广告推广开来。零售被通过计算机化的超市结账方式予以监控，可以探测到消费者消费模式的最细微变化。劳动过程被通过对工时与动作的研究予以效率分析，并遵循最新的人事管理理论予以设置。劳动力的征募委派专门机构执行，并遵照技能资格、履历、能力倾向测验和秘密推荐的正式标准。从头到尾，生产

^① M. Weber, *Economy and Markets* (New York: Bedminster Press, 1968).

的整个过程都要经过理性计算，以便于从投入的购买到终成品的出售的每一个阶段都尽可能地可预测和有效率。

现代法团资本主义，更注重于将收益率提高到极致，而不是孜孜于突然发一大笔横财。当然，短期投机买卖、高风险的赌博和机会主义诈骗也出现于资本主义体系中，而且，我们将在第五章里看到，美国资本主义越来越多地受到团体袭击者（corporate raiders，伙同起来联合股权争夺企业控制权的人——译注）和资产剥除者（asset - strippers，低价收买财政困难的公司的人——译注）的干扰。但是，只有资本主义企业存有盈余，这种行为才能涌现，正如要有大量的其它动物尸体，兀鹰才能迅速繁衍一样。而且这种行为易于招致（借用一位前英国保守党首相的话）“不受欢迎的脸面”（unacceptable face）的骂名。资本主义的确必须承受风险，但是它并不总是不计后果。它不可避免地受到短期利益算计的影响，但是，由于人们关注利润积累，以便于企业家调集更多资源以扩大生产，投机算计的影响一定程度上被冲淡。现代资本主义的主旋律，是三个人才的寓言（parable of the three talents）^①，而非浪子的故事（story

①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25章，载有“一主三仆”的故事：主人远游，给三个仆人一笔银子谋生。三年后主人归，甲仆说用主人给的银子经商赚了二倍，乙仆说用这些钱放利赚了一倍，丙仆说为防丢失将银子埋进了地里。主人对甲、乙奖银，对丙则收回了原来给的银子。这就是“多的，再加给它，使之更多；没有的，连它仅有的也夺过去，使它更少的“马太效应”的含义。——译注

资本主义

of the prodigal son)^①。

资本主义的第三个关键要素，是物品和劳务按照市场价格进行交换。现代资本主义是一套货币体系，所以物品和劳务的价值都可以以一般等价物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一个资本主义体系里，物品可以通过实物进行交换，但大多数交易都是通过货币而不是通过其他物品进行的。正是借助于这一货币体系（起初是以贵重金属的形式，然后是以硬币和纸币的形式，接下来是以账簿条目和电子借贷转账的形式），资本主义才得以超越私人区域的局限，物品和劳务的交易范围得到扩展。因为货币的使用可以使得某种（些）物品的生产者专注于生产，而不必先去找找到一个需要这种（些）物品的消费者，并且能够确知对方手中拥有自己所需的可资交换的物品。换句话说，货币允许生产者与其产品的最终消费者分离开来，这就极大地拓展了市场范围。今天的市场里，每时每刻都会有数以百万计的交易产生，这在简单实物交换经济中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在一个（相对）自由市场里，原材料和制成品通过货币买进或卖出。但是，正如财产极少完全归私人所有，市场也极少

① 圣经故事，路加福音 15（11—24）：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把你的家产分给我。”父亲就把家产分给他，他拿到钱就往远方去了。在那里整天花天酒地，钱很快挥霍光了。这时，那地有大饥荒，他陷入了困境，只好替人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吃的豆荚充饥，但没人给他。他醒悟了，我为什么在这里等死呢？我要回去找父亲，对他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不配作你的儿子。”于是起来回家去。父亲老远看见他归来，激动地跑过去，搂住儿子，亲他，并吩咐仆人：“快给他换上最好的衣服，戴上戒指，穿上鞋，把最肥的牛犊宰了，大家欢宴庆祝，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译注

是完全自由的。因为大多数政府都对生产的安全和需要等进行管制，很多政府对境外进入的物品征收关税以及（对国民）源源不断地课以税收，有些政府则屡次试图控制物价。尽管如此，资本主义的关键特征之一在于，市场交易的价格原则上由供给和有效需求的平衡点所决定。不仅物品的交易如此，包括资本和劳动在内的其他“生产要素”的交易亦是如此。货币和劳动力都有一个价格，分别以利息和工资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里，二者同样取决于供需状况。

当然，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者来说，自由市场是不确定性的一个来源。因为他们永远都无法确定是否有足够的购买者愿意并且有能力以某一能令他们获利的价格购买他们的产品。为了减少这种不可预测性，所有办法都被尝试过了，其中有些是合法的（例如，将原材料和通货以某一固定价格预先在未来市场上买卖），另有一些则是非法的（工业间谍、贿赂和卡特尔都是企业如何尽力增加其运作环境的可预测性的例子）。但是，只要存在竞争和保持相对开放，市场就永远无法被完全预测——在每年投放于美国市场的新产品中，80%以上都是失败的。^① 资本主义天生倾向于在过剩（由过度生产引起，企业受市场利好信号刺激而过度投资）和短缺（企业因货品积压和市价下跌而削减投资所致）之间摇摆。

所有这些都与非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生产与交易体系相异。我们已经知道，在封建时代的欧洲，土地市场实际上并不存

^① C. Lindblom, *Politics and Market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Chapter 16.

资本主义

在，因为土地不能被转让；只有非常有限的劳动力市场，因为劳动力被束缚于土地庄园或者城镇行会。即便工资劳动体系开始出现，不同类型工人的最高最低工资亦往往被立法限定。物品交易亦被严格管制，哪些物品可以买卖，被谁买卖，以什么价格，乃至货物如何运输、收入在何处消费，都被政府、王子和行会头目们予以规定。类似地，对高利贷的政治和宗教禁令牢牢限定和管制了货币信贷市场。

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与社会主义体系也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社会主义体系中，生产和交易被一个中央政府计划的复杂系统控制，资本和劳动的进出都被严厉限制。以一套国家经济计划体系替代市场机制，第一个理由是允许政府调配资源进行所需要的生产，从而避免浪费、有害或者无意义的投资（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意味着投资被极度集中于发展工业和制造业，消费物品被弃之不顾）；第二个理由是，围绕一个一致的中长期目标将经济的不同部分予以协调，理论上可以避免资本主义体系中生产过剩和生产不足的周期性危机。换句话说，通过将生产与固定和可预测的目标而不是上下浮动的市场价格相连接，社会主义计划企图克服“市场混乱”状态。

我们现在知道，这套理论在实践中无法有效实施。主要原因在于，撇开了市场价格，根本无法对一个复杂的现代经济的所有不同部分进行协调。^① 米塞斯（Mises）、哈耶克（Hayek）

^① Lindblom 在他的题为 “The human condition is small brain, big problems” (ibid., p. 66).

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几乎在苏联试验之初就指出，资本主义市场体系首先和最主要的是一种信息体系。^①一旦某一工业部门出现短缺，或者消费者改变其偏好，或者新技术使得现存制造方法显得陈旧，所有这些均会迅即反映在变动的价格上，相应地，所有其他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即时调整自己的行为。而在一个中央计划经济中，缺乏传送信息的同等机制。离开了价格信号，生产者缺乏有效方法适时参照其他相关生产者的行为以调整自己行为，消费者也无法将自己变动的偏好及时有效地传送到相关生产者那里去。在这样的体系中，数以百万计的个体活动的协调实际上成为不可能，苏联和中国经济的出名的短缺和缺乏效率是无可避免的结果。^②

资本主义的定义

以上三个要素——私人产权、为利润而生产以及基于市场价格的交易体系——的结合就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工作定义，并将之与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其他制度区分开来。更为明确地，我们可以将资本主义定义为如下一种体系：个体或团体通

① 参见 L. von Mises, "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in F. von Hayek (ed),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London: Routledge, 1935); F. von Hayek, 'Socialist Calculation' in Hayek,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② Lindblom 在其作品 (*Politics and Markets*) 引用中国的例子：由于对运输需求的错估，计划目标无法得以完成；由于对水泥和木材的生产限额，一个首都工程项目无法达到合适的均衡。

资本主义

通过对土地、劳动和资本的购买使用，生产出物品或劳务，并按照能够获取利润的价格在市场上出售，以竞相积累财富。

增长机器

资本主义为累积利润的动机所驱使。在一个实行产权私有和市场相对开放的体系中，对利润的追逐促使企业相互展开竞争。每一家都力图降低土地、劳动和资本的投入成本，力图以所能获得的最高价格出售产品，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这种对利润的竞相追逐意味着资本主义企业一直都在寻求新市场，推出新产品，开发能够降低生产成本的新技术。每家企业都在力图获取竞争优势，正是这一点为资本主义变革和创新提供了推动力。

资本主义是一部增长机器。对新市场的寻找驱使它不断向外扩张，从城镇到乡村，从英格兰到欧洲和美国，从 19 世纪帝国的中心到 20 世纪“第三世界”的前殖民地边陲，从西方国家到东方的前共产主义国家。贸易的扩展导致了交通和通讯的革命，而交通和通讯革命始而建立起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凝聚力，继之则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19 世纪的蒸汽动力缩短了海洋，并铺设了横越洛矶山脉（Rockies）、翻越安第斯山脉（Andes）、穿越印度次大陆（the Indian sub-continent）的铁路。资本主义征服了距离和空间，将世界联结成为一个统一的（然而却有些不稳定的且往往是危险的）全球体系。

资本主义引发了工业革命，此后，对新产品和新技术——

借以提高生产力和降低成本——的愈益增多的和迫切的研究，持续不断地变革着我们的生活方式。资本主义企业为赢得竞争优势而从事于此一永久性研究，这意味着变革的速度一直都在加快。在短短一百年中，我们已经见证了机动轿车的发明，家电的供应，电视及其他耐用消费品诸如洗衣机、电冰箱等的发明，航空的发展，核能的开发利用，卫星通讯的建立，太空旅行的起步以及个人电脑的发明。今天，我们正处在生物工艺学和遗传工程学革命的边缘。回想五百年前，水车还只是人类所仅知的惟一动力机械，我们不由得不惊叹发展的速度之快。

资本主义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这一水平已为今天的普通人所想当然地接受。在英国，国民总收入在1688—1801年间翻了两番，实现第二个翻两番是在1801—1871年间，实现第三个翻两番则是在1871—1924年间。1871—1989年间，人均产出增长了5倍。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稍后开始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国家。1870年代以来，美国的人均产出增长了9倍，德国增长了11倍，日本更是增长了25倍。^① 国家收入和产出的增加导致了生活水平的极大改善。过去的四百年里，英国的实际工资（即允许浮动的工资购买力）增长超过1600%。粗略来讲，这意味着今天英国人的经济状况要比他们生活于莎士比亚时代的祖先好上16倍。在美国，1800—1990年间的平均收入购买力增长了30倍。

^① S. Bowles 与 R. Edwards, *Understanding Capitalism*, 2nd edn.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3).

资本主义

令这些成就更显辉煌骄人的是如下一个事实：在平均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人口规模成倍地增加了。不仅我们每个人的状况都比两个世纪前改善了许多，而且有如此多的人们分享到了这份繁荣。180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是890万；此后50年翻一番，达到1790万；至1911年再次翻番，达到3600万。进入20世纪，英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增长率有所下降；而且根据当前的人口低增长率，西欧许多国家的人口总数在21世纪有可能减少。但是在西欧人口保持稳定的同时，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口却呈螺旋式上升，因为资本主义在那些地方的传播引发了更大规模的人口膨胀。

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前，世界人口以年仅0.56‰的速度缓慢增长。按照这一速度，世界总人口翻一番用了1200年时间。但是，自1750年以后的两百年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5.7‰——据此，世界总人口每120年翻一番。1950年以来，年平均增长率更达到17.1‰，世界总人口将每40年翻一番。^① 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各种事物中，其中之一是为人类生命提供了范围广阔的可能性；而且一如受它（资本主义）影响的其他一切方面，它在这样做（指拓展人类生命可能性——译注）的时候，速率日益加快。

对此的解释存在于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扩大的生产能力。增加的产出——包括食品生产技术的引人注目的进展——为更大

^① S. Bowles 与 R. Edwards, *Understanding Capitalism*, 2nd edn.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3).

人们提供了生存所需，资本主义财富所带来的卫生、住房、医药及其他服务设施的改善，意味着今天出生的人们的长大成人以及活得更长久的几率大大增加。在英国，婴儿死亡率（即每千名小于周岁的新生儿的死亡数）在工业革命的早期有轻微增长，至 1846—1847 年达到 164‰ 的最高值，此后回落到 1912 年的 95‰、1951 年的 30‰ 和 1980 年的 12‰。与此相联系，人们的平均预期寿命从 1721 年的仅仅 33 岁，增加到 1871 年的 41 岁，再到今天的大约 70 岁；年死亡率也从 1721 年的 31.4‰，降至 1871 年的 21.9‰，再降至今天的 12‰。^①

贫困化的迷思

不断增加的产出，不断增长的实际工资，不断提高的生活标准，不断延长的预期寿命，从所有这些既有的迹象，就很难理解，为何如此之多的历史叙述倾向于认为，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纯粹是一场灾难。这一信条似乎有两个来源。其一是马克思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如下观点：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的状况变得愈来愈糟（所谓的“贫困化命题”）。另一个则源于英语文学和戏剧中的乡村浪漫主义的强大传统。迥异于城市无产阶级的悲惨状况和工业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前资本主义被想象为一个“黄金时代”，在那里，

^① B. Mitchell 与 H. Jones, *Second Abstract of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资本主义

朴素的农民家庭与自然和谐相处，紧密结合于一个小规模的富有同情心的共同体中，过着一种贫穷然而幸福的生活。从马克思那里我们得知，劳工人口逐渐被资本主义压榨成赤贫；从乡村浪漫主义那里我们得知，在有序而文雅的以往乡村社会里，一切都是如此美好。

所有这些都不足以遮蔽前面提到的迹象。无疑，工业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显然给很多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困难和破坏。工人们为贫穷和乡村圈地运动所逼，被迫离开土地，涌入迅速膨胀的城市，挤进狭促而缺乏卫生设施的工作环境。但是，那些留在乡村不走的，其环境条件往往并不比进入城市的好到哪里去。^① 17 世纪的英格兰，乡村劳动人口居住在简易村舍里，耕种一小片土地，土里刨食，在公地里养头猪或牛，在一个当地庄园里为工资而劳作；也许为一个当地商人纺点毛线，借以凑合过活。他们的生计严重主要依赖于季节性劳动的有效性，依赖于每一个家庭成员在每一天的长时间辛苦劳作。孩子的出生往往导致家庭陷入赤贫境地，因为在添了张口嗷嗷待哺的同时，女主人却无法参与劳作了。据估计，在这一时期，英格兰的一半人口断断续续生活于危及生存的贫困之中。长到 10 岁大的时候，孩子就得离开家里去当家庭佣工，在那里一直干到结婚，然后搬入一间村舍，开始新的生活循环。彼得·拉斯勒特（Peter Laslett）指出，经济压迫和剥削是工业资本主义之前时期乡村生活的典型特征。

^① P. Laslett, *the World We Have Lost Further Explored* (London: Methuen, 1983).

工业革命曾一度使情况变坏，这是可能的；但自 1820 年代以来，英国工人的物质条件和福利便一直在尽管缓慢但不可逆转地改善和提高，这更是无疑的。^① 鉴于我们满脑子都是关于工业革命引致了悲惨景况的想象，注意到如下一个事实是耐人寻味的：甚至连马克思的合作者，弗雷德里希·恩格斯，在其 1848 年关于英国工人阶级贫困状况的评论性作品中都指出，最糟糕的情形发生在乡村（而不是在城市）。^② 乡村世外桃源的流逝只是一个神话。

至于马克思的贫困化命题，资本主义的确制造并长久维持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巨大的经济不平等，但它同样地提升了富人和穷人的生活水平。对于经济增长的利益扩散理论（‘trickle-down’ theories of economic growth）的所有学术批评，如下一点是很清楚的：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巨大财富已经令所有社会阶级受益；在上一代尚只归属极少数人享用的奢侈品很快就成为下一代中绝大多数人均具的标准件。无论是中央供暖房屋的占用、轿车及其他耐用消费品的拥有、国外假期的享受，还是健康保险的提供，模式总是一样的，因为资本主义只有依靠大众市场才能兴旺繁荣，而仅仅仰赖于富人需求则无从存活。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以一个隐喻抓住了这一过程的实质。他指出，资本主义就像一纵队人们沿一条直线

① F. von Hayek,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Hayek, *Capitalism and the Historian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4).

② F. Engels,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St Albans: Panther, 1969).

资本主义

途经一连串固定点。^① 走在前面的率先到达某一个点，但整个队伍持续向前，过不了多长时间，走在后面的就能赶到先行者先期经过的那个点。

资本主义不仅提高了穷人和富人的生活标准，而且改变了我们的“贫穷”（什么样的状况才算是贫穷？）概念。希伯海姆·朗特里（Seeborn Rowntree）于（19 与 20）世纪之交在英国约克郡进行了一项著名的研究。在这项研究中，他绘制了一条贫困线，那些无力支付为维持生存和健康所必需的食品、衣物和燃料等基本物资的家庭即处于贫困线以下。1979 年，彼得·汤森（Peter Townsend）发表了一份英国贫困调查，^② 绘制了另一条贫困线。依据他的标准，倘若一个家庭不能充分享有某种类型的生活，这种生活包括：远离家庭的度假，举办家庭宴会，拥有电冰箱以及独自使用的设施诸如室内盥洗室和浴室或淋浴间，等等，即属贫困家庭。我们今天称之为“贫困”的，在仅仅几代人之前却代表着“富足”，资本主义对整个社会的生活标准的影响由此可见。实际上，据估计，今天在美国处于正式贫困线上的人们，享有的购买力两倍于世纪之交人们的平均收入。^③

资本主义增长的一个更为深远的特征是，它为个体改善其

① F. von 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0).

② P. Townsend, *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9).

③ C. Murray, in *Pursuit of Happiness and Good Governmen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8).

处境增添了机会。资本主义企业的主要目的是获取利润，为此，相比于生来就居于特殊社会阶层者，理性的雇主更愿意征募和提拔人群中的最能干者。资本主义倾向于精英统治，而且，正如我们在第四章将看到的，社会学家所称的“社会流动”在今天远比在过去频繁常见。社会流动性是和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17世纪的乡村佃农缺乏现实机会以逃脱其较低的地位，也看不到其子女能够生活得更好的希望。这是一种相对封闭的社会秩序，其中的半数人们被视作毫无价值。资本主义重视个人才干，尊重人的个性，这是前资本主义秩序中所从来没有的。

大众的贫困化是关于资本主义历史的一个神话，乡村“黄金时代”的世外桃源遭受破坏是另一个。也许可以从其他各个方面对资本主义提出批评，但是，对于它损害了很多普通人的指控却无法令人轻易接受。

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条件

在其《经济通史》^①一书中，马克斯·韦伯考虑并排除了一系列因素，这些因素被历史学家提出来用以解释资本主义在其出现之时何以首先落脚于西欧。黑死病之后数个世纪里的人口增长，似乎（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物品市场和提供了

^① M. Weber,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81).

资本主义

大量劳动力；但是，中国的人口在 1700—1900 年间以与西方相同的速度增长，然而那里的资本主义却在“倒退”。南美贵重金属的流入也并非一个充分的理由，因为虽然这些贵重金属的流入引发了 16 世纪欧洲的物价上涨，有助于刺激经济活动；但它们最初是流向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在那里被浪费于军事冒险和生活炫耀，而不是被用于投资。欧洲资本主义首先并不是在伊比利亚半岛，而是在英国、低地国家和意大利城邦发展起来的。韦伯承认，地理因素也许扮演了有意义的角色，因为地中海和星罗棋布的内陆河使得欧洲的交易和通讯较之印度和中国等地便利得多。但是他指出，这却无法解释佛罗伦萨等一些城市中的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他推断说：

最后，资本主义的产生因素可求诸于理性的永久企业、理性的会计账目、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是，单单这些仍然不够，必要的补充因素是理性的精神、通常生活的理性化，以及理性主义的经济伦理。^①

韦伯关于清教中“理性经济伦理”的起源的分析已广为人知。^② 简要地讲，他认为，印度教、佛教和（基督教内的）罗

① M. Weber,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81). p. 354.

② M.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Unwin, 1930).

马天主教等宗教倾向于保留传统而不是挑战传统，因为这些信仰的皈依者被鼓励在来世而不是在现世寻求拯救，被鼓励虔诚接受其现世命运而不是设法改变自身处境。

比较而言，清教，尤其加尔文派，基于三点原因而具有革命性。首先，强调现世实际职业的重要，改变了遁身修道院沉思默祷的天主教伦理。它因此在其信徒中形成一种有效的义务观：努力工作，改造自然，以增添上帝的荣耀；它并将僧侣式自律从修道院的斗室里带入普通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第二，它的禁欲主义排除了肆意挥霍，促使个人投身劳动所获的财富得以再投资于进一步的生产循环，而避免浪费在奢华和卖弄炫耀上。第三，预定论的学说排除了为了个人得救而企图窥探和影响上帝旨意（例如通过神父向忏悔）的可能性，这一举动在加尔文看来是无礼的和亵渎神灵的。这一最为紧要的问题（指个人得救——译者注）的不确定，导致（在信徒心中）产生一种孤独和焦虑感。依照韦伯的说法，这种不确定促使清教徒转而向外寻求自己被上帝选中的迹象，而所能找到的最清楚的迹象，是世间的财富。

三个因素结合起来，就产生出一种伦理文化，高度亲和于现代资本主义企业所倚赖的形式理性精神。如我们先前所知道的，在一个资本主义体系中，生产自身并非目的，而只是达到目的——在一个重复循环中积聚利润——的一个手段。对于身处前资本主义世界的许多人们来说，这一体系看起来是不言而喻的荒谬可笑。既然已经创造出充裕的资源可资生活所需，为什么还要继续工作呢？而新教为这一活动赋予了意义。

资本主义

今天，经济活动的这些宗教支撑已经消失了。就像我们的加尔文时代以前的先人一样，处于已经确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我们中的许多人，被一种韦伯称之为“实质非理性”的财富积聚所驱迫。如果所做的一切仅仅是为了持续不断地增加收益，进行一项生意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终其一生地辛苦劳作，仅仅是为了换取所谓的更大成功，那么投身于一项事业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如果你已经挣足了钱或者成功获得了一个职位，又何苦每天逼着自己一大早爬起来，只是为了去赚到更多的钱，或者只是为了寻求更高的职位以在头顶增添一个花环？

对于早期的清教徒，这样的活动具有深远的意义和特殊的重要性。他们的宗教伦理督迫他们形成一种劳作、积累和自我改进的生活方式，而这些正是资本主义的兴盛所需要的。今天，这种宗教动机已经几乎完全消失；我们丢掉了精神的内核但继承了行为的外壳。因此，我们每天继续有条不紊地从事劳作，以便挣得下一美元。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见第五章）？面对如此迫切需要回答的追问，人们置若罔闻，无动于衷。人们被锁入一个已经对其失去实际意义的牢笼，对于韦伯来说，这是现代的一个深刻的悲剧。

韦伯对清教伦理在形成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中的作用的分析，已经为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详尽讨论。^① 有人争论说，

^① 例如，参见 R. Green (ed.) 的文章，*Protestantism and Capitalism: the Weber Thesis and its Critics* (Boston: D. C. Heath, 1965)；又见 G. Marshall, *In Search of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Hutchinson, 1982)。

清教与资本主义的关联关系（实际上）与韦伯的处理相反。并非加尔文教派促成了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出现，而是资本主义企业家为了给自己已经在做的事情提供正当理由，而将加尔文教派拿来作为辩护工具。另一些人则对二者的关联强度提出质疑，他们提供证据说，许多早期资本主义企业家并非清教徒；而即便企业家信奉了清教信条，劳工人口却极少有这种信奉。这些争论固然吸引人，但是，它们却往往忽视了韦伯所辨识出的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必要条件的其他因素。

与其开放的社会学方法论相一致，韦伯从来没有认为，任何一个因素能够单独促成资本主义这一历史性变迁——而为了分析和理解这一变迁，他投入了如此之多的生命时光。对于他来说，历史包含着无法穷尽的复杂因果关系。依他的观点，资本主义要生根发芽，传统文化当然必须遭受根本挑战和否弃；而考虑到其在当时人类事务中的普遍重要性，从宗教学说和实践的变革中寻求对这一挑战的解释似乎是有道理的和可行的。但他同时也意识到，这一变革并不能为资本主义的出现提供充裕条件。同样需要的，是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整个社会环境的变革。

他辨识出六个关键性因素，这六个因素的结合，为资本主义的出现和扎根发芽所必需。首先，生产资料所有权必须归属于个体私有；第二，个体能够自由地在市场上交易，而不受“非理性”强制的约束；第三，技术发展遵循生产过程的机械化的理性线路；第四，发展一套正式的法律体系，以及以此为支撑的一套可预测的和依法管理的公共行政和争议裁定体系；

资本主义

第五，个体能够法律上自由而经济上强制地出卖自身劳动力，而不受不适当的限制；第六，经济生活变得商品化，承认提供信贷和高级股本的人具有收益权。在西欧，尤其在英国，这六个前提条件独特地结合在一起。

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

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些要素在其他一些地方——特别是在荷兰，也在德国的部分地区，以及意大利境内一些城邦诸如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热那亚——发展得更早，但是只有在英国，韦伯所指出的全部要素逐渐集合在一处，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

在英国历史上，没有哪一项单独的事件，可被视为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曾经习惯于辩解说，所有资本主义社会都出现于资产阶级革命；在英国，这一转折点便是内战，以城镇为基础的上升的资产阶级推翻了以乡村为基础的旧的封建阶级。然而，今天的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识到，英国内战并非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类似于法国的 1789 年剧变那样的戏剧性的转折点，在英国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在 1640 年内战开始的时候，乡绅和贵族阶层已经在与资本主义共处了。在他们和更富有的城镇店主和制造商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阶级划分界限。他们在国会席上并肩而坐，他们

的子女相互通婚，乡村地主常常直接投资于贸易。^① 资本主义也并没有仅仅局限于城镇。至 1640 年，农业中的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很好地建立起来，地主将土地出租给资本主义农场主，后者依次雇佣劳工，生产食物并在当地市场出售。在都铎王朝时代，一半到 2/3 的家庭，其收入已经至少部分来自于工资了。^②

那时候，贵族、乡绅和富有商人在地位上的区分，较之于他们之间的联结，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明显。这使得英国在当时的欧洲很独特，这同时也排除了将内战视为阶级斗争的过于简单化的分析。1640—1642 年的血腥斗争发生在同一阶级的不同派别之间，这些派别的区分，源于宗教学说和政治效忠的差异，而非经济利益的不同。不同于欧洲其他大部分国家，英国的资产阶级被贵族化了，而贵族同时也变得资产阶级化了。自 16 世纪中期起，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英国就出现了一个统一的居于支配地位的阶级，其倾向是资本主义的，尽管其生活方式是贵族化的。

与其说，英国的资本主义源于分别基于乡村和城镇的两种不同所有权的冲突，毋宁说，正是由于这种区分的独特的模糊不清，资本主义组织形式才逐渐得以发展和形成。英国从来没有发展出类似于意大利境内那样的自治城邦，甚至没有发展出

① 参见 Laslett, *The World We Have Lost*; P. Corrigan and D. Sayer, *The Great Arch*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5); N. Abercrombie, S. Hill and B. Turner, *The Dominant Ideology Thesis* (London: Allen & Unwin, 1980)。

② Laslett, *The World We Have Lost*.

资本主义

法国境内那样的大的地方城镇。17 世纪，伦敦是欧洲的最大城市，容纳了 10% 的英国人口，但是在其周围，只有七个城镇，拥有一万或稍多一些的人口（1700 年），不到伦敦人口的 2%。^① 18 世纪以前的英国主要还是一个农业国家，从一个孤零零的都市进行统治。

欧洲很多地方一度被零碎分割成一片片王侯封地和城邦，为了争夺自治权和权力而相互争斗，而英国则是一个处于君主统治下的单一民族国家。不存在对抗中央权力的强有力的城市和自治领地，只有数千个小教区和八百个左右的小市镇分散于全国各处。^② 管理这些地方的乡绅和市民最终依赖于王权以维护其权威，^③ 相应地，王室权力从来不是绝对的，因为自大宪章的签署，国王的统治就被地方统治精英限制了。国会的存在代表了地方统治精英的利益，使他们的共同意见得以集中表达。伦敦的君主只能通过这些集中于国会的地方精英来统治国家，而他们反过来依靠君主维护其地方权威。出现于欧洲其他许多部分的那种绝对主义权力从来没有在英国出现过，因为国家权力总是分属的和分散的。

现在考虑韦伯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发展所需的前提条件。很明显，作为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的特殊结合的一个结果，英国独特地满足了其中的一些条件。

① Laslett, *The World We Have Lost*.

② C. Hill, *Reformation to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7).

③ Corrigan 与 Sayer, *The Great Arch*.

例如，韦伯强调，资本主义的出现要求“可靠的法律，如一台机器那样”^①，在英国，一个统一国家的较早出现，正好在其法律和行政管理中提供了这种秩序和可预测性。法律和管理的理性体系的出现可追溯到大宪章，签署于1215年的大宪章确立了个体权利，明文禁止对个人的随意逮捕、关押、剥夺（我们今天所称的“法治”）。13世纪以后，一套经过改进的习惯法体系被补充进来，其中包括常规巡回审判（巡回法官周游乡村各处，以国王的名义审判案例）和地方法庭（由依据地方精英的等级所选拔出的地方法官主持）。到了17世纪晚期光荣革命的时候，英国已经享有了一套法律体系，有效地维护着一系列个人自由，除了荷兰，这在欧洲其他地方是无与伦比的。^②这一体系往往仍是粗糙的和压制性的，而且只是在很久以后始才承认无论居于何种社会等级的个体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是就其基本特征而言，它在全国各地是相对统一的，在应用中是可预测的。

然而，即使中央权力强大到足以确立国内秩序和行使管理权，它仍不足以管制地方的生活状况。在上述的国家法律体系下，对地方自治的小心翼翼的维护为贸易和革新提供了可能。作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和管制的软弱无力的一个结果，韦伯所指的另外两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条件——自由贸易和日常生活的商品化——就这样不期而至地被满足了。

① Weber,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Chapter 28.

② Corrigan 与 Sayer, *The Great Arch*.

资本主义

欧洲的贸易始于 12 世纪。在反对伊斯兰的十字军东征之后，产生了对基督教的普遍忠诚，贸易因此而得以出现。对基督教的共同信仰在人们中间产生了一种信任，而这对于商人从事长途贸易和发展出实物交换之外的其他交换方式（包括信贷）是至关重要的。^① 起初，贸易中心是在英国之外的地方，诸如佛罗伦萨和低地国家；但随着市场的扩展，先是在欧洲内部，稍后又发展出与美洲和东方的贸易，英国商人逐渐发现自己处于从这商业扩展中获益的特殊有利地位。

这种便利部分源于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国家的支持。自伊丽莎白时代起，无论国王还是国会，均将贸易的保护和扩展视作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国家商业利益通过商业主义体系得到有效保护，并通过诉诸战争和夺取殖民地而扩张至海外市场。所有这些为英国商人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市场。而他们能够利用这些市场在家乡扩大生产，正反映了乡村地方所享有的自治。在英国的城镇，如同欧洲大部分地方，日常管理权归属于行会和自治机关。通过对进入权的小心翼翼的把持、对学徒身份和期限的控制、对原材料和终成品的价格和质量的规定，行会确立了从事特定手艺的地方垄断权。这是一种彻底根除新的发展、并使得事业心和积极性无由产生的有效的封闭体系。在整个欧洲，行会管制代表了变革的主要障碍，是对商人利用扩展的市场以扩大其生产的活动的令人厌恶的限制。

但是，有别于欧洲其他地方，英国的城镇行会相对独立于

^① Mann, "European Development".

强大的土地利益阶层。英国的地主的确竭力控制临近的城镇——例如，迫使面包师傅使用其磨坊，征收什一税和领地款——不过，城镇工匠对乡村精英的依附却相对较弱。在其他一些地方，比如意大利，强大的贵族家庭往往控制了其领域内的城镇。^① 因此，商人们能够通过增加其在当地店铺的影响力乃至直接控制行会自身，自由地扩充其在城镇的权势。早在13世纪，英国商人就开始通过对独立的手工生产者的材料供应和产品市场的垄断，逐渐增强了对它的控制力。到了16世纪后半期，一些基本交易，诸如纺织品、皮革制品和金属制品等，在绝大多数城镇中都处于商人行会的有效控制之下。^②

然而，最重要的革新出现在乡村地区。英国的乡村教区和县郡不同程度地控制在地方乡绅和贵族手中。在“封闭”的教区里，一两个大地主就能够控制在教区的进出，控制其庄园里的所有活动，一如城镇行会能够做的那样。但是，还是存在一些“开放”的教区，在那里，土地分散于开放的乡下各处，分别由佃农、公地定住者（Squatters）和一些小的家庭农场主耕种使用。在这些区域里，有时几乎看不到权力集中的迹象。实际上，据估计，大约1/5的教区，根本就不存在地方乡绅。因此，当地的人们已经有效地经营自己的事业达数个世纪之久。^③

① Weber,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Chapter 28.

② D. Landes, “Introduction” in Landes (e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Macmillan, 1966).

③ Laslett, *The World We Have Lost*.

资本主义

正是借助于这些开放的教区，商人们得以扩大其制成品的供给。他们雇佣自身拥有织机或锻炉的乡村农夫从事生产，产品销往国内或者海外。至 1500 年，产于英国的毛料衣物有一半出自乡村织工。这一“生产”体系，是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中至关紧要的一步。先于法国和德国两个世纪，它在英国广泛分布开来。^① 只是在英国的开放的教区里，商人们找到了相对独立于封建统治的“小岛”，在那里，新型的经济安排得以建立。

但是，这一体系的问题存在一个问题：效率低下。它的运输费用极高，同时它无法对劳动过程予以直接控制或者协调。一旦乡村织工已经挣得自认足够的收入，就无法保证他们会继续工作；同样不能保证的是他们不私自出售一些产品。这一劳动戒律问题，随着工厂制度的发展而得到最终解决。在以前，是原材料去找工人及其拥有的机器；而在取而代之的工厂制度中，是工人来找机器和原材料。然而，现代工厂制度的发展需要韦伯所指出的另外两个前提条件：理性技术的发展以及迫于经济需要而寻找工作的大量自由劳动力的存在。

技术的理性化要追溯到诺曼第人入侵之前。公元 1000 年，四项至关紧要的技术进展——碾磨谷物的水磨（据英国土地志 [Domesday Book] 记载，1086 年，英国有 6 000 个水磨），重型犁，三圃制（three-field system），马蹄铁以及新的动物挽具方法的使用^②——已经广泛运用于英国农业。这些进展共同具

① Landes, "Introduction", *The Rise of Capitalism*.

② Mann, "European Development".

备两个重要特点。首先，它们应用的规模小，并因此巩固了村庄或庄园的地方经济自治，这种自治在后来将变得意义重大；其次，它们把动物饲养与农场耕种连接起来，这将有利于欧洲那些有着好的牧地和耕田的地区——特别是佛兰德斯地区（Flanders，中世纪欧洲一伯爵领地，包括现比利时的东佛兰德省和西佛兰德省以及法国北部部分地区——译注）和英格兰东南部。其结果是，这些地区的生产力发展远远快于欧洲其他地方和欧洲以外地区。

不过，技术进展一直缓慢；很多世纪以来，食物和手工艺品的生产一直受限于人类技能、畜力、水磨以及有机质燃料的利用。例如，铁的冶炼在数个世纪里都是依靠木炭，而木炭的供应则依赖木材；作为燃料需求不断增长的结果，在整个中世纪里，英格兰很多地方的森林都被砍伐殆尽，钢铁工业因此而衰落。直到 1735 年，一种冶炼焦煤的方法被发现，1740 年以后焦炭开始取代木炭作为鼓风炉燃料，^① 这种状况才得到改观。

工业品贸易的扩展依赖于技术创新。18 世纪以前，扩大生产的技术能力有限，工业品贸易受此窒碍，通常仅限于为军事（购买毛织品制作制服，购买钢铁制造大炮和轻武器）和奢侈品（主要是欧洲皇宫和富裕家庭）市场提供产品。当时，购置重型设备的工业极其稀少，工业生产主要集中在城镇手工工场和乡村村舍里，通过诸如手织机之类的原始机械方式完成。

^① Weber,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Chapter 27.

资本主义

主要的突破伴随蒸汽机的发明及其在棉纺织品制造中的应用而发生。1785年，卡特赖特动力织布机（Cartwright power loom）发明出来，这种动力织布机最终使得生产者从基于人力的技术局限中摆脱出来，迅速降低了棉衣的价格，因此有史以来第一次为国内外的工业品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市场。1785年，英国进口的原棉总量不过区区1100万磅，用以生产出4000万码的布料；到了1850年，进口原棉总量达到58800万磅，所产布料超过20亿码，其中的一半以上出口国外。单单棉花一项，就占了英国1816—1848年间出口总产值中的几乎一半。^①

蒸汽机的发明，最终导致了工厂制度的被广泛采用。随着织布机械被改装用于其它纺织品以及其他工业，先是棉制品生产，接下来是毛织品、亚麻制品和丝绸制品生产，相继采用工厂制度。蒸汽力被迅速用于深层开采（蒸汽机被用于深坑抽水）、机械工具制造（以完成精密工程）和交通运输（铁路和汽船极大地降低了大量工业品的运输费用）。所有这些进展相互加强，采矿业中的蒸汽泵有助于为其它工业提供更多的煤，精密工程使得大规模铁道线生产成为可能，铁路为新的工业品打开了市场，等等。

世界贸易在1800—1840年间实际上翻了一番，而英国制造商分享到了最大的份额。英国的出口不仅包括工业品，而且包括机械，后者使得德国和美国等其他国家能够迅速工业化。

^① 参见 Hobsbawm, *The Age of Revolution*。

英国的机械出口从 1845—1849 年间的不足 5 000 吨增长到 25 年后的 44 000 吨。随着现代工业技术的传播，在 1850—1870 年的 20 年间，煤的世界产量增长了一倍以上，铁的产量翻了两番。20 年间的世界贸易增长了 260%。^①

但是，工厂制度不仅仅需要新技术，它还需要大量的自由劳动力——不受乡村庄园或者城镇行会限制同时又缺乏维持生计之道的人们。我们已经知道，对劳动力的封建束缚在英国很早就瓦解了，至 16 世纪，工资制度已经广泛存在。然而，我们同样已经知道，这一工资制度如何与一种生存农业经济同时共存。小农场主、佃农和公地定住者，从季节性的农业劳作，或者从开垦家庭菜园种菜、耕种敞田（open fields 又译作“开放田”——译注）里的小块条状地以及在公地放养山羊、家禽、公猪、母牛等动物的放工制度（putting-out system），赚取工资补贴家用。这一农业生存体系维持了一个独立的农民阶级，他们无需根除这一体系而另外到新的工业城镇寻觅工作。乡村人口可以自由迁移，因为封建义务已经破除很久了；但是没有理由迁移。在 1760—1830 年间，很大程度上由于圈地运动的影响，这一状况被改变了。

公地的圈占早已零零碎碎地进行了几个世纪，土地的买卖也导致了引人注目的小片土地合并。但是，在 18 世纪早期，许多村庄仍然保留了大量的敞田和公共荒地，无论贫富均享有进入权利。敞田被分成小片条状地以适于耕作，庄园主占有其

^① Hobsbawm, *The Age of Capital*, p. 33.

资本主义

中的一些，其余的则被其他小农场主和农夫占有。荒地归庄园主所有，但是一项源于封建时期的法律规定，部分荒地可为他的佃农所用，佃农还享有在其中放牧、割草以及拣拾燃料的传统权利。那些在远离村庄的公共荒地安家的人，同样享有在其中耕作和放牧的传统权利，虽然他们没有敞田中的小片条状地可耕。尽管并非这种体系下的所有男性居民都享有土地权利——农场仆人、佃农的儿子们以及近期迁入者均需完全依靠工资维持生存——但是在 18 世纪的开发村庄，很大一部分居民都的确被许可在公地上种植庄稼或者放养牲畜。^①

圈地运动分别地打破了这一体系。部分是为获取更高租金的动机所驱动，部分是为了引入更为有效的耕作方法，大农场主和大地主们开始增加其呈递国会的圈地法案。在 1700—1760 年间，这类法案不足 250 份，圈占了 300 000 英亩公共土地和荒地；但是在随后的 80 年里，圈地法案达到大约 4 000 份，圈地超过 5 000 000 英亩，主要是在中部。这些圈地影响到英格兰和威尔士总土地面积的大约 1/6，改变了 1/5 到 1/4 的乡村人口的生活。

一旦一项法案获得通过，圈地专员就来到一个村庄，在那些证实具有合法权利诉求的人们之间分配土地。长期的公地居

^① 关于这一论题的权威信息，源于 J. Hammond and B. Hammond, *The Village Labourer* (London: Longman, 1978)，本书于 1911 年首次出版，1978 年版加入了所写的一篇有用的“简介”，其中涉及了原书中的一些证据和分析。后来的有关圈地运动的讨论主要是基于这两个来源，以及 B. Moor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Harmondsworth: Allen Lane, 1967)。

住者和拥有村舍者通常可以获得小片土地，但是不再享有公地放牧的传统权利。而那些只是出租其房舍的人则一无所得。诉求被认可的个体需要支付圈占土地及为保护其份额而不得不支出的总诉讼费中的一部分，这些花费往往构成一项沉重的财政负担。更值得注意的是，划分给他们的份额通常不足以支撑他们继续饲养牲畜，因为他们不再能够从事公地放牧。获得小片土地的人，部分能够确保生存，甚至能够逐渐扩大其拥有；但是另一些人却意识到，他们无法再维持独立生存，只好变卖光土地。

这样，公地圈占助推了英国小农阶级的毁灭，代之以形成了一个无地的无产阶级。部分人背井离乡移居美洲；部分人留在村庄，在大农场里劳作做日工，无活儿可干时，依靠可怜的救济糊口度日；部分人离开村庄，前往出现于新兴工业城市的工厂里寻求雇用。1773年的曼彻斯特（Manchester）尚没有纺织厂，只有27 000人居民；仅仅30年后，便拥有了52家纺织厂，人口达到95 000人；再50年过去，人口更增至300 000人。^① 蒸汽机械为这种扩张提供了技术，对英国小农阶级的攻击提供了劳动力。

圈地运动不仅将劳动力从土地上驱逐出来，而且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水平，因为它使得剩下的农场主能够开垦荒地投入生产，并开发利用关于肥料、农作物以及管理方法的新知识，这些新知识从16世纪以来已经在发展了。18世纪早期的英国农

^① Corrigan 与 Sayer, *The Great Arch*。

资本主义

业，效率极其低下，因为划分成小块条状地耕种的敞田制（open field system）极大地阻碍了适用于整块田地的新技术的采用。如果没有圈地运动，由工业革命所引发的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就绝对无法供养。但是，在 1750—1830 年间，英国的人口增长了一倍以上，伴随圈地运动而来的进步使得家庭农场能够将 98% 的粮食供给这些人们消费。^①

因此，很多独特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英国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统一提供了一套统一的可预测的法律体系，地方自治传统使得经济生活能够通过放工制度实现商业化。原材料（尤其是煤）的丰饶意味着具备了充分利用诸如蒸汽动力之类的新技术的条件。乡村地主与城市商业阶级的联合，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早期出现较之欧洲其他地方阻力更小（而支持更多）；而圈地运动所导致的独立小农阶级的衰落，为新兴工业城市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和廉价食品。再加上海外帝国所提供的意外礼物：食品、原材料以及受保护的工业品市场，我们就逐渐可以理解为何是英国如此独特地充当了新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先锋和领导者。

无疑，英国推进其资本主义革命的条件是独一无二的。它们决无可能在其他地方被复制再生，因为其他国家的后来发展都是在一个已经先期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发生的。19 世纪后半期的德国和美国，正如 20 世纪后半期的日本和东亚“小龙”，不得不在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已经发展起来的世界上展

^① Hobsbawm, *The Age of Revolution*.

开竞争（但仍然能够从中获益）。就像第一个在雪地上留下脚印的孩子，英国实现现代资本主义的道路无法被重复，因此也无法为我们提供一个适合其他国家历史的样板，更无法为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可供摹仿的典范。今天的贫穷国家所面临的真实问题是，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集团的存在，对于它们自己寻求通往资本主义繁荣的道路的努力尝试，是一种帮助，还是一种阻碍？这正是我们下一章要考虑的问题。

第二章 资本主义与贫穷国家

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大概要算扎伊尔。据估计，扎伊尔的平均收入是美国的 1/80。^① 然而，扎伊尔只不过是撒哈拉非洲、亚洲以及拉丁美洲诸多贫穷国家之一，这些国家迄今无法实现与欧洲、北美和日本资本主义相关联的那种繁荣。差不多有 8 亿人生活在西欧、北美、日本和澳大利亚等成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均所享有的年收入在 1990 年达到 19 900 美元。但是超过 40 亿的人们却生活在平均收入要少得多的世界其它国家。单是在印度次大陆，就有 8.5 亿人，其在 1990 年的人均年收入只有 360 美元。^②

① S. Bowles 与 R. Edwards, *Understanding Capitalism*, 2nd edn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3)。

②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3: Investing in Heal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欠发展国家中的贫困

世界银行曾将贫困界定为“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①，并识别了两种人均收入水平，低于这一水平的国家则被划归“贫困”之列。第一条是较为“丰裕”（generous）的贫困线，划在人均年收入 370 美元（按 1985 年价格）。依照这一界定，世界上有 11.15 亿人——超过世界总人口的 1/5——生活于贫困之中。第二条是较为紧缩（tightly）的贫困线，划在人均年收入 275 美元。依照此界定，6.3 亿人归于贫困。在第二种收入水平上，贫困将危及生存。例如，据估计，在 1980 年，3.4 亿人的卡路里摄入量不足，无法满足身体发育所需以及抵御严重的健康风险。

当然，并非贫穷国家中的每一个人都属贫困（正如并非发达国家中的每一个人都很富裕）。跟“发达世界”一样，“欠发展国家”（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LDCs）中的收入与财富分配是不平等的。其中大约 1/3 的人们的年均收入低于 370 美元，大约 18% 的人们低于 275 美元。贫穷国家里的贫富差异完全跟发达国家与欠发展国家之间的平均收入差异一样大。然而，贫穷国家与富裕国家之间的平均生活标准的差距是非常巨大的。

这一差距反映在生存机会的显著不同上。举例说明，发达

^①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0: Pover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6.

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国家的婴儿死亡率平均为 11‰，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的婴儿死亡率为 60‰，印度为 127‰，撒哈拉非洲为 175‰。同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为 76 岁，印度为 58 岁，撒哈拉非洲为 52 岁。^①

这种对比使得许多人相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在某种意义上与贫穷国家的苦难有关。如果不是以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那些依然如此贫穷的国家为代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怎么能够变得如此富裕呢？难道富有者的财富不是建立在对贫穷者的剥削基础之上吗？

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代表了马克思的贫困化命题转向全球范围后的一个现代版本。这一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使贫穷国家更穷而使自己更富。据说，西方越是富有，世界其余部分就要相应地经受越多苦难。

据认为，富裕国家以世界其余部分为代价而实现繁荣的一个途径是对全球资源的大量挥霍使用。西方经济的人均能源使用量是那些最贫穷国家的 80 倍。^② 这似乎暗示了，当享有特权的西方人毫不顾及他人地将能源耗尽在其汽车上和工厂里时，贫穷国家就一直在遭受剥夺。类似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卡路里消费量是贫穷国家的两倍之多；他们无效率地使用食品，将粮食饲喂给牲畜。这些悬殊差异，导致西方资本主

①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3.

② 主要是因为它们占到了 5/6 的世界工业生产——见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the Brundtland Report), Our Common Fu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义的批评者将蜷缩在垃圾堆里的蓬头垢面的埃塞俄比亚儿童的瘦小衰弱与一边漫步于大型购物中心一边向嘴里塞汉堡包的美国成人的过度肥胖联系在一起。

诸如此类的批评存在三个主要问题。第一，它们忽视了追问：西方所耗费的能源、食品以及技术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它们集中关注全球之“壶”中的“蜂蜜”的分配，却不考虑“蜂蜜”起初是如何被酿造出来注入“壶”内的。然而，如果资源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生产出来的，那么谴责欠发展国家的贫困是源于前者的贪得无厌就几乎没有意义。

第二，它们倾向于忽略或者至少低估了一些欠发展国家所实行的警察统治对经济发展的阻碍程度。如果是欠发展国家自己铸成了自己的不幸，那么，将第三世界的贫困归咎于资本主义国家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第三，很难看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足与其他国家的贫困之间有什么明确的因果联系。比如，瑞士（石油生产国之外的世界最富裕国家）人的富裕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世界最贫穷国家之一）居民的贫困之间的关联在哪里？^① 的确，我们生活在一个日渐相互依赖的世界上，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很难说瑞士人

^① 参见 P. Bauer, *Equality, the Third World and Economic Delusion* (London: Methuen, 1981)。一些“欠发达”理论家——在本章的后面将讨论到他们的工作——认为，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世界体系”：所有的发达国家都以第三世界的牺牲为代价换取自己的利益，无论它们之间的具体贸易关系如何。但是 Bauer 的问题仍然有效，除非有经验研究证明，瑞士这样的国家的财富的获得与欠发展国家的牺牲之间有着确凿无疑的联系，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

资本主义

剥削了巴布亚新几内亚人，因为瑞士从来没有对其他国家实行过殖民统治。无疑，瑞士的富足应当主要归功于自身的努力。

显然，是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世界其余部分的损害实现了自身的富裕，这一问题要比第一眼看上去复杂得多。可以从两个途径来分析。一个是，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国家是否曾经劫掠了世界其他部分，作为不义行为的结果，后者至今保持贫困。第二个途径是，从当下看，资本主义国家与欠发展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一些特征，这些特征使得前者更富、后者更穷。这第二个途径将引导我们考虑跨国公司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或许是由世界贸易模式所产生的不平等。

是西方殖民主义铸就了穷国的贫穷吗？

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奴隶制度的历史。^① 人们普遍相信，是欧洲人将奴隶贸易引入了非洲；由于失去了最具经济活力的人口，当地的发展因此而受阻。当然，这种认识无法解释那些不曾遭受西方奴役的国家——比如印度——的贫困。它同样无法解释东南非洲的贫困，因为奴隶贸易集中于西非，而几乎不涉及东部、中部和南部非洲。一个附加的问题是，非洲的奴隶贸易要先于欧洲人的到来。早在欧洲人踏上非洲土地之前，阿拉伯商人与非洲部落首领之间的奴隶贸易已经存在了数个世纪，而且一直持续到这一贸易被欧洲政府宣布为非法之后许

^① 这一段依赖于 Bauer 的研究。

久。当然，西非的奴隶贩卖的确为美国南部的种植园主和英国西北部的棉纺制造商带来了财富，但是很难坚持说，它能够解释非洲大陆如此众多地区的后来的经济落后。

如果我们要找寻一个因果机制，借以关联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与欠发展国家中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的苦难，那么，一个似乎更为真实可信的备选因素，是西方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历史。毕竟，英国不仅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许多其他成功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荷兰、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及葡萄牙，也都在非洲、东印度、中南美洲分别拥有其殖民地。毫无疑问，被占领的殖民地促进了许多这些国家的繁荣，因为殖民地为种植园和大农场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为“母国”的工业供给了廉价原材料和受保护的工业品倾销市场。虽然管理和控制殖民地也消耗了费用，但它们带来了大量的收益。

但是，与奴隶制的情况一样，将国家之间目前的不平等与过去所犯下的不义劫掠和征服相连接，同样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并不是每一个成功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殖民地。许多最为繁荣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瑞士和瑞典，从来不曾有外国殖民地；甚至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最初的13个州，自身就曾经是殖民地。那么很明显，没有殖民主义收益，资本主义也能繁荣；曾经的殖民地，尽管（甚至正因为）与帝国权力有历史关联，同样能够繁荣。

而且，在那些的确曾经并吞外国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经济的发展与其说是征服的结果，毋宁说是征服的前提。

资本主义

对于英国来说，要使 1/4 的世界人口服从其统治，必须预先有能力建造船只、绘制地图、供给军需、提高税收以及发展出一套复杂的法律和社会组织体系。因此，在夺取殖民地之前，必须首先具备高水平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由此说明，并非帝国主义创造出了资本主义发展，而是资本主义发展创造出了成功殖民的能力。

但是，将殖民与第三世界的贫困相勾联，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却在于，那些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例如尼泊尔、利比里亚和阿富汗——往往从来不曾被殖民过。埃塞俄比亚，是撒哈拉非洲最为贫穷的国家之一，也是在整个殖民历史中得以保持自身独立的极少数几个非洲国家之一（作为一个例外，曾有短短 6 年时间处于意大利统治之下）。与此相对照，曾经处于殖民统治之下的那些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发展通常都要好于那些不曾被殖民的国家，其中一些已经跻身发达行列。比如，一个在二战后成功实现其经济发展的最为令人惊叹的实例，发生在英国的最后一片殖民地——香港。另外两条东亚“小龙”（台湾和韩国）则曾属二战前的日本殖民地。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殖民主义的确有时候会阻碍附属地的本土经济发展。例如，在英国人到来之前，印度一度拥有自己的棉纺工业；由于不允许当地的生产者与英国的制造商竞争，本土工业被破坏掉了。但是，殖民主义也常常会刺激发展，因为那些被欧洲殖民者从其海外殖民地运送回家的财富往往并非“躺在那儿”等待来取。作物需要种植，矿藏有待挖掘，道路亦需修建。在创造

这些财富的过程中，殖民者发展了当地经济。

许多被征服的地区，在欧洲殖民者到达之前，经济发展几乎尚未开始。例如，在澳大利亚和非洲很多地方，欧洲人出现以前，当地的人们不曾见过一只车轮。在整个殖民地，欧洲殖民者为那些先前依靠刀耕火种的游牧部落地区带来了新的农业技术；他们引进了新的作物品种（比如印度的茶树种植，马来西亚的橡胶种植），这些作物成为主要的收入来源；他们建造医院和学校，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地人和殖民者自己的需要；他们发现了新的矿藏，并开发出现代矿井和油井以便抽取提炼；也许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带来了理性的法律和管理体系，（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看到的）这是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

因此，尽管有诸多残酷和不公，殖民对经济发展的实际效果却被证明为益处大于害处。甚至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现在也接受这一点，正如比尔·沃伦所写：“直接的殖民主义，非但没有阻碍或者扭曲本土兴许会出现的资本主义发展，反而担当了进步社会变迁的强有力的引擎。”^① 以今天的标准看，外国殖民统治也许在道义上是不可原谅的；但是这种令人不快不应遮蔽我们的眼睛，使我们无视它所留下的总体而言属正面的经济遗

^① 引自 D. Booth, “Marxism and Development Sociology” in M. Shaw (ed), *Marxist Sociology Revisited*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5), p. 59.

资本主义

产。^①

是资本主义使穷国变穷了吗？

今天，殖民时代一去不返。在二战后的大约 20 年时间里，俄罗斯帝国以外的绝大多数欧洲殖民地都赢得了独立。如果殖民主义果真是发展的阻碍因素，那么我们可以预期，一旦实现了民族独立，这些国家就将利用其新近获得的自由去发展经济。然而，已经呈现的事实证明，在实现政治独立以后，很多国家并没有能够获得大的经济进展，一些国家似乎走向倒退。而且，主要问题并非紧随在独立后出现，而是出现于 10 年后乃至更晚，其间，这些国家已有时间实施自己的发展战略。^②

当然，进展也有一些。世界银行指出，世界所有国家的健康水平均有显著提高，过去 40 年里人们的预期寿命增长较以往整个人类历史时期都要快。在欠发展国家里，5 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从 1950 年的 28% 下降到 1990 年的 10%，人们的预期寿命从 1950 年的 40 岁提高到 1990 年的 63 岁。^③ 营养也有所改

① 我暂且将如下的问题搁置一边：殖民时期建立起来的基础结构和贸易模式，是否使得这些国家陷入与前帝国中心的有害的贸易关系之中。在这一章的后面，将单独讨论这一问题。

② 1960 年代，新的独立国家的经济表现与西方国家相比倒也不是特别差。只是到了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其增长开始慢下来甚至出现负增长。参见 T. Killick, *Explaining Africa's Post-Independence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 60, 1992)。

③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3.

善。尽管世界总人口规模有大幅增长，在自 1960 年代中期以来的 20 年里，人均食物生产还是增长了 12%。新的作物种类，再加上肥料的更集中使用，使得 1950—1985 年间的谷物产量实现了 2.7% 的年均增长率。尽管需要养活的世界人口增长很快，但卡路里的人均日摄入量还是从 1965 年的 2 321 增加到了 1986 年的 2 653。

人们的生活标准在二战后也有所提高——人均 GDP 从 1965 年的 2 388 美元增加到 1989 年的 3 616 美元（1987 年美元价）——许多较贫穷国家不同程度地分享了这一增长。1960—1970 年间，最贫穷国家的经济以年均 3.6% 的速度增长（年均出口增长超过 6%），中等收入国家的年均增长速度是 5.7%（年均出口增长速度为 7.6%）。与之相比较，发达国家经济的年均增速为 4.7%。但是，由于欠发展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更快，这就意味着，与西方相比，许多国家的人均收入状况在这 10 年中变坏了。

伴随 1970 年代早期的石油危机以及战后的长期经济繁荣走向尽头，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欠发展国家，增长速度均降下来。在 1975—1990 年间，平均而言，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每年的经济增速为 2.2%；同期，欠发展国家的平均 GDP 增长仅仅超过 1%。不过，一些较贫穷国家的表现要好得多。1975—1990 年间，印度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为 2.5%，东南亚的增速为 4.6%，中国则达到令人吃惊的 7.4%。

但是，其他一些贫穷国家却停滞不前——在这 15 年中，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经济增长记录是零，撒哈拉非洲国家的

资本主义

整体记录却是 1% 的负增长。^① 反映国家之间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其数值在 0 到 1 之间变动），从 1960 年的 0.49 增至 1987 年的 0.53，显示出这一时期最穷国与最富国之间的收入差距在逐渐加大。据世界银行对 1990 年代的预测，即使撒哈拉非洲能够设法实现正的人均增长，相对而言，它也将继续落后于发达世界。

这些国家绝大多数都已经实现独立达 30 年之久乃至更长，一些国家，比如拉美的穷国，自 19 世纪以来就一直独立自主。那么为什么它们的经济增长记录如此糟糕呢？为什么许多拉美国家在整个 1970 年和 1980 年代停滞不前，甚至如此之多的非洲国家出现倒退呢？是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在实际上阻碍着这些国家吗？

资本主义与第三世界的“不发达”

直到近来，专门研究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许多社会学家都认为，欠发展国家的持续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与西方发

^① 数据取自 E. Brett, *The World Economy Since the War*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5), 以及取自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1: The Challenge of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① 他们指出，资本主义在富国制造出发达的同时，也在穷国制造出不发达。贫穷国家越是试图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它们遭受的剥削越多。问题可以分两个方面讲。

首先，虽然贫穷国从在原则上讲是“独立”的，但实则仍然依附和受制于西方，状况一如殖民时期。它们不享有有效的政治或经济自治，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西方政府和西方资本基于自身目的，借助于当地精英实现对欠发展国家的剥削。尤其是巨大的跨国公司，被认为是维持这种依赖的主要动因；因为它们较那些第三世界的政府更多地控制着政府预算，它们的来自于遥远的东京、纽约或者伦敦的决策，对贫穷国家有着异乎寻常的影响力，尽管这些国家不在其权限之内。

因此，这第一种论点指出，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外围的国家，其经济仍然依附于那些处于体系核心的国家。他们的扩大出口依赖于核心国家的购买，他们的经济投资和增长依赖于核心国家提供资本。这就实际上意味着，在一些国家极度缺乏资本的时候，其他一些国家却陷入巨额债务，需要向西方银行支付高额利息。无论如何选择，贫穷国家都发现，他们的命运始终掌握在曾经对他们实行殖民统治的同一些国家手中。

^① 与这一学科的许多其他领域一样，发展社会学在 1970 年代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强大影响，这一领域的关键人物——包括 Frank、Emmanuel、Wallerstein 和 Amin——都是从这一视角从事写作。对于他们的思想的较好评论，见 D. Harrison, *The Sociology of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London: Unwin Hyman, 1988), 和 D. Hunt, *Economic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 Wheatsheaf, 1989)。

资本主义

这种依附的一种表现，见之于跨国公司在欠发展国家的运作。^① 据说，这些跨国公司能够游刃于世界各地，使得不同政府之间相互争夺敌对，因为各个政府都需要从前者的投资中获取税收和其他商业利益。一旦为某个贫穷国家所吸引，这些跨国公司就在那里设立分厂，但是决策中心仍在西方，而且他们的投资和市场战略几乎或者根本不考虑当地的需要。他们的全球业务的功能互依性意味着，他们设立在欠发展国家的各个分厂，完全依赖于外来成分的供应，其扩展或者关闭很少关心对当地经济的意义和影响。其结果是，当地人们和他们的政治人物失去了对自己事务的控制，而命中注定和极其不幸地依赖于外来决策。

据说，不仅跨国公司会侵蚀欠发展国家的经济，而且他们的投资也很少能为相关国家带来经济利益。跨国公司的规模是如此庞大，业已存在的当地小企业根本无法与之竞争，所以本土的新生工业在能够建立之前就被破坏殆尽，当地市场充斥着西方的商品。公司在穷国当地所赚取的利润被输回西方，正如之前的殖民者将利润运送回家一样。他们所使用的技术水平，意味着能为当地人们提供的就业机会极其有限。最后，他们的分厂设在城市中心，无法为周围的乡村提供任何有益于发展的东西。身处穷乡僻壤的农民发现，由于向城市工厂提供的食品日益廉价，他们遭受的剥削日渐加深。这些大企业只是为一小撮当地资本家牟取了好处，为腐化堕落的当地政治头目提供了

^① 参见 Brett, *The World Economy since the War*, Chapter 4.

可资任意挥霍的税收，却几乎不曾为大多数普通民众的生存提供任何改善机会。

这样看的话，西方大公司在被邀进入欠发展国家后，就成了一只特洛伊木马。但是这种观点完全无视和闭口不提这些投资所产生的巨大效益。西方跨国公司带来了新技术和新的管理方法，培训了当地劳工，与当地厂商签约。他们（通过扩大出口）增加了外汇收入，打开了国内市场，创造了就业机会，提高了当地工资水平。我们在后面将看到，那些原本贫穷但已经设法在过去 30 年里实现了经济繁荣的国家，其途惟有一条，那就是利用现代技术和现代经营方式，大力发展外向型工业（export - orientated industries）。或者通过向西方公司开放经济投资领域，或者通过与他们谈判，经许可后生产他们的产品，无论如何，经济繁荣就是这样取得的。而第三世界中那些经济一直停滞不前的国家，都是实行闭关锁国不向外来投资开放的国家。对于今天的绝大多数欠发展国家来讲，一个问题在于，跨国公司在西方以外投资不足，因为 3/4 的投资仍然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那里集中了主要的产品销售市场。

西方资本主义制造了第三世界的不发达的观点是分成两支的，第二个方面涉及所谓的“不平等交换”。据认为，这种不平等交换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富国与穷国之间。

这种不平等交换的根本原因要追溯到殖民主义时期，当时，帝国权力基于殖民帝国自身的经济目的，对殖民地穷国进行了开发。为了便利向“母国”的出口，而非为了促进当地市场的发展，殖民地的基础设施，诸如公路、铁路和港口，被建

资本主义

立起来。类似的，种植农场被组织起来，矿藏被开发出来，但是从种植农场里生产出来的经济作物被船运出口，正如从矿里开采出的黄金、铜和其他矿物被运往发达国家去支撑其工业增长一样。在这些殖民地国家赢得其政治独立的时候，他们也就因此设想控制了经济，而实则后者是偏向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需要的。

根据这些发展理论，结果就是，这些国家陷入了既无法从中获利又缺乏扩展机会的贸易关系中。富裕国家的需求变化是很快的，而西方国家所处的位置使得他们能够强行压低来自穷国的产品的价格。当西方经济陷入衰退的时候，应用于工业生产中的初级产品的需求就下降，结果往往导致出口国面临严重的外汇收入短缺。而且，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寻找能够降低原材料价格的新技术，欠发展国家将发现，随着新技术取代老技术，他们的国外市场不断萎缩。电讯工业中纤维光学电缆的发展就是一个适当例子。铜在以往被用作配线系统中的导体，而纤维光学电缆取代了对铜的需要，这对于铜出口国——比如赞比亚——来说是个极其沉重的打击。由于铜的世界需求急剧下降，赞比亚的出口收入锐减，其支付经济发展所必需或者合意的西方的机械和其他物品的能力就下降了。

这些例子使得许多依附理论家认为，是与富国的交换导致了穷国的贫困。他们相信，通过向西方消费者提供的廉价食品和原材料，欠发展国家的财富大量流入处于世界体系核心的发达国家。在将他们的产品出售给世界市场的时候，第三世界的

生产者并没有被支付一个“公平价格”，^① 为了获得同等回报，他们的工作付出要比富国的相应对手多得多。

这一观点基于如下观察：欠发展国家的现代技术稀缺，而劳动力充足而便宜。工资因此低下。当欠发展国家生产的物品出售到世界市场上时，所获得的价格反映了制造它们的劳动力的便宜。贫穷国家发现，自己很难摆脱这一点，因为即使他们投资于新机械以提高生产力，他们产品的强大的购买者只需简单地进一步压低产品价格，就足以使他们无法获益。由于国家贫穷，所以他们的产品就便宜；由于他们的产品便宜，国家就仍然保持贫穷。

然而，当欠发展国家购买西方的产品时，相反的情形据说就出现了。由于是高技术经济，西方的劳动力使用就相对更有效率。他们能够付给他们的工人较通常更高的工资。当他们与欠发展国家进行交换时，西方的公司就因此要求反映了他们的工人的高生活标准的高价位；当他们追加投资以提高生产力时，收益就以更高的工资和更高的利润的形式保留下来，而并没有通过价格降低而转移掉。

贫穷国家就这样被迫贵买贱卖。只要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所生产的产品的种类不同，因而不存在在同一市场上的直接竞争，这种模式就将继续存在。实际上，这意味着欠发展国家的农民和工人一直在向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富人转让财富。为世界市场生产的越多，所受的“剥削”就越深。

^① 尤其见 A. Emmanuel, *Unequal Exchang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2)。

资本主义

然而，一旦面对如下渐增的证据，这种理论的破绽便显露出来了：一些贫穷国家能够利用其劳动力便宜的竞争优势，开发多样化的新产品，在他们自己的市场上削低西方产品价格。很显然，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为日本和后来的东亚“小龙”赢得了巨额收益。这一证据，再加上非洲、拉美以及其他地方那些竭力保持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隔绝的国家的糟糕记录，最终从根本上驳斥了那种认为贫穷国家的贫困是由于他们的命运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及除非他们与西方相脱离并实现独立自主否则永远也不会有发展的观点。今天，绝大多数的发展社会学家终于逐渐意识到，大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持续贫困，与其说源于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联，毋宁说源于因听从斩断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联的建议而做出的灾难性尝试。^①

抗拒资本主义

上述不发达理论从第三世界的许多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

^① 例如，可参见 D. Booth (ed.), *Rethinking Social Development* (Harlow: Longman, 1994)。在这本书的导言中，Booth 指出发展社会学是如何从早期信条，即认为全球资本主义导致了穷国的贫穷，脱身出来，转而致力于分析国内政治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这一转变的最好不过的例子，是 Nicos Mouzelis 的收入这本书中的一篇文章。Nicos Mouzelis 过去是欠发达理论的领军人物之一，他现在则坚持：“出发点和资源均可比的迟发展国家，之所以在世界经济中的表现如此不同，最为至关紧要的方面，在于各个国家的实际结构。”（‘The State in Late Development’，p. 127）。也许，可以理解地，Mouzelis 忽略了欠发达理论对许多欠发展国家在 1960 年和 1970 年代的国家政策的影响。

那里找到了忠实的听众，因为这些观点不仅指出西方对欠发展国家的贫困负有责任，而且鼓吹一种可以让第三世界的领导人扮演关键角色的发展战略。既然只要继续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欠发展国家就无法实现持续和稳定的经济增长，那么接下来，就应当打破自身与这一体系的关联，接受一种独立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在拉美、非洲和亚洲（包括中国和印度）的大部分地区，这一战略建立在如下基础之上：对不依赖西方的技术和专门知识而独立实现工业化的激励，针对来自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口物品的高关税壁垒的树立，对外来投资资金的拒斥。

然而，正如事实所证明的，在贫穷国家试图通过解除与世界体系的联系而推动发展的时候，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最鲜明的例子发生在 1950 年代的中国，毛泽东对来自西方和苏联的政治封锁做出反应，特意断绝他的国家与世界其余部分的联系，发动了旨在快速实现工业化的“大跃进”。其结果，农业生产陷入崩溃境地，因为农民被从土地上拉进工厂，去从事最为原始粗糙的机械操作。^① 但是，这一试验并无助于建立起一个可行的工业部门，与西方更为先进的工业相比，中国的工业继续以高昂的成本生产出质量低劣的产品。

不那么具有戏剧性但同样不成功的一个例子是所谓的“进口替代”战略。这一战略由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所提

^① 参见 Ding - Xin Zhao 和 d J. Hall, “State Power and Patterns of Late Development”, *Sociology*, vol. 28, 1994, pp. 211—20。

资本主义

倡，并于 1950 年代以来在南美许多地方付诸实施。该战略认为，诸如智利、阿根廷、墨西哥以及巴西等国家，在他们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联系最少的时候（比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也就是他们的发展最为迅速的时候；而一旦联系被重新建立起来，他们的发展也将停滞不前。基于这一错误的信念，该战略试图通过树立关税壁垒以阻挡西方廉价产品的进入、向农业征税以补贴新生工业、对价格和工资实行管制，培育和鼓励本土工业的发展。

这些政策导致了普遍的腐化和无效率，经济增长全面停滞。智利、阿根廷和巴西的政府都力图支持和保护城镇本土工业，却没有推进乡村农业改革。这一战略制造了一个强大的政治联盟，一个封建地主和城市新中产阶级的联盟。前者意图抵制土地改革，后者致力于对自己的薪水和利润的保护，这一联盟日益要求和依赖于国家对其利益的保护。由于缺乏来自国外制造商的竞争，受保护的工业日渐趋于无效率，政府的补贴相应增加。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政府日益面临压力，不得不扩展其工资册，以便吸纳城市失业以及平抑民众骚乱。这就刺激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越来越多的资源被从生产性投资中抽取，转而支持一个“庞大而畸形的国家机器”^①。当 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的军事独裁最终取代了以往政府之后，他们所做的仍是利用国家去维护他们自己的地位，而不是去推动提升外向型工业化。阻滞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并非西方资本主义，

^① Mouzelis, “The State in Late Development”, p. 137.

而是这些国家内部的组织机构。

在非洲许多地方，经历的是同样的情形，只是那些决定独自行走的许多国家的结果较之拉美国家更糟糕。^① 据基利克 (Killick) 的回顾，在 1965—1989 年间，31 个非洲国家中，有 20 个国家的年均增长速度在 +1.9% 至 -1.9% 之间——这一表现远比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糟糕。平均而言，撒哈拉非洲国家的人均 GDP 在 1990 年并不比在 1970 年高。这反映了许多这些国家的工业化的缺失是与没有能够使粗放无效的农业部门实现现代化结合在一起的。

同样，这份暗淡的记录看来与世界市场的有害影响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非洲国家的贸易条件并不比许多第三世界其他国家更差，而且在某些情形下，世界价格在这段时期的很多时间里变得非常有利。例如，在 1970 年代的坦桑尼亚，“净物物交易条件” (net barter terms of trade) (即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的比率) 保持在或略高于 1960 年的水平，但是，由于诸如剑麻、棉花和腰果等出口产品的生产量大幅下跌，该国政府利用其外汇收入购买进口产品的能力丧失了大约 1/3。与之相比较，其他一些国家，比如象牙海岸、肯尼亚和马拉维，尽管贸易状况

^① 接下来的讨论是基于 Hunt, *Economic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Killick, *Explaining Africa's Post - Independence Development* 和 J. Sender and S. Smith,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Africa* (London: Methuen, 1986)。

资本主义

有所恶化，在同一期间还是扩大了其出口。^①

表现不同的原因，几乎全在于不同国家所推行的国内政策不同。^② 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早期，扎伊尔的年均 GDP 降幅为 0.2%，加纳为 0.5%，乌干达为 1.5%，乍得湖为 2.6%。同一时期，加纳的农业生产年均下降了 0.2%，莫桑比克下降了 1.4%。其他地方——在坦桑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经济停滞不前。在许多这些国家里，政府所推行的政策，由于损害了出口产品的生产，因而破坏了国内的繁荣。最不成功的国家，往往就是那些维持估值过高的货币（overvalued currencies）（在 1970 年代的非洲，真实汇率平均上涨了 38%，大大增加了出口商向海外出售产品的难度）、强制征收高额出口税、以远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支付给生产者的国家。

比如，获得独立后的加纳，国内的可可生产者不得不将他

① Killick 还指出，其他一些更为成功的欠发展国家，在贸易条件变得不利的时候，使得传统出口工业更多样化，而赞比亚、扎伊尔等国只是维持以往做法。他进一步指出，非洲国家从西方保护主义中所遭受的伤害并没有其他许多欠发展国家多，因为非洲的出口常常受到欧盟和美国的特惠待遇，其借贷条件也要比其他国家，比如说拉美，好得多。所有这些使得他得出结论：“有人认为，撒哈拉非洲独立后的发展记录之所以乏善可陈，主要原因在于不利的世界经济环境。抱持这一观点的人，将得不到证据支持。”（*Explaining Africa's Poor post-Independence Development*, p. 21）。

② Killick（同上书）引用 el-Farhan 一项未出版的研究，这一研究分析了撒哈拉非洲 32 个国家于 1960—1986 年间的经济表现。10 个可能的解释变量——人口增长、国内投资、国家消费、援助收据、识字状况、通胀因素、出口增长、进口增长、国家债务和政治稳定性——被纳入一个多元回归模型。结果发现，最有力的影响因素是出口状况，国内投资和政治稳定性也显著，而其他因素则不显著。当商品进出口交换比率的变化被引入模型后，这一变量同样达不到统计显著。

们的产品卖给国家销售委员会 (state marketing board)，后者抽取了他们的利润，毁灭了他们的出口激励。1966 年，加纳的可可生产者所获得的政府支付价格仅占世界市场价格的 57%，这一比价下降到 1970 年的 36%，1974 年的 27%，以及 1979 年的 15%。在 1970 年代中期的坦桑尼亚，对咖啡所征收的出口税占到其市场销售价格的 44%。在这两个国家，估值过高的货币更是加重了出口商向世界市场出售产品的困难——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估计，在 1970 年代晚期，加纳货币的年均增值率为 16%，远远高于保持国家贸易均衡所需的生长。而在同一时期的坦桑尼亚，这一数字更达到惊人的 92%。所有这些政策都迥异于那些更为成功的非洲国家。例如，在象牙海岸，可可生产者看到可可的实际价格在 1970 年上升了 13%，就相应地扩大生产、追加投资，以便实现更高的效率。

经济政策破坏了出口，许多这些国家里的整个政治环境更是令情况雪上加霜。如同拉丁美洲，在一些非洲国家里，政治腐化普遍而具有破坏性；而在许多其他国家里，公共管理混乱而极端无效。政府准予基于城市的无效的工业和商业拥有特权，并不断扩充公共部门的工资册，以此来寻求地位的维持。为了支付这些开支，他们就利用国家销售委员会，对农业经济进行剥夺。

另外，弥漫于非洲各处的内战使得一些国家分崩离析；军事政变与反政变频频发生；一些国家，比如处于伊迪·阿明 (Idi Amin) 统治下的乌干达，有系统地驱逐或者清除企业家和

资本主义

知识分子，而国家的未来发展要靠这些人。^① 政府将经济剩余投向耗费巨大的形象工程，而这些剩余本可用于新的商业投资。政府无视从殖民时代继承下来的基础设施，却通过推行国有化而积极地阻碍跨国公司的投资，并通过卑鄙的令人窒息的管制或者浮夸的极端失败的官僚经济计划而破坏了本土企业。如果说，理性的、确立的和可预测的法律和管理环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那么很显然，许多这些国家在其独立后的时期里也并不具备这一条件。

拥抱资本主义

不发达理论的主要问题，也许在于它从来没有令人满意地解释，有什么因素可以阻止第三世界的生产者将用于出口的初级产品多样化以及利用其廉价劳动力直接竞争于世界市场以获取制成品。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无需依赖传统出口，而能够开辟新的出口。借助于现代技术和廉价劳动力，第三世界的生产者不久就能够如所期望的那样，削弱发达国家中的竞争者，侵入他们的市场；并因此积累外汇收入，用以支付所需的西方资本货物（capital goods）的进口费用；从而迅速摆脱贫困。与其切断自身与世界的联系以便节约珍稀的外汇，何不融入世界以

^① 这是殖民遗产的一个方面，被说成阻碍了欠发展国家的发展，尤其是非洲国家，因为国家边界是基于以前的跨越了传统种族和部落划分的殖民边界。因而引发的独立后的国内冲突和政治不稳定，已经成为削弱许多这些国家经济的一个显著因素。

便去挣得它呢？

当然，这正是成功的东亚经济自 1960 年以来所开始做的。以更早发展起来的日本为榜样，诸如韩国和台湾等国家或地区，审慎地瞄准出口市场，坚信他们能够与西方的厂商相抗衡。这样，在一代人以前还很贫穷的、似乎注定要因无可救药地“依附”于西方而惨遭淘汰的国家或地区^①，现在已经发展成为生机勃勃的工业贸易区域，其经济实力足以构成对既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威胁。

人们常常会争辩说，与已经先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相比，那些工业化的“后来者”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处于不利地位。据说，试图推进工业化的贫穷国家，将受制于弱小的国内市场，并将很快发现，它们无法突破其他国家为保护其更有利的市场而设置的关税壁垒。它们缺乏获取资本的途径，它们的生产力的原始低下意味着只有微薄的剩余可供再投资，而那些已经先期工业化的国家里的公司拥有巨量的周转资金，能够大量再投资于生产。较之那些已经成功克服困难从而先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诸如英国、德国和美国，它们所面临的发展障碍要严重得多。因此，在与已经确立的资本主义活动中心的竞争中，它们毫无成功的希望。

这种分析忽视了一项“后来者”能够享有的至关紧要的有利条件，那就是，它们可以利用时机，从那些花费了先期工业

^① 例如，迟至 1970 年代，台湾的人均 GDP 还低于苏丹，回顾这一点，实在不同寻常（见 *The Sunday Times*, 15 May 1994）。

资本主义

化国家多年时间才开发研制出来的技术中迅速获益（假如他们选择这样做）。英国最先开始其工业化是在大约 1780 年，用了差不多 60 年时间才使人均产出翻一番；美国的工业化晚于英国大约 60 年，人均产出翻一番用了将近 50 年；日本的工业化开始于 1885 年左右，人均产出翻一番用了大约 34 年；巴西开始于 1961 年，用了只有 18 年时间；韩国开始于 1966 年，用了 11 年；而中国从 1977 年算起，人均产值翻番仅仅用了 10 年时间。^① 一旦被引入一个落后经济，那么，技术越先进，就能越迅速地提高产出和生活水平。

但是，如果说技术的扩散是第三世界发展的关键，那么，就有必要积极参与到世界贸易中来。那些在二战后摆脱了贫困、建立了现代经济并提高了生活水平的国家，都选择了拥抱资本主义，鼓励外来投资，发展能够在出口市场成功竞争的工业。相反，那些实行了进口替代和与世界体系相脱离的政策的国家，或者那些依赖于诸如生产许可证以及规定价格和工资水平的社会主义控制的国家，均陷入停滞不前状态。

1987 年的世界银行报告，依据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外贸政策偏于“外向型”或者“内向型”的程度，将 41 个欠发展国家或地区分成四种类型。^② 强外向型的国家或地区包括韩国、新加坡和香港；巴西、马来西亚和泰国属于中等外向型国家；

①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1.

② 引自 D. Evans, "Visible and Invisible Hands in Trade Policy Reform" in C. Colclough and J. Manor (eds), *States of Marke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肯尼亚、尼加拉瓜和前南斯拉夫被认为是中等内向型国家；而划归强内向型的国家（其特征为：保护主义盛行，通过限额和许可证管制进口，汇率估值过高）包括阿根廷、孟加拉国、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该报告发现，在 1963—1985 年间，外向型国家的 GDP 实际年均增长平均达到 8%（人均增长为 6%），而内向型国家则仅为 3%（人均增长 1%）。

这一证据表明，最为成功的发展战略便是打开国门，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看来，能够提供增长和繁荣的，不是社会主义计划，而是全球资本主义。韩国与朝鲜，战后的西德与东德，所有这些对比都说明，资本主义发展战略优越于社会主义发展战略。

最明显的例子是香港。在那里，成功的资本主义发展很大程度上奠基于最小政府的古典自由主义原则。^① 香港是一个 400 平方英里的小“城邦”（引号为译者所加——译注），其人口密度是日本的 14 倍以上。香港的自然资源和能源供应均缺乏，甚至连水都需进口。尽管存在这些不利条件，在英国殖民政府的良性影响下，这块殖民地已经发展出兴旺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1970 年代，香港的年均 GNP 增长达到 9%。在 1960—1980 年间，伴随着接近 3% 的年均人口增长，其年人均 GNP 增长达到 7%。20 年间，人口增加了 50%，而实际工资仍

^① 参见 P. Berger, *The Capitalist Revolution* (Aldershot: Wildwood House, 1987) 其它“小龙”的数据亦可从中看到。又见 M. Friedman and R. Friedman, *Free to Choose*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80)。

资本主义

然翻了一番，而且事实上不存在失业。所有这些成就，都要归功于自由放任的政策，没有外汇管制，没有进口关税，没有进出口限制，没有对投资者的特别激励，没有对外来公司的本地参与的控制，没有最低工资法，没有价格控制，只有最低限度的政府商业参与。香港的工业和商业是在真正的自由市场环境里运行的。

然而，即使是在香港，殖民政府也参与到提供综合初等教育（comprehensive primary education）、为大约半数人口提供住房补贴、实行广泛的公共卫生服务等事务中。而且，香港的情况在很多方面还只是例外，因为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在所有其它成功的实行外向型发展战略的东亚范例中，政府都在其中扮演了积极的经济角色。

远东第一个发展迅速的国家是日本，其工业化开始于 19 世纪晚期。1950 年，日本进入快速增长的起飞阶段，年均增长到达 9%，GNP 数字增至 3 倍。至 1970 年，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品生产商之一，国民的生活水平足堪与老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媲美。接下来是韩国，在 1963—1974 年间，GNP 增至 3 倍，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 10%；台湾，GNP 在 1952—1980 年间增长了 11 倍；新加坡，1955—1974 年间的年均 GNP 增长超过 8%。

今天，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显示出同样的迅速发展势头。比如马来西亚，连续 5 年的年均增长都在 8% 以上，现已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电脑芯片出口商和第三大半导体生产商，电子产品已经取代纺织品成

为国家的主要出口商品。^① 这三个最近的成功例子，再加上日本和“四小龙”，共同创造了 1965—1990 年间的平均为 5.5% 的年均增长（人均 GNP）。这一增长率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期增长的两倍，3 倍于南亚和拉美，是撒哈拉非洲国家平均增长率的 25 倍多。^②

在亚洲其他地方，自从 1977 年实际放弃中央计划之后，中国正逐渐成为 21 世纪的主要工业国家。1978 年的农业去集体化，使得粮食产出在短短 5 年内翻了一番；1980 年对工业和商业的进一步解除管制，帮助实现了年均 9.5% 的 GNP 增长。^③

这些国家所共有的东西是什么？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们共享一种广泛的共同文化。这种文化与西方文化很不相同，但同样注重实用和功利主义，强调积极的人生态度、对物质的兴趣、对推迟享受和个人自律的接受。^④ 彼得·伯杰（Peter·Berger）指出，除却儒教的保守性（conservatism of Confucianism）和佛教的来世说（other-worldliness of Buddhism），东亚文化似乎确与资本主义精神具有广泛的相容性，尽管它们很不同于加尔文派的新教伦理（Calvin's Protestant ethic）。主要

① G. Taber, "Growing, Growing", *Time International*, vol. 140, no. 11, 14 September 1992, pp. 20—4.

② World Bank, *The East Asian Mirac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③ Zhao 与 Hall, "State Power"; F.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pp. 1—18.

④ Berger, *The Capitalist Revolution*.

资本主义

的区别在于，新教强调个人主义，而这些国家强调强烈的集体认同以及对特权等级和公共权威的义务。我们将在第五章里看到，较之美国类型的个人主义，这种集体主义也许事实上更适合于现代法团资本主义（modern corporate capitalism）的状况。

但是，并非仅仅用文化就能解释这些国家的成功。它们自1960年以来的表现与它们的政府所采用的政策也有很大关系。除了香港这一惟一的例外，这些国家或地区所拥抱的并非自由资本主义，因为它们的政府在私人部门之外扮演着关键性角色。所有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政府都提供了一个稳定可靠的公共管理以及法律和秩序体系（必须指出的是，这往往是通过非民主的独裁政体）。同样，所有这些国家或地区都采取了一些将增长的好处扩大到贫困群体的措施（例如韩国和台湾的土地改革、新加坡和香港的民众住房补贴项目、印度尼西亚为提高农民收入而扶持稻米价格）。^① 而且，远远不止于此，大多数政府还参与到各种方式各种领域的经济管理中去。

我们应该不会对此感到意外。在第一章中，我们已经知道，英国的工业资本主义，是在国家的支持下获得的。政府不仅在国内提供了一套可靠和坚实的法律基础，而且帮助拓展和保护了海外市场，并推行了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土地改革”（以圈地运动的形式）。德国于19世纪后半期推行的工业化，则是通过树立高关税壁垒，保护自己的新生工业，抵御来自英国制造商的竞争；同时却又允许英国资本货物的进口，以

^① World Bank, *The East Asian Miracle*.

便德国的工厂能够获取最有效率的机械。德国的俾斯麦政府还推行社会保障制度，以支援社会转型时期的贫苦民众；推动土地改革，以打破普鲁士容克地主（Junker）阶级的封建权力。大约同一时期，日本推行始于 1868 年的明治维新，同样借助于国家的力量帮助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封建贵族的封地被剥夺，新的政府企业被建立——建立起来后又卖给日本国民，人们被送往西方去学习新的生产方法，普遍的国民教育体系作为一项“人力资本”投资被建立。

政府支持经济发展的这些早期例子的要点在于，它们顺应资本主义的脾性，而不是反对它。20 世纪的东亚“奇迹”也正是如此。与英国、德国和日本的情形一样，（东亚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以土地改革为先期条件（在台湾和韩国，地主的权力被二战前的日本殖民者剥夺）。所有这些国家或地区还都将它们的工业建立在外来技术的基础上（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均向直接外来投资开放，而日本、韩国和台湾则通过许可证发放换取外来技术的使用权）。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以关键出口工业为目标，授予这些工业自由使用低息贷款的权利，并通过政府出口市场机构、政府资助的研究、政府劳工培训规划、高额保护关税（以抵御对新生工业造成威胁的外来进口）等，对其进一步加以扶持。但是在所有的情形里，政府干预的模式，都以市场的逻辑为导向——它是“亲善市场”（market - friendly）的。^①

^① World Bank, *The East Asian Miracle*.

资本主义

对执行标准的严密监控确保了补贴不会被浪费在无竞争力或者无效率的工业上，国外市场的竞争又确保了这些工业保持有效率。严格的预算规定（包括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平衡预算法）约束了补贴水平的上限，从而防止公共开支极度上涨和排挤私人投资。税收保持低下以便激励投资，而且所有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均不曾受诱使去实行西欧式的综合福利制度。他们没有最低工资法，没有价格管制企图，没有对出口商的破坏性征税，没有将财富从高收入者那里拿来实行再分配的考虑。^① 他们通常也不试图自己去管理工业。他们与私营部门关系密切，但他们通常只是予以促进而不是下达指示，帮助初出茅庐的企业在世界市场上建立竞争优势，而不是将投资推向自己希望增长在那里出现的部门。^②

这种政府涉入的模式与在那些未能发展起来的贫穷国家里所能看到的形成了鲜明对比。东亚战略的精髓在于支持出口导向型增长，强调参与世界市场，乐意接受外来资本——这有助于扩大国内生产，勇于参与与现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商的竞争并

① 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形下，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收入平等，而无需政府的再分配政策。Berger (*The Capitalist Revolution*) 指出，在日本，早期工业化增加了收入不平等，但接着又将不平等水平降至低于英国和瑞典等国的程度，后者一直追求再分配政策，直至最近才改变政策。在韩国和台湾，收入分配从工业化过程的开始就更为平等。

② 也有一些例外情况。例如，在1950年代，日本的国际贸易与工业部试图（不成功地）操纵钢铁、化工和轮船制造领域的新投资，同时，建议索尼公司不要发展晶体管，并警告本田汽车公司不要生产汽车！（参见 W. Kasper, "Firing Up the Little Dragons", *Economic Affairs*, vol. 11, 1990, pp. 21-2）。但是，从那以后，日本和东亚更小国家的政府开始遵从市场信号而不再试图操纵它们。

在他们自己的市场上击败他们。那种主张进口替代的破产了的发展战略迷惑了如此之多的拉美、非洲和南亚国家，但是在东亚很早就被驳斥过了。

有迹象表明，一些贫穷国家开始吸取这些教训。印度，多年来一直推行自给自足的经济战略，禁止外来投资，采取由中央计划的工业化、对贸易实行严厉管制。这一战略导致了1991年的经济危机，增长陷入停滞，通货膨胀严重，预算赤字增至GNP数字的9%。此后，税金开始减少，工业许可证被废除，外来投资得到鼓励，货币实行半自由兑换。至1994年，外汇储备增至130亿美元，通货膨胀降至单位数，年均增长恢复到4%，可口可乐出现在德里的街头货摊。^①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诸如巴西、智利和阿根廷等，现在也开始抛弃孤岛式的经济战略，并取得良好效果。在非洲，赞比亚和坦桑尼亚等国家，摆脱了后殖民时代的社会主义模式，开始私有化一些国有工业，甚至成立了证券交易所。

似乎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证明，东亚资本主义国家自1950年以来所取得的非凡成就不能为今天的其他国家所仿效，尽管1993年的关贸总协定（GATT,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使得对新生出口工业的保护在今天比在过去更为困难。日本和“四小龙”的成功证明，资本主义能够在今天的世界不发达国家激发出迅速而激动人心的增长，正如它在两百年前的欧洲释放出空前的生产力一样。但是，只有政府愿意，它才能

^① 数据选自 *The Sunday Times*, 13 March 1994。

资本主义

够做到这一点。战后第三世界发展的主要障碍，不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特性，而是一些第三世界政府无能或者不愿去利用这一体系所提供的机会。

第三章 资本主义与环境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是一部增长机器。资本主义生产商之间的竞争激励了不断的创新。其结果是，诸如食品、衣物之类的基本资源被以不断降低的成本大量地生产出来，而新的奢侈品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变得稀松平常。平均生活水平就这样不断得到改善。在世界范围内，尽管总人口数有所上升，但人均收入还是提高了。似乎我们已经掌握了炼金术士的秘密，知道如何将贱金属变成黄金。

然而，在 20 世纪的最后 1/3 时间里，出现了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在这种批评看来，表明上不断增长的“秘密的发现”，对于人类来说是一场灾祸而非福音。从“深绿”运动^①的片断中可以找到这一批评的最清楚的表达。它承认，现代资

^① 并非所有的绿色组织都批评资本主义，我们在后面将看到，他们中的一些相信，市场机制和私人产权能够被用来解决环境问题。在这一章里，我将对“深绿组织”与“绿色资本主义者”做出明确区分，前者试图通过反工业化和超越资本主义来解决问题，后者则寻求在现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框架下解决问题。

资本主义

本主义的确是一部增长机器；但是却争辩说，这正是资本主义的错误所在。它追问到，如果地球已经危险地陷入过度拥挤，一个能够支撑大量人口增长的体系的好处在哪里？在发达国家的现有工业生产水平已经耗尽了世界能源供应的时候，让第三世界国家去跟随一条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道路又有什么意义？当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已经接近崩溃的临界点，又怎么能够允许资本主义继续去扩张和增长呢？在新技术已经将我们带到全球毁灭的悬崖边上的时候，我们又怎么能够容忍资本主义对技术创新的持续追求呢？

增长的环境限度

经济发展总是涉及到自然环境的变化。但是在过去两百年里，发展的步伐已经加快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改变。

变化的一个方面，是我们增强了对自然环境的控制力。两百年的工业资本主义已经控制和驯服了自然，并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好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不再遭受饥荒、瘟疫、洪灾、旱灾以及其它意外自然事件对生存的威胁，第三世界的死亡率也有引人注目的下降。相较以往，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环境已经变得易于控制。

但是另一方面，现在的自然似乎比以前更具有危险性。我们对自然的控制力越强，所引起的环境变化就越大，其结果也就越不可预测。我们以我们不能充分领会的方式改变了自然；

随着改变的步伐加快，我们的行动的影响也更为显著，因为生态系统无法及时做出调整以适应两百年来工业化所带来的所有变化。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引发了多少危害，有多严重，消除它需要多长时间。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回报然而高风险的时代。

深绿运动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指出，这种以世界的未来为赌注的冒险是不值得的，因此，现在必须以一种全然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来取代工业资本主义，这一新制度基于一套很不同的价值：

我们目前的工业生活方式走的太远了。这不是一个逐渐接近深渊的问题；我们每天都在深渊中下沉……这不是辞退一个两个人的问题，我们应当抛弃整个怪物^①

按照这种观点，西方对增长的继续追求，再加上欠发展国家追慕西方生活水平的愿望，只会导致全球性的灾难。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的 1987 年报告（布伦特兰报告，Brundtland Report）指出，欠发展国家要达到发达国家的现有生活水平，需要耗费 5 倍于现有水平的能源，而甚至 1 倍的能耗

^① J. Porritt 与 D. Winner, *the Coming of the Greens* (London: Fontana, 1988), p. 233。

资本主义

增加都将导致全球变暖和酸雨的严重危机。^① 很多绿色运动组织暗示，即便西方同时推行实质性的限制工业化措施，全球生态系统也只能承受有限的第三世界发展。^②

就这样，资本主义遭受谴责，不是因为它无法改善生活水平，而正是源于它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资本主义在 20 世纪末的胜利被证明是一个尴尬的胜利，因为它做的最好的——刺激快速增长——正是世界无法再承受的。显而易见，我们地球的未来正遭到过度承载的人口、正在融化的冰极、日益增加的皮肤癌、衰减中的资源以及被破坏的生态系统的威胁，而这些绝大部分是或者说全部都是资本主义在成功制造经济增长时的副产品。

怀有善意的人们都不希望看到这种威胁的到来，绿色组织因此竭力寻求愿意接受他们的理念的听众，尤其是年轻人。绿色理念仅仅含糊地被人理解，却得到人们广泛的认同，因为从正在威胁地球毁灭的活动里退回来，似乎不过是个常识。绿色议程似乎是“超越政治”的，是件明智的人们都不大可能去反对的事情。环境教育课程甚至出现在今天的初等学校里，很多教师显见对绿色运动抱持同情态度。^③ 然而，这一议程带有很深的政治性。绿色组织促使我们认同一些政策，这些政策将导致我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显著改变。所谓的“深绿”，

①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the Brundt - land Report), *Our Common Fu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② 参见 L. Martell, *Ecology and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p. 44.

③ Porritt and Winner, *The Coming of the Greens*.

尤其寻求权力去控制、管制、限制、禁止甚至颠覆技术的发展，这些技术进展在过去使得经济增长成为可能。他们试图埋葬维多利亚时代的进步信念，并鼓励一种对待未来发展的鲁莽态度。他们热衷于回到过去，而非继续向前。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增长机器代表了一个由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英国女作家玛丽·雪莱（1797—1851）所著小说中主人公，系一生理学家，从部分死尸器官中创一怪物，但结果自己被怪物所毁。——译注〕所造的怪物，强大，不受控制，具有破坏性，无法克制。他们忠告说，我们不应去庆祝它，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庆祝万国博览会一样；相反，我们应当消灭它。尽管不是所有的绿色组织都从原则上反对资本主义，但是绿色项目的许多方面都的确代表了对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一些最基本特征的根本挑战。

存在环境危机吗？

绿色组织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涉及多个松散关联的论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包括世界人口增长、资源枯竭、污染与废物处理、伴随工业活动的增加而出现的地球变暖与臭氧层破坏。这些问题中，有些被证实是真实存在的问题，而另一些却不是。

据估计，1900年，世界人口总数为16.30亿，其中的大约

资本主义

1/3 生活在“发达”的工业国家。^① 至 1950 年，这一数字上升到 25.16 亿，仍有大约 1/3 生活在发达国家。但是，到了 20 世纪后半期，欠发展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开始超过发达国家。有人预测，2000 年的世界人口总数将达到 60 亿以上，其中的 80% 将生活在第三世界国家。据布伦特兰报告的进一步预测，依照目前的增长率，2100 年的全球人口将达到 80—140 亿，其中的大约 6/7 将会生活于贫穷国家。

第三世界不断攀升的人口增长率，一直是绿色运动自从 1960 年代出现以来的主要关注议题。当时的担心是，地球将无法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但是，正如事实所证明的，新的农业技术的引进，使得谷类食品产量的增长要快于人口的增长，其结果是，只是在那些发生洪灾或者内战等不幸事件的第三世界国家，才会出现饥馑。

然而，资本主义已经证明自己能够养活人类的事实，并没有减少绿色组织对人口增长的关注。相反，实行严厉人口控制的理由，从食物短缺的威胁转移到更为广泛的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在 1987 年的布伦特兰报告中作为世界经济和环境发展战略的标准而提出来的。其基本原则是，当代人在满足自己需求的同时，应当为其下一代留下不少于从上一代那里继承下来的自然或人造的遗产。根据布伦特兰

^① D. Pearce, E. Barber, A. Mardandya, S. Barrett, R. Turner and T. Swanson, *Blueprint 2: Greening the World Economy* (London: Earth - scan Publications, 1991).

报告的说法，目前的人口增长率飞涨是违背这一原则的，因为对自然环境造成了巨大损害。我们不负责的过度生育将会给子孙后代留下灾难。

该报告指出，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工业生产增长了 50 倍，其中的 4/5 的增长是自 1950 年以来取得的。假如第三世界国家力图追赶西方，我们可以料想，在未来的年代里，工业化增长将会更进一步。即便世界人口保持在稳定水平，这也将意味着污染和能源损耗大量增加；而再加上世界人口按其实际状况的增长，对地球资源的需求将变得不堪承受。由此可以断定，如果世界人口继续增长，可持续发展将沦落成为一个空想。该报告因此强调，在问题最为严重的第三世界，必须采取“紧急措施”，限制人口的未来增长。

然而，绿色运动中的较激进者却走得更为遥远。一些“深绿”组织将人类生命比做再造和接管世界的病菌，主张采取严厉办法去“治愈”它。甚至在人口规模保持不变的英国，绿党于 1980 年代主张立法限制生育权利；许多绿色组织显然相信，国家的人口需要减少一半。^①当然，这样戏剧性的缩减，只有通过高度强制的办法才能实现，因为即使在毛泽东主义的专制中国，尽管强行要求一个家庭只能生一个小孩，却也没有能够减少人口。意识到这些问题所在，“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的一个领导人物提出一个赫胥黎想象式〔阿尔都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天演论》的作者老赫胥黎的孙子，生物

^① Martell, *Ecology*, p. 49.

资本主义

学家，于 1932 年出版《美丽新世界》一书，描绘了一个人在其中从出生到死亡都遭受控制的非人性社会，在这个“新世界”里，人类为垄断基因工程技术的商业公司和政治人物所统治，这种统治从基因和胎儿阶段就开始了。——译注）的建议，主张国家发放小孩生育许可证作为解决办法：“除非父母手持政府的许可证，否则生小孩（应当）被视为该罚的犯罪……所有潜在的父母（都应当）被要求使用避孕药，而由政府决定市民是否生育小孩。”^① 这样的极端措施建立在如下的理由之上：地球正危在旦夕，因而采取非常措施是必要的。抱持幻象的激进主义者乐于根据目标调整手段，这在历史上并非第一次。

减少人口的强烈主张与绿色议程中的第二项有关，那就是减少自然资源的使用。早在 1972 年，罗马俱乐部（the Club of Rome）出版了一个报告，预测说一些至关紧要的原料行将枯竭。天然气的世界存储量将于 1994 年耗尽，原油的用完期限是 1993 年，铜和铅是在 1993 年，等等。无论他们的计算机模型做的如何精致和巧妙，工业资本主义似乎注定还是会在下世纪存在。^②

正如早先对食物短缺迫近的担忧，罗马俱乐部关于资源枯竭的担心很快就被证明是缺乏根据的。报告指出临近衰竭的资

① 引自 D. Ray, *Trashing the Planet* (Washington, DC: Regnery Gateway, 1990), p. 169.

② 参见 Martell, *Ecology*, p. 27; also *The Sunday Times*, 17 July 1994.

源在今天比在它被写的时候还要丰富，这反映了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非凡的适应性。例如，能源短缺的前景抬高了石油和汽油的价格，这就驱使企业去探索新领域，开发新的提取技术，发展替代品，以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今天，没有人再会去谈论基本原料的衰竭。

绿色组织相应地转而关注遭受威胁的其他资源。引起特别注意的资源之一，是亚马逊河流域的热带雨林。这里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热带雨林，覆盖了超过 10 亿公顷的土地，但是目前正以每年大约 850 万公顷（或者大约 1%）的速度消失。据估计，很大程度上由于巴西养牛牧场主的侵入，超过 400 万公顷的热带雨林已经消失。^①

雨林之所以被认为对地球生态重要，源于两个理由。首先，它们将二氧化碳转化成氧气，因而有利于抑制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增加。其次，它们被认为是数以百万计的迄今尚未被发现和归类的动植物物种的栖息之地。随着森林的消失，物种也就（据推测）相应地消失了，我们也就相应失去了迄今尚未能利用的药材和疗法的潜在资源。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UN Environment Programme）的 1994 年报告估计，如果这一消失速度持续下去，在未来的 25 年里，很可能将会有 2%—8% 的世界物种趋于消亡。又据地球之友，每 30 分钟就有一个物种

^① Pearce et al., Blueprint2。这些估计数据非常粗糙，引起了广泛争议。但是，仍然值得引用同一起来源的另一个估计：1980 年以来所消失的森林有 35% 可以被视做巴西政府怂恿（减税，种植补贴、出口补贴）其农场主的结果。对于雨林问题，政府应当与世界市场承担同样的责任。

资本主义

消失。然而，正如罗伯特·维尔兰（Robert Whelan）所指出的，在我们甚至尚未首先搞清楚有多少物种存在的时候，就试图去估计其灭绝率，这有一种艾丽丝仙境游记（Alice in Wonderland）的味道。^①

但是，对世界森林的威胁不仅仅来自亚马逊河的推土机。在欧洲一些地方，酸雨被认为是杀死黑山林（Black Forest）和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部分地方的树木以及毒害湖水杀死鱼群的罪魁祸首。而酸雨的降落相应地被一些科学家归咎于二氧化硫在大气中的合成，而二氧化硫则是燃煤发电所散发出来的硫磺的结果。^②

这只不过是绿色组织所关注的第三个领域的一个例子，这一领域就是将废品处理到空气、海洋或地面所引发的自然污染。绿色组织争辩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对盈利性和成本效率的强调导致了对废品处理问题的漠视。私人利润被置于公共利益之前，对眼前利益的期望听任对未来危险的无视。

例如，石油公司想卖掉更多的石油，汽车制造商想卖掉更多的汽车，但是二者都不去考虑有害的汽车尾气排放量的增加以及汽车高速公路对乡下地方造成的损失。在许多世界城

①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Environmental Data Report 1993—94*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4); R. Whelan, *Mounting Greenery* (London: Basil Blackwell, 1994); R. Whelan, *Mounting Greenery*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89).

② 但是，硫的排放、酸雨与森林死亡的关联从来没有被证实过，科学家群体中有种观点近来影响越来越大，认为黑山林问题可能更多地与臭氧增多有关，而非落雨中的酸度所致。

市——洛杉矶、墨西哥城、雅典——汽车尾气排放形成了有毒烟雾，导致了支气管疾病的增多，但是制造商持续不断地制造出更多的汽车。

为了招徕顾客，制造商竞相为其产品用上奢侈浪费的包装，或者生产出用后即可扔掉的所谓“便利”产品（比如一次性尿布），其结果是垃圾堆积成山，而且许多都是即便埋在地下多年都无法自然分解。无法降解又无法循环利用的垃圾的处理，已经成为今天的一个主要问题。然而，每一年，每个美国人仍然平均制造出半吨的垃圾。

农场主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向庄稼上喷洒有毒的杀虫剂，给土地施撒硝酸钾。但这些化学制品接着就渗到自来水里，污染河流和地下蓄水层。许多世界河流都因大量的工业污水排入而遭受污染，结果导致河流表面漂浮一层化学粘液泡沫，水中鱼儿绝迹。沿着北洋（North Sea）和地中海海岸的海水浴场亦已遭受严重污染，以至于在那里游泳都变得有害健康。

在绝大多数这些情形下，对环境的损害一直都在持续。这一危害是一个竞争的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果，在这一体系中，生产商不断寻求扩大市场和降低成本，却无需考虑他们所造成的污染。大体上讲，污染费用不会出现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甚至也不会出现在政府账目上，因为这些费用很少详细列举，也很少以货币价值的形式表现出来。据新经济基金会（the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的估计，在英国，每年由团体所造成的空气和水污染折合的“外部成本”合计达 210 亿英镑以

资本主义

上，相当于 GDP 的 6%，^① 但是这些费用在资本主义会计实践中通常都是忽略不计的。

绿色组织所关注的第四个——也是目前最为紧迫的——领域，与地球大气的两个潜在的灾难性变化有关。第一个是全球温度的显著上升，据说这是由矿物燃料的燃烧所导致的所谓“温室效应气体”的散发量增加引起的。第二个是两极上空的臭氧层出现臭氧“洞”，这要归因于冰箱、空调、烟雾剂喷射器中所使用的氯氟烃类化学物质（CFCs）的散发量增多。

如果所言属实，那么这两项都是极其严重的。绿色组织警告说，地球变暖将导致南极东部的冰顶融化，使得海平面提升 6—7 米，因此将淹没各大陆上的大片底陆地区。英国环保组织“诺亚方舟”（Ark）于 1989 年做出预测，至 2050 年，东部海岸城镇格里姆斯比（Grimsby）、大雅茅斯（Great Yarmouth）和赫尔（Hull）都将被淹没于水下。^② 同时，臭氧层的破坏将使我们暴露于有害的太阳辐射下，因而导致皮肤癌的急剧增多，并可能危及农作物。

然而，正如绿色议程所关注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人们对于据以提出这些预言的证据存在着激烈争论。以地球变暖为例，没有人否认，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其它“温室气体”的含量急剧增加，增量已经高达 50%。^③ 但

①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Measuring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 (London: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1994).

② *The Sunday Times*, 27 March 1994.

③ 参见 Ray, *Trashing the Planet*, 对这一证据做出了全面回顾。

是，对于如下一系列问题，却存在着广泛的争议：是否地球变暖正在发生？如果是的话，是否二氧化碳的增多导致了这一温度升高？所有这些又有什么要紧？

众所周知，有关全球温度随时间变化的数据资料是不可靠的，因为绝大多数观测点都在城市地区，那里的温度要高于地球表面的其他地方。来自麻省理工学院（MI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研究者的一项对海洋温度的研究表明，在 1856—1986 年间，温度没有明显升高。一项完全基于美国乡村量测站的研究则发现，1920—1990 年期间，平均温度下降了摄氏 0.15 度。而据卫星数据显示，在 1979—1992 年间，平均全球气温只有微小上升（仅仅摄氏 0.1 度）。^① 就我们所能告诉的而言，全球温度似乎在 19 世纪晚期有所下降，在 1900—1940 年有所上升，1940—1965 年重新下降，从那以后出现了急剧上升。从整个 20 世纪看，平均温度的升幅不大可能超过摄氏 0.5 度。^②

如果气温的确在升高，却也没有明显证据证明它是由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增加而引起的。1992 年，世界领导人聚集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一致同意应付地球变暖的威胁，决定将 90 年代末的碳排放量控制在 1990 年的水平；1994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研究小组提供的报告认为，这

① R. Bate 与 J. Morris, *Global Warming: Apocalypse or Hot Air?*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94)。

② R. Balling, "Interpreting the Global Temperature Record", *Economic Affairs*, vol. 14, 1994, pp. 18—21. See also Ray, *Trashing the Planet*.

资本主义

一目标还不够，要想使世界气候保持稳定，需要将碳排放量进一步降低 60%。^① 但是，一些科学家认为，二氧化碳的合成几乎不影响世界气候，因为它会触发反馈机制，重新实现均衡。而且，如果的确是二氧化碳的合成引发了地球变暖，那么，根据绝大多数电脑模型，温度应当会出现大幅度升高，而不是如实际上所发生的那样。^② 一些科学家开始推测，与二氧化碳的合成相比，温度起伏也许更多地与火山爆发或者太阳黑子活动性有关。^③

即便温度的确有所上升，也无需如此大惊小怪，以致于要通过工业活动的大幅度削减去克服它。如果温度升高 2 摄氏度，也不过是恢复到公元 1200 年的平均温度水平。这可能给有些地区带来损害，比如美国的作物地带；但是会有利于其他地区，包括墨西哥、印度和非洲，在那里，降雨增多有益于农业。^④ 而且，即使南极冰山开始融化（目前实际上冰山在扩展），要使海平面升高 6—7 米，也会另需 6000 年时间，而不是“方舟”组织在 1980 年代末所预言的两代人时间。^⑤ 目前，海平面的上升速度是平均每年不过 1.8 毫米。

① Report in *The Independent*, 25 July 1994.

② Ray, *Trashing the Planet*; Bate 与 Morris, *Global Warming*; 又参见 *Nature*, 27 January 1994.

③ 参见 Ray, *Trashing the Planet*, On 7 April 1994, *The Independent*。报告说，据对北爱尔兰 1795 年以来的气象记录的研究发现，气温与日照活动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④ R. Lewis “Global Hysteria”, *Economic Affairs*, vol. 11, 1991, pp. 4—6.

⑤ Ray, *Trashing the Planet*.

因此，对地球变暖的担心实在有些杞人忧天。一些科学家相信，臭氧层破坏问题，其实也是如此。

南极上空臭氧层中的一个“洞”于1985年首次为人们所发现，1989年，另一个“洞”被发现偶尔出现于北极上空。但是从那以后，人们已经明白，臭氧层的厚度随着昼夜变换和季节的不同而自然波动，太阳照射越强烈，所产生的臭氧越多。^① 在南部地区冬末的几周里，南极上空的臭氧“洞”有规律地出现，直到更为强烈的阳光制造更多的臭氧。这个洞在有些年中较大而在另一些年里较小（例如，1988年的大小不到1987年的1/5）。^② 因此，决不能认为臭氧层厚度在逐年减少。

同样不能认为是氯氟烃类化学物质（CFCs）应该对臭氧层破坏负责。我们知道，氯的确会破坏臭氧，其原理在于，大气中的氯氟烃类化学物质散发出氯化合物，因而破坏臭氧层。但是，认为是氯氟烃类化学物质导致了损害的证据，是站不住脚的。世界CFCs产量在1980年代达到年均110万吨的最高值。与之相比，海洋每年蒸发出3亿吨的氯；在过去一百年里，埃佛勒斯峰（Mount Erebus，喜马拉雅山主峰之一，中国称珠穆朗玛峰。——译注）每天有1000吨的氯散发出来；1976年，单单一个阿拉斯加火山（Alaskan volcano）的爆发，就向大气中喷涌出2890亿公斤的盐酸（较世界每年生产的氯和碳氟化

① 这构成了对如下观点的支持：如同地球变暖问题一样，臭氧层的波动起伏可以归因于太阳黑子活动性。——见Lewis, “Global Hysteria”

② Ray, *Trashing the Planet*.

资本主义

合物的总量的 570 倍还要多)。^① 就如地球变暖, 臭氧层也一样, 人类活动对大气产生的影响与自然力量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

然而, 尽管有这些疑问, 还是有超过 50 个国家的政府于 1988 年签订了蒙特利尔协议 (Montreal Protocol), 要求发达国家至 1998 年将它们的氟氯化碳 (CFC) 产量减少 50% (后来增加到 85%) 对欠发展国家的限制则稍宽。美国和欧盟随后宣布, 至 2000 年将彻底禁用 CFCs。这就迫使发展出更为昂贵而且往往效率不高的替代品。

禁止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担心其 (大量白皮肤的) 民众中恶性黑素瘤的发生率升高。但是, 逐步淘汰 CFCs 的最为主要的代价却落在了第三世界头上。在热带地区, CFCs 通常可以既便宜又有效地用于制冷设备以便存储食物和药品; 同时由于只是简单化学制品, 它们可以在当地容易地制造出来。而替代品效果不好, 还往往有毒 (因而对操作它们的人的健康构成威胁), 而且只有经大的西方化学制品公司许可后方能制造 (这又使得它们更昂贵)。因此, 关于臭氧层的国际行动给那些难以为继的国家增添了新的负担。

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 表明 CFCs 会导致大量危害, 如果危害存在的话。虽然臭氧层的确有助于保护我们免受来自太阳的紫外线的伤害, 但是据测量显示, 海平面的紫外线 B 近年来在以每年 0.5%—1% 的速度下

^① Ray, *Trashing the Planet*.

降，美国城市中的紫外线强度在 1985 年要低于 1974 年。^① 很难看出，这些数据如何会与 CFC 排放导致了西方国家皮肤癌发生率的增多的声称相一致。

环境政策的代价

显而易见，绿色组织的主张往往有些夸大其词。早在 1960 年代，认为地球将无法养活日益增长的世界人口的观点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1970 年代，世界自然资源很快就会枯竭的预言亦已被证明是一派胡言；近年来，有关地球变暖和臭氧层破坏的宣称更多是基于武断的断言，并以厄运和灾难已经迫在眉睫的极度夸张的预言加以修饰，而非通过提出确凿证据去合理证明。

尽管如此，选择谨慎稳妥难道不是聪明的做法吗？即便地球表面的金属足以维持一亿年^②，注意保存自然原料并使之能够再生，难道不是很明智吗？尽管我们不知道二氧化碳的合成是否导致地球显著变暖，但是限制碳的散发难道不是稳健慎重的做法吗？即便我们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即便臭氧层厚度的波动与 CFCs 产量无关，但是限制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的增长和禁止生产 CFCs 难道不是个好主意吗？难道我们不应当利用政府的力量——只要我们能够——去限制和减小经济和技术发展

① Ray, *Trashing the Planet*.

② 这是 Lewis 在“Global Hysteria”中做出的估计。

资本主义

所无可避免地带给我们的风险吗？安全可靠不是更好吗？

这种反应存在一些问题。一个问题是，每一项新的禁令或者管制都是有代价的。^① 为防止酸雨而为发电所的烟囱配置洗涤器，增加了发电的费用，正如禁止 CFCs 生产增加了非洲医院制冷药物的费用一样。环保主义者常常争辩说，如果为环境资产——诸如干净的雨水和厚密的臭氧层——适当支付费用，那么这些政策将被证明有利于而非伤害一个国家的财富。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而且正如我们将会在后面看到的，的确有可能找到一个为环境产品支付费用的合适办法，在做出决定的时候适当斟酌这些环境产品的益处。但是，基本要点仍在于，当政府决定对经济活动予以禁止、限制或者施加影响的时候，它们的政策不是没有代价的。环境政策总是涉及到交易，或者经济学家所说的“机会成本”。花费在烟尘滤涤上的每一磅钱，都会丧失将这一磅钱投向某一潜在获益活动所可能产生的收益。事情往往是，将钱花费在环境上并非是最好的。^②

不仅环境管制有成本，而且这一成本常常是转嫁到那些最不具备承受能力的人身上。我们已经看到，对 CFC 生产的禁令如何最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但这并非是仅有的例子。当美国

① D. Pearce, A. Markandya 与 E. Barbier, *Blueprint for a Green Economy* (London: Earthscan Publications, 1989).

② 一个相关的事例是，为了满足欧盟水质标准，大量的资金被投入。去除饮用水中的最后些微硝酸盐或者铁的边际成本，几乎肯定要超过由可能的健康风险的减少所带来的边际收益——参见 M. Carney, “The Cost of Compliance with Ever Higher Quality Standards” in T. Gilland (ed.), *The Changing Water Business* (London: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Regulated Industries, 1992)。

的绿色组织以污染环境为由，设法促成对狄氏剂（一种杀虫剂——译注）生产的禁止的时候，他们也就成功地剥夺了非洲农场主使用这一有效的化学药剂去喷杀蝗群的机会。^① 当绿色组织阻止了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水坝建设时，他们也就成功剥夺了当地人民的用电权利，并因而阻延了其提高生活水平的机会。当绿色组织成功地促使政府强制限制碳排放量的时候，他们的行动无可避免地阻碍了第三世界国家的重工业发展，并因此削弱了这些国家对西方国家的竞争力以及改善本国民众生活水平的能力。

环境政策还会为子孙后代带来代价。这似乎听起来很奇怪，因为明明总是那些绿色组织宣称其政策设计正是为了保护子孙后代。例如，布伦特兰委员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就是为了确保每一代人所遗留的世界资源不少于上一代人；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应当耗尽有限的资源，而应当减少我们对自然环境的欲求。

但是，思考之后可以发现，工业资本主义所成就的，往往正是布伦特兰报告的作者们宣称所需要的，因为在过去的两百年里，每一代人都为后一代人存留下了更为丰裕的遗产。正是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以及利用它们创造财富，才有了所有这

^① Whelan, *Mounting Greenery*.

资本主义

些成就的获得。^① 正是通过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发现了前人没有发现的资源，找到了前人没有找到的资源替代品，发展出了较前人更节约也更为有效的资源利用方式。

比如，我们可以思考蒸汽机的发明。在第一章里我们已经知道，蒸汽机的发明引发了工业革命。在发明蒸汽机之前，由于无法排解地下深层煤层的水，煤的供应一直受到限制。蒸汽机的发明解决了这一问题（借助于水泵将水从煤层抽出来），同时，由于蒸汽机被用于棉纺、铁路运输以及其他新型用途，也就相应提高了煤的需求量。假如当时有绿色组织来访，他们无疑会警告说，这项新技术的广泛采用将会迅速耗尽煤的供给，进而损及子孙后代。实际上，在 1865 年，一位名叫斯坦利·杰文斯（Stanley Jevons）的经济学家确实发出了类似警告。在他看来，在未来年份里，由于生产扩大将引发对燃料的需求增加，工业化注定要因煤的短缺而失败。他预测说，煤的需求量将会从 1865 年的 8 千万吨增至 1960 年的“无法承受”的 26 亿吨。

但是，实际发生的情况是，首先，煤的需求量增加提高了采矿投资的吸引力，因而更多的煤矿被开发出来；第二，随着

^① “显然，资本主义创造出了较它所消费的更多的价值和资源，这正是它创造出财富的原因。”（K. Jeffreys, “Free Market Environmentalism: Can It Save the Planet?”, *Economic Affairs*, vol. 14, 1994, p. 9）。正如 Jeffreys 所指出的，留给将来的至少不少于我们从过去所继承的，这一目标只能意味着，要么什么都不要动，要么开发资源创造出更多的财富。Whelan 得出同样的结论“所能提供给子孙后代的最好办法，便是开发资源而非储藏它们”（*Mounting Greenery*, p. 29）。

时间的推移，蒸汽机变得更有效率，可以使用更少的煤生产出更多的能源；第三，能源需求量增加产生了一个强大的经济刺激，促使企业家和探索者去发现动力机械的替代方法（特别是电力和石油）。杰文斯的令人沮丧的预言完全是错误的。目前，英国每年的煤消耗量只有 1.2 亿吨（不到杰文斯预言的 5%），每年所消耗的能源总量——折合成等量的煤——也只不过 3.4 亿吨。^①

技术决定论？

在一个资本主义市场社会里，如果对某种物品的需求上升，或者供给减少，就会在上涨的价格上反映出来。价格上升相应地驱使生产商去扩大生产（例如将以往的“不经济的”未加利用的煤、石油或者天然气田投入能源生产），提高效率（例如通过制造节能机器以及改善绝缘条件），以及寻求替代品。市场体系就这样保持自身的反馈机制。实际上，市场体系非常类似于生态系统，因为两者处于对变化的环境的永久性适应之中，这一适应是在无意中实现的，没有一个总体方向，没有来自上面的控制。

作为两百年工业化的一个结果，今天的世界资源较以往更为丰富。而且，新技术的发展（例如生物技术、激光技术、电脑应用软件）意味着，现代工业所使用的原料往往少于过去

^① Whelan, *Mounting Greenery*.

资本主义

(例如, 纤维光学电缆和卫星通讯极大地减少了对铜的依赖); 它们使用供给更为充足的材料 (电脑芯片的原料, 硅, 是从沙里发现的, 而沙子可以无限供应), 它们制造的污染更少 (资本主义国家越繁荣, 它们的工业越是“亲善环境”)。

绿色组织以往的如此之多的悲观预言都没有应验, 一个主要原因在于, 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已经克服了所提到的那些问题。然而, 尽管如此, 许多绿色组织仍然对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的“技术决定论”持有深深的怀疑, 他们宁愿选择政治施压或者自愿采用经济紧缩方案的道路。他们的主要反对理由再一次涉及到风险因素, 他们争辩说, 以往的技术解决手段的发现, 并不能保证未来也能找到适当的解决方案。^①

所有人类活动都必然会面临风险, 因为我们永远无法确知结果。绿色组织对这种不确定性的反应, 是争辩说我们必须确保避免最坏的结果。也许地球变暖没有发生, 但如果发生的话, 就会导致严重后果; 也许 CFCs 没有破坏臭氧层, 但如果在破坏的话, 我们在将来就要遭受痛苦; 也许新技术能够找到解决世界人口持续增长所带来的许多问题的办法, 但如果找不到, 就意味着当前的人口增长率是灾难性的。那么, 趁还有时间, 现在就动手解决这些问题, 当然要比等到悔之晚矣时好。正如一位绿色组织的评论员所言:

我们必须好好想想即将面临的每一个和所有的严

^① 参见 Martell, *Ecology*, pp. 72—75 关于这一争论的概要。

重问题的解决办法。着手推动社会改造，建立健全不会产生任何这类问题的价值和组织，难道不是更为明智和安全吗？^①

这种观点存在三个缺陷。第一，它为工业资本主义设置了一个根本不可能跨越的栏杆，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我们无法预知，什么样的技术在将来可资我们利用。我们只能说，过去绿色组织所预言的灾难迄今已为技术的发展所避免，资本主义自身具有天生的创新动力，对于构成对我们将来的威胁的所有问题的研究目前一直处于顺利进行中。^②

第二，如果我们允许风险的最小化成为我们最重要的关注点，那么所有的创新、探索和试验——它们将有益于子孙后代——都将遭受损害。我们是最先认真考虑是否应当中止经济和技术沿其既定轨迹的发展的第一代人，这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所谓“后现代”时期的一个独有特征。很难认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在回顾历史的时候会对我们这一缺乏勇气的行为表示感激，这正如假如我们的祖先决定不去开发煤矿或者探索新疆域，我们不会感激他们这样做一样。放弃对经济发展的追求，并不比允许它自由盛行显得更负责任。那么，是什么因素使得

① 参见 Martell, *Ecology*, p. 74。

② 甚至连看似巨大和棘手的地球变暖问题都可能解决办法。不仅对无碳能源比如风场的研究在持续进行，而且有可能通过某种途径降低目前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例如，通过增加海洋铁含量，以刺激能够吸收二氧化碳的海藻的生长，待其死亡后沉于海底。

资本主义

我们如此确认，现在是放弃接力棒和赛跑的时候了？

第三个缺陷也许最为严重。许多深绿思想似乎简单地认为，只要来一个“价值和结构”的根本改变就一切 OK 了，没有问题了，万事大吉了。为了避免现在的环境问题，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彻底改造社会！这不仅回避了改造如何发生以及作为改造的结果将出现怎样一个社会的问题，而且暴露出令人恐惧的幼稚，以为无需费力，这个新的乌托邦就将克服我们的问题。^① 就像他们之前的激进社会主义者一样，今天的激进绿色组织希望通过痛斥和尖声抗议将我们拖入圣洁的伊甸园（the Garden of Eden），却不曾让我们瞥一眼问题的另一面都有什么。

摧毁资本主义

显然，单靠自身力量，资本主义无法处理它所引发的所有环境问题。资源损耗问题常常可以通过价格上升的市场机制得以解决；只要有钱赚，新技术就常常被用来清理旧技术所遗留

^① 在有关激进深绿思想的另外一篇富有同情心的讨论中，对那些相信绿色目标可以通过一个分散的、自愿的和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的团体运动得以实现的人们，Martell (Ecology) 提出了一个无可辩驳的批评。基本的问题在于，如果没有一个集中统筹的权力，就没有什么办法迫使每一个团体参与绿色活动。这就意味着集中化权力的使用是实施有效的绿色政策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条件——但是这就带来对那些没有参与新的节俭苦行运动的人们实行国家高压统治的危险。当然，这种进退维谷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社会主义者的作品中已经得到反映。当时，既要实现革命性的社会变革，又要避免极权主义的政治形式，为了调和这两种愿望，一系列尝试被做出，但终究归于无效——参见 P. Saunders “When Prophecy Fails”,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22, 1993, pp. 89 – 99。

的混乱。但是，被绿色批评家所指出的其他问题呢？在不存在促进创新的价格刺激、企业家不太可能赚取利润的地方资本主义体系又该如何应对环境问题呢？

许多环境问题，要想得到处理，似乎需要政府的乃至政府间的行动，因为资本主义企业似乎不情愿或者不能够自己去解决问题。很多经济学家逐渐认识到，并非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留给市场处理。

1833年，威廉姆·福斯特·劳埃德（William Forster Lloyd）写了本小册子，讨论圈地运动之前英国村庄公地的过度使用问题。他的论点是，当牧场是向所有人开放的时候，每个牧人基于自身利益，都尽可能多地将牛群赶到那里。这是因为，对于单个牧人来讲，每在自由牧场上多放牧一头牛，所带来的收益大大超过自由牧场因质量的轻微下降所产生的成本。但是这相同的逻辑适用于所有的养牛者，其结果是，牧场很快损耗殆尽，所有的牧人都无法再得到什么。即便意识到这种危害，牧人们也不会让自己的危险行为有所节制，因为如果一个人减少了自己放养在牧场上的牛的数量，收益就会被那些不这样做的牧人占走（博弈理论家称之为“自由骑士问题”）。正如哈丁（Hardin）在他的对劳埃德敏锐洞见的讨论中所解释的：“每个人都受制于一个体系中，这一体系迫使他无节制地增加他的牧群——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毁灭是所有人都在奔向的目的

资本主义

地。”^①

很多今天的环境问题，都显示出与这种“公地的悲剧”相同的特征。因为海洋是向所有人开放的，捕鱼船队就竭力扩大其捕获量，直至鱼群趋于衰竭，渔船不得不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捕到的鱼越来越少；类似地，因为空气使用是不受限制的，各个企业就将未经处理的废物排放到空中，尽管我们都希望有较少污染的空气；免费提供的道路，也是“公共品”的一部分，个体驾车者都追求自己的利益，都寻求享有便利，将车开到各处，但由于所有人都遵循相同的选择，以致出现首尾相接的交通堵塞；等等。

公共品的悲剧为基于市场的资本主义提出了一个主要问题，因为竞相追逐利润的个体似乎无可避免地会攫取地球直至毁灭，除非政府涉足阻止。这导致许多绿色组织主张说，悲剧只有通过重大的政治手段才能得以解决或避免。^② 甚至连相对谨慎的布伦特兰报告都呼吁采取“果断的决定性的政治行动，……以确保……人类的生存”。^③ 而对于许多绿色组织来说，这在语气上太过于温和了，在内容上太过于通融了。在对这种“改良主义思想”表示轻蔑的同时，他们提倡“惊人的激进行动”，坚持要发动一场“针对当前流行的世界经济和政治

① G.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in G. Hardin 与 J. Baden (eds), *Managing the Commons*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1977), p. 20.

② 虽然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并非所有的绿色思想者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③ *Brundtland Report*, p. 1.

秩序的激进而富有远见的根本性的挑战”。^① 简言之，资本主义必须被毁灭。

这一激进的绿色议程不可调和地反对资本主义，正是这一点使得它与较为传统的社会主义立场颇为相近。一些社会主义者对他们提出批评，认为他们应当将资本主义而非工业化视为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对此，一位激进的绿色主义者予以反驳：“绿色主义者相信，资本主义的毁灭实际上是恢复环境完整性的一个必要条件……深绿规划对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实践均构成了严重挑战。”^② 如同革命的社会主义，深绿环保主义描绘出一幅未来的世纪末日图景，指出只有全盘推翻现有的社会秩序而以一个全新秩序取而代之，才能避免世界末日的来临。同样如同革命的社会主义，深绿环保主义的信徒往往摇摇欲坠于极权主义政治解决方案的边缘，而且不时的就会滑落过去，就如他们为人口控制开出令人目瞪口呆的药方时所显示的那样。然而更经常的，他们往往拒绝正视他们的规划中所蕴含的政治含意，但是我们很难看出，那些为取消现代消费的舒适和为将我们投入凄凉的禁欲苦行而设计出来的激进变革，如果不诉诸于相当的强制乃至武力，如何能够实现其初衷。

不过，尽管与旧式社会主义有很多共同之处，激进绿色运

① Porritt 与 Winner, *The Coming of the Greens*, pp. 263 and 11.

② A. Dobson, *Green Political Thought* (London: Harper Collins, 1990), pp. 175 — 178. 同样，Martell (*Ecology*) 认为绿色组织无疑与社会主义者都做出了推翻资本主义的承诺，他讨论了绿色运动与社会主义党派的结盟 (p. 13)。

动却并非披着新式伪装的社会主义。环保主义者通常宣称他们自己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既不红也不蓝而是绿色”。他们反对资本主义，但他们同样反对社会主义，因为在他们看来，两种制度都信奉和依赖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对于社会主义的俄国和东欧所导致的直到 1989 年革命后才最终为人所知的生态灾难，绝大多数绿色组织都有充分了解。^① 他们同样知道，出现于整个东欧社会主义地区的那种大规模和高强度的环境退化，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并不存在。

绿色资本主义：环境的商品化

深绿为公地悲剧提出的解决之道，似乎就是无可避免的政治强制和高压——我们必须阻止地球人口的增长，阻止资源的枯竭，阻止二氧化碳的排放，等等。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绿色视野，因为要寻找解决公地悲剧的办法，并不总是必须依靠公共政府来指示方向。这一替代办法的出发点，是要认识到，如果市场有时会失灵，那么政府同样会失灵。即便抱着最好的目的，政府部门却往往把要解决的问题弄得更糟，因为政府永远也无法收集到并妥善处理所有的有用信息，永远也不可能周全考虑某个特定行动所带来的所有后果。这就说

^① 俄罗斯环境部长于 1993 年末指出，大约 15% 的国土都应当被看作环境灾难区。一半的可耕地被不适当地垦殖，4/5 的工业废料缺乏适当处理，数以百计的河流遭到核污染，10 万人生活于危险辐射区（*The Independent*, 28 December, 1993）。

明，只是在市场手段已经被证明不足以解决问题的时候，才应当去尝试政府控制。

我们可以以濒危野生物种的保护问题为例，来加以思考。在肯尼亚，环保主义者敦促政府采取措施，挽救数量急剧减少的大象。政府的反应是颁布禁令，禁止象牙交易。但是，禁令只是提高了黑市的象牙价格，因而刺激了偷猎者去捕杀更多的大象。与此形成对比，在津巴布韦 (Zimbabwe)，政府引进象牙交易的许可证制度，从捕猎许可证和象牙交易所征收的税款返还给当地社区，因而当地社区愿意自己去制止偷猎。其结果是，大象数量以每年 5% 的速度增加。^①

由此得出的一个教训是，导致了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的，并非资本主义交易，而是未能明确界定产权。当资源具有市场价值且能够作为私有财产买卖时，它们就不会趋于消失，因为所有者关心如何去保持和再生产这些资源。这正可以解释，为什么随处漫游的美洲野牛趋于灭绝，而放牧在同一片土地上的母牛却数量众多；这也正可解释，为什么鳄鱼（政府允许为获其皮而牧养它们）大量存在而犀牛（自由野生，人们为获其角而捕猎）却出现在濒危物种名单上。^② 如此看来，公地悲剧并非源于缺乏对于公共品如何使用的政府管制，而是因为关于它

① T. Anderson 与 D. Leal, *Free Market Environmentalism*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1). I. Sugg 与 U. Kreuter, *Elephants and Ivory*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94)。

② M. Sas - Rolfes,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Economic Affairs*, vol. 14, 1994, pp. 10 - 12.

资本主义

们的可辨识的所有权缺失。

利用资本主义盈利动机去实现有利于环境的结果，可以通过三种途径。一个途径是“绿色消费”，如果存在对不伤及环境的产品的有效需求，资本主义生产商就会竞相提供。第二途径，是对迄今免费或者以补贴价格提供的公共资源的使用征收费用，这样就把对资源的损耗或掠夺的成本纳入了那些使用者的经济考虑。第三个也是最激进的一个途径，是将公共品私有化或者商品化。

近年来，公众对绿色论题的关注和了解逐渐增多，对“亲善环境”产品（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roducts）的需求渐长，这导致在欧洲和北美形成了一个新的市场。大的工业公司例如英国化学工业公司（ICI, 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 Ltd）和壳牌公司（Shell），在环境项目上投放了数以百万英镑计的钱，并在国家电视台大作广告。汽车公司竞相推出无污染的 and 节能的款型，在其使用寿命终了后可以在利用。金融机构有益地实行“合乎伦理的投资”（ethical investments），将那些制造污染的企业排除在外。超级市场里现在销售无化学污染的有机食品、在农场自由放养的鸡下的蛋、由再生纸制造的卫生纸。洗涤剂生产商推出的是低磷产品，不会因泡沫过多阻塞河流。甚至在 CFCs 的禁令出台之前，烟雾剂制造商已经向市场推出担保不会损害臭氧层的产品。一些零售商，比如 Body Shop（英国的一家健康及美容品连锁店——译注），通过将精力集中在生产线上——他们宣称，他们的生产线不做动物试验，他们的生产线是以公平价格从第三世界生产者那里购买，他们的生产

线无害于自然资源——已经在整个西方世界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所有这些行动被证明非常有利可图。例如，安妮塔·罗迪克（Anita Roddick）于1976年创立她的第一家Body Shop，迄今已经拥有一亿英镑以上的身价，在《星期天》（*The Sunday Times*）的1994年英国富豪榜上名列第106位。

不过，单靠绿色消费，并不足以应对所有的问题和挑战，环境问题的资本主义市场解决办法，不能仅仅限于依靠具有绿色观念的消费者去要求绿色产品。即便我们数百万人在购买液体时都坚持要玻璃瓶装的而不是塑料装的，也无法解决废弃物问题。个体消费者购买决策的改变，很难帮助解决诸如可能存在的地球变暖之类的问题。绿色资本主义往往需要某种程度的政府行动，以促进市场解决方案的实施。

利用市场达致理想环境目标的一种形式的政府行动，是采用新的物价（价格）政策。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许多西方政府对无铅汽油征收较含铅汽油更低的税。这种办法，无需政治控制或禁止，就可以有效地驱使驾车者改变其购买模式（以及驱使汽车生产商改变其引擎规格）。

类似这样的政策的要点是，与不分差别的政府管制不同，它让个体使用者自己决定如何选择和调整自己行为。那些能够相对容易地改用无铅燃料的人自然会改用，而那些无法现在就改用的人则支付一笔额外费用，这笔费用表示的是，他们的行为产生了一个社会成本（也就是说，他们污染了公共品空气）。

有人认为，采用政治指示和禁止的做法与政府定价策略，

资本主义

二者在实践中并没有什么区别，都能实现相同的结果。^① 而实际上，二者间的一个决定性的区别在于，政治管制为了实现某一特殊目标而对所有人强行施加同一个标准；而定价策略则倾向于让那些做出改变无需太多代价的人们改变其行为。后者不仅更有利于个体自由，而且也被证明是更为有效的实现理想目标的办法。

在以往的污染行动无需承担责任的情形下，引入付费办法常常被证明是有效的污染控制手段。例如，在英国，农场和工业向河流中排放废弃物的做法，在很多年里一直由一个简单的特许制度控制。在这一制度下，农场主和工厂主申请“排放许可”，然后就可以向某一指定的河流或者溪流中排放某一定量的废弃品。这个制度的问题在于，缺乏减少排放物的总量和毒性的激励。意识到了这一点，国家河流管理当局现在采用了一个新制度，那些寻求排污者必须为排污权支付费用。排污越多，支付的费用就越高。这样就有助于弥补清理河流的成本。^②

这种“污染者付费”的制度并不寻求完全根除污染（因为河流自身能够应付某一特定量的排污，而且，也没有其他可行的大量排放液体废弃品的办法），但是它能够确保，当在不同的行动选择中做出决定时，个体行动的“边际外部成本”被适当地予以考虑和重视。就拿无铅汽油的例子来说，那些能够容

① Martell, *Ecology*.

② Saunders 与 Harris, *Privatization*, Chapter 5.

易地改变其污染行动的人们将发现，他们这样做是值得的；而那些不能改变的人们，则不得不为其污染行为支付更高的费用。

污染者付费原则在关涉环境问题的很多领域得到成功应用。例如，在德国一些城镇，垃圾车上装配有计量器，可以测量每个家庭的垃圾有多少，并且根据每家所仍出的垃圾数量自动开出账单。这一制度不仅鼓励各个家庭减少其废弃物，而且增加了用以处理垃圾的收入。类似的策略被欧洲各国政府大规模地应用到对碳的征税上，用以对付（感觉中的）地球变暖问题。通过提高消费者为发电而必须支付的价格，他们再一次被鼓励减少其废物排放（在本例中是燃煤发电所的二氧化碳排放）。

在加利福尼亚州，对污染者付费原则的应用更进了一步，建立了一个污染许可证交易市场。^① 1994 年，一个地域性空气净化激励市场（Regional Clean Air Incentives Market）在南加利福尼亚的四个县中成立起来，以便在 390 家公司中分配污染信用证，这些公司制造了当地绝大部分的工业污染。每张信用证允许一家公司排放 2.2 公斤的氮氧化物或者硫氧化物，每家公司给定一个最高排放限额。那些设法将排放量控制在限额以下的公司，可以通过拍卖，将其剩余的信用证出售给那些排放量大的公司。随着总排放限额被政府逐渐压低，信用证的交易价格相应上升。据预期，10 年内，氮氧化物和硫氧化物的总排

^① *Independent* on Sunday, 2 January 1994.

资本主义

放量将分别下降 75% 和 60%。

可交易的污染许可证这样的政策，将我们带入通过资本主义市场策略来追求环境益处的第三条途径。因为加利福尼亚试验的卓有成效的做法，正在于将工厂主的空气使用权（在过去是免费“提供”）商品化。我们在第一章已经知道，政府确立并强制执行一套私有产权制度，是资本主义运作的一个必要条件。在许多关于污染和忽视环境的例子中，这正是所缺失的东西。没有人拥有雨林、臭氧层或者北洋，这正是每个人都认为可以随意滥用它们的原因。可交易的污染许可证代表了一种极其精彩有效的对付公地悲剧的市场解决办法，它可以用于空气，但同样的市场逻辑也可以应用于水。

比如，在澳大利亚，金枪鱼的过度捕捞一直是个问题，因为海洋是公共物品，向所有拥有渔船和渔网的人免费开放。对于同一个问题，许多欧洲政府的做法是，控制每个月渔船在港内的天数，或者管制渔网的长度，以此保存鱼类资源。与此不同，澳大利亚政府采用了可交易的捕鱼限额。渔船被分配了最大捕鱼定额，这些定额可以交易。结果，那些最有效率的渔船从最无效的渔船那里购买额外的定额。环境标准（在这里是鱼群）得以保持，而经济效率也并没有损失。^①

当然，并非所有的环境问题都可以通过这样的市场手段得以解决，因为并非所有的财产都有明确的边界，许多公共品无法轻易被私有化。土地的边界可以划分清楚，用栅栏或铁丝网

^① Anderson 与 Leal, *Free Market Environmentalism*。

圈起来；我们已经看到，水和地方空气的使用权也可以确立并加以保护。但是一旦被应用到大气的产权上，这种解决办法就变得极为困难了。一些重要的环境资源，包括臭氧层和地球气候的稳定，无法轻易实行私有化，因而也就无法便易地交给资本主义市场解决。

然而，假如具备一定的政治智慧和适当的技术，环境产权的界定能够较目前得到很大改观。1840年代，仅仅是由于带刺铁丝网的发明，得以让那些拥有权利者保护其土地，就帮助解决了美国草原的过度开采问题。同样，借助于现代技术发展，帮助个人确立并保护其明晰的大气产权，避免他人的侵入和滥用，今天的一些环境问题也可以得到很好解决。^①

例如，可以将化学指示剂加入到烟囱排放的废气中，这样就可以允许那些遭受了工厂排放的空气污染的人们，向那些应该对此负责的人们索取赔偿。这将意味着，斯堪的纳维亚湖泊的拥有者，可以向英国发电所的拥有者要求赔偿，因为后者排放的废气导致了前者的湖水的酸化和鱼群的死亡。相应地，发电所的拥有者可以将这笔额外费用转嫁到他们的电价中去，或者投资于烟囱清除器以便减少所必须支付的赔偿费用。两种办法中的任一种，都可以促使目前被忽视的环境价值被人们适当地意识到，进而影响他们的行为。

道路定价是另外一种降低污染的途径。一些西方政府寻求借助于计算机控制系统，来监控城市里的汽车使用，并按月向

^① Anderson 与 Leal, *Free Market Environmentalism*。

资本主义

驾车者开列账单。而实际上，可以将污染者付费的原则扩展，实行公路的私有化，向经营它们的公司征收污染费用。污染是经营公司的顾客制造的，可以预知，这笔费用将被转嫁到道路使用者身上，在废气排放最多的高峰时期，收取更高的通行费。由于污染成本被考虑进来，驾车者将相应地改变其行为（例如选择非高峰期，合作轮流开车，改变交通工具）。

将技术的和实践的可能性推向极致，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出一个产权方案来解决诸如鲸的数量急剧减少的问题。据报道，为了拯救趋于灭绝的蓝鲸而投入的费用，折合到每个美国人头上是8美元。^① 这些生物因此对人们有价值，但是这些价值目前却无法转化成有效的购买力。与其将它们丢在那里任由猎取者捕杀，倒不如将它们分别卖给感兴趣的团体或个人（比如单个美国人或者“绿色和平”组织成员），将其遗传印记作为其“商标”，通过卫星予以监控。按照这一未来方案，通过确立有效的私人产权，捕猎行为必须通过市场支付方可实现，这就对那些掂着鱼叉枪随意捕猎的人构成约束，世界上的鲸的困境由此可望得到缓解。

市场资本主义与环境质量并非天然构成对立。重要环境问题的解决要求采取严厉政治措施，这种宣称实在是太易于诱人轻信了。并非所有的世界环境问题都可以通过定价和私有化资源的方法得到解决，也并非在每一个实例中都能够找到技术解决手段，但是，如果顺应——而不是反对——市场行为中所显

^① Pearce et al., Blueprint2.

示的个体自利本性，政府就更有可能找到持续的解决办法。绿色运动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是真实存在的，需要予以解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已经到了推翻资本主义增长机器的时候。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将会继续导致一些环境问题，但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在一种市场关系和私有产权背景下——同样带来了克服它们的最大希望。深绿组织所提供的凄凉苦行的必须通过政治强迫才能实现的替代方案，并不是人们所需要的，也不是人们愿意接受的。

第四章 资本主义与人类幸福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如何从经济上和技术上证明了它自己。它不仅能够为我们提供录像机和虚拟现实科技魔力，而且能够供养人类，也许甚至还能挽救鲸鱼。

然而，真正重要的问题在于，资本主义增长机器在过去两百年里的产出，是否使人类更加幸福。我们都熟悉年纪较大的人们的意见，他们满怀深情地回忆说，在过去的日子里，他们很贫穷但是却很幸福；我们也都知道如下的朴素真理：“金钱买不到幸福”，人们“不能仅靠面包活着”。那么很明显，一项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审视，需要考虑资本主义体系的产出扩展是否真正促进了人们的生活质量的问题。我们拥有了我们的汽车、我们的国外假期、我们的双层玻璃窗和我们的递送到家的比萨饼，我们更幸福了吗？

对幸福的追求

社会制度不能使人们幸福。无论何种社会制度，所能做的

只是提供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个体能够追求幸福。

1940年代，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列出了人类的需求“层级”。^① 最基础和最根本的需要来自人体组织的生理需求——例如，对食物和住处的需要。如果这些需要得不到满足，那么，依照马斯洛的说法，将会影响其他所有的需要；而一旦得以满足，个体将意识到更深的需要。这些需要包括安全的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自信和尊重的需要以及最后一个，自我实现的需要，一个人的潜能的实现。

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回顾了马斯洛的作品，发现里面对人类幸福的必要条件有一个简明扼要的总结。^② 如果人们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和住所，或者发现自己受到身体伤害的威胁，或者被剥夺了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机会，或者不被承认以及自信遭伤害，或者被阻止无法充分实现自身的潜能，那么我们就要说，社会条件应当遭到谴责，因为它们抑制了人类幸福的可能性。同样，默里指出，如果马斯洛的所有五种需要都能够被满足，那么就很难再认为，是外界条件阻碍了个人对幸福的追求和获得。一个社会制度只能做到这么多，剩下的必须由我们自己做。

那么，在多大程度上，资本主义符合了这五条标准呢？依照马克思的观点，它的表现糟糕之极。我们在第一章里看到，

^① A. Maslow,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50, 1943, pp. 371—96.

^② C. Murray, *In Pursuit of Happiness and Good Governmen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8).

资本主义

马克思相信，资本主义在马斯洛的第一个障碍面前就败下阵来，因为他的“贫困化命题”认为，资本主义越发展，大多数人口的物质状况就越悲惨。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甚至无法满足最基本的人类需要。

马克思还确信，资本主义同样无法提供实现人类幸福的其他条件——这些条件在一个世纪后的马斯洛层级理论中提了出来。在他的“异化”分析中，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的爱与归属的需要被他所称的“人与人之间的疏离”^①破坏掉了，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基于作为工人或者资本家的经济角色，而不是根据他们作为人类的内在品质。例如，工人被一套工资劳动制度夺去了个性，这套制度不是将他们视为完整的人，而是仅仅当作能够用来制造商品的肌肉或者脑力。

资本主义异化还表现在人们无力满足其自我实现的需要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既与他们的劳动所制造的产品（产品一造出来就被从他们那里拿开）相异化，又与他们的劳动本身（一旦工作的冲动出现，劳动就“像瘟疫一样被避开”）相异化。^② 资本主义就这样扭曲了人类的本质，破坏了我们的通过劳动来表现自己的需要。本应成为我们的主要生命活动的工作，不过成了一个通往死亡的工具。我们无从控制它，我们

① K. Marx,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4), p. 114.

② 同上书, p. 111。

无法从中获得任何快乐。

我们已看到，马克思的贫困化命题已经被证明毫无意义，但是他对资本主义的其他批评却不太容易被驳斥。生活的内容的确不仅仅是物质财富；而且有迹象显示，资本主义在满足人们物质需要上的成功也许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增添他们的满足感。

物质需要：金钱买不到幸福

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使得那些马克思的 20 世纪的追随者放弃了他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转而集中于他的异化理论。这些人中，也许最为著名的应当是赫伯特·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他试图将马克思对人类异化的关注与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有关本能的需要和欲望的潜意识升华的理论调和起来。^①

根据马尔库塞，资本主义刺激了追求更多物质产品的“虚假需要”。我们自身的这些虚假需要，受到企业所制造出来的闪闪发光的商品的引诱而被唤醒，并被广告工业和大众文化不断更新。在努力满足这些虚假需要的过程中，我们将自身锁入了持续不断的自我抑制，因为我们学会了向资本主义索求它能够给予的一件东西，那就是，更多的产品。同时，我们的“真实需要”——它们反映和表达了我们的本能，尤其是我们

^① H. Marcuse, *One Dimensional Ma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4).

资本主义

的性驱力（利比多，libido）——在一个单向度的商品世界里由于“受到抑制而失去升华机会”。性欲和其他本能被导入不同形式的表达，最终无法得到满足。大众文化以它的华而不实的好莱坞电影以及低级趣味的浪漫小说，大众消费以它的炫目耀眼的广告以及通过占有换取满足的虚假承诺，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释放渠道和表达方式。这些释放和表达在既有的社会制度中是可容纳和可控制的，但是对生活于其中的个人来说往往无法履行和实现。因而，大多数民众的性本能就以一种不会威胁到现存社会制度的方式被消散殆尽；而且只要资本主义能够持续不断地制造出新的商品，它就能够继续控制人们。技术进步拔掉了所有反对的雷管。

马尔库塞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许多批评都是有问题的，重要问题之一是他对被民众毫无批判地作为“真实需要”接受下来的“虚假需要”的辨识。但是，尽管如此，马尔库塞还是惊醒我们注意到一个真实的问题，因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通过追逐物质享受来寻求幸福和满足的做法，似乎是难以逃避的，但又似乎注定是没有结果的。我们得到的越多，我们的满意度似乎就越低。在寻求获得通常难以捉摸的满意感觉时，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日益增加的累积循环。就像一个海洛因吸食者，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刺激，才能达到同样水平的“高峰体验”。

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我们的需求愈来愈显得缺乏限制和贪得无厌？现代消费体验的这一辛辣特征，是资本主义自身导致的吗？

从某个方面说，似乎的确如此。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个人购买物品和劳务以获得“效用”，但是，在很多情形下，他从购买中获得的效用会由于其他个人购买了同样的物品或劳务而下降。例如，购买一辆汽车，可以增加个体的自由度和活动性；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有车，道路很快堵塞不通，则每个汽车消费者所得到的满意度都会打折扣。同样，追求一个证书，比如大学学位证，也只是在其他入很少能够得到这种证书的时候，才能换取一份高薪好工作；而一旦学位证变得稀松平常，毕业生为获得高薪职位所进行的竞争就趋于激烈。

为这类“地位物品”而相互竞争的个体所面临的问题，就好像走上一个正加速下行的电梯。正是因为资本主义增加了总体财富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得以获取想要的东西，从物品的获取所得到的满意程度反而相应地减少了。为赢得相对优势而展开的竞争日趋激烈，但是当个体发现先前所热望的东西并不能带来预期的好处时，他们的挫败感和失望感也增加了。正如荷西（Hirsch）所解释的：“增长的动态过程反过来提高而不是减少了分配竞争。这正好与经济学家和今天的政治家们所期待于增长的相反。”^① 荷西认为，解决这一困境的惟一出路，在于通过集体合作和资源的再分配，寻求公共福利的真正提高。

不过，并非所有的物品都是地位物品，在很多情况下，从某一特定物品的消费中所获得的可能满意度，并不依赖于他人

^① F. Hirsch, *Social Limits to Growt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6—7.

资本主义

得不到它。我从国外度假中所获得的愉悦可能会因大批其他游客在同一时间去到同一地方而遭到破坏，但是在很多领域里，个人消费所获得的满足并不受他人是否购买了同一物品的影响。显然，荷西的分析并不全面，因为我们还得往下追问：为什么非地位物品的消费也往往具有同一特征，即缺乏最终的实现因而处于永久的追逐中？

一百多年前，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将这种“多欲病”归因于急剧的破坏性的经济和技术变迁。迪尔凯姆相信，人类的欲望原则上讲是没有止境的。他也认为，那些完全受其无穷无尽的欲望支配的人，永远也不会获得满足和赢得幸福。除非将我们的欲望和需求设法加以控制，否则我们就必然会因无尽的追逐而遭受不幸。迪尔凯姆为不快乐的个人和病态的社会开出如下药方：“追逐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将导致一个人的终生不幸……拥有的越多，欲望就越多，因为满足感的获得只是刺激了新的需要。”^①

在迪尔凯姆看来，人类的“情欲”只有借助于社会道德的力量才能得以控制。换句话说，个人需要学习和理解他们的实际需要的界限。在前工业时代，这很容易实现，因为社会变动很缓慢，社会秩序几乎是永恒不变的。我们从小就“知道”我们的已被注定了的生活，在封建欧洲，这些规范又由法律力量和宗教权威加以强化。相反，在今天，资本主义增长机器永远都在加速前进，不停地改变着我们的预期和希望。我们祖先的

^① E. Durkheim, *Suicid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2), p. 248.

受限的视野早已被丢掉，因为变化的步伐是如此之快，以至于新的规范和期望模式在有时间被确立起来之前就被取代了。我们不知道能对生活期待和要求些什么，因为我们所赖以生活的规范一直都在变动。迪尔凯姆认为，现代社会存在一种反常病理，或者称“失范”，导致了个人的不幸和社会的失序。迪尔凯姆认为，解决之道在于一个更为有序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要求规制，但不是由政府（因为迪尔凯姆很清楚，国家距离人们的日常生活太遥远了，无法对其施加道德影响），而通过基于工厂车间的新型的自愿联合。虽然他没有具体展开这些思想，但是从今天的一些国家例如日本和德国中所看到的各种形式的团体忠诚和责任，似乎正暗合了他心目中的制度发展类型。我们将在第五章中考虑这种所谓“莱茵河模式”（Rhine model）的资本主义。

然而，迅速的经济和技术变迁并不能充分解释我们的似乎无穷的物质欲望。制造出我们现代消费主义模式的，不仅仅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变革步伐，而且还包括发生于工业化前的欧洲文化转型。

在一项关于这一文化转型的颇具吸引力的研究中，科林·坎贝尔（Colin Campbell）比较了现代消费者显然不受限制的欲望与相对固定不变的传统消费模式。^① 与韦伯对资本主义伦理的起源的分析类似，坎贝尔讨论说，在西方必定先是出现了文

^① C. Campbell, *The Romantic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Modern Consumer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资本主义

化的改变，这一改变使得人们扩展了受到限制的欲望，转而接受一种强调从对物品的追求中获取快乐的新型伦理。实际上，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依赖于传统工作模式的革命（受到新教的影响而出现），而且依赖于传统消费模式的相应改变，因为新的资本主义企业需要一种新的消费伦理，以为其产品制造市场。

正如韦伯将清教主义视为资本主义工作伦理的源泉，坎贝尔也将清教主义看作这种新型消费伦理的无意中的来源。清教当然反对所有形式的快乐主义和情感发泄，但是通过训练人们控制他们的情感，它存进了内在感觉和外在行动的区分。人们学会通过完全脱离于外在物质刺激的内心沉思获得情感愉悦，这逐渐使得他们能够完全借助于想象寻求情感满足。

随着宗教的重要性的衰落，这种对情感满足的寻求转而为浪漫情怀和多情善感所取代。人们学会了幻想和做白日梦，18世纪的小说慷慨地充当了这种开胃食品。这种浪漫主义的今日遗产，就是我们通过对未来满意度的预期的想象，依然在寻求获得情感的愉悦。预期的快乐要比消费的实现所带来的快乐多得多。我们从计划下一次度假中获得乐趣，即便我们刚刚完成一次度假；我们从翻阅商品目录中得到的快乐，比在实际拿到商品时还多；从观赏展出在橱窗里的衣服得到的喜悦，足足抵得上买下来后成周成月穿在身上所感到的愉快。在我们罗曼蒂克的想象中，我们期望得到的总是完美的，但是随后的实际体验总是没有现象中的那般完美无瑕，因而获得的快乐迅速下降。随着在预期下次购买中获得强烈愉悦，我们的需求和欲望

就这样不断更新。

如果坎贝尔所言属实，那就意味着，这种令人不快的现代的无穷欲望并非是资本主义制造出来的，而且，卓越的资本主义也不太可能去解决它。既然我们的想象的魔鬼已经被放出瓶子，要想将它收回去，看来不是那么容易。

安全和爱的需要

一旦一些基本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更多的消费就不太能带来更多的幸福，其他的需要也就随之而来。我们尤其需要某种最低程度的安全，同时我们也很可能感受到一种爱和归属感的需要。我们将看到，这两者是相关的。

西方社会学中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认为资本主义破坏了社会生活中爱和归属的基础。这一信条的一个关键来源，存在于费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19世纪晚期的作品中。滕尼斯力图探索出那些“吸引人们相互接近、使他们保持在一起、促使他们共同行动的情感和动机”^①。他的基本观点是，贸易的扩展和后来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削弱了基于他所称的“自然意志”（即感觉和本能）的关系，而以基于“理性意志”（即工具理性）的关系取而代之。他确信，将人们吸引到一起的自然情感源于共同的亲属关系（一个血缘的联合）、共同的邻居（一个地域的联合）和分享的宗教信念（信仰的联

^① F. Tönnies, *Community and Societ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5), p. 3.

资本主义

合)。所有这三者在“资产阶级”时代都遭到了破坏，因为资产阶级时代只强调基于市场交易的金钱算计和对个体私利的狭隘追求。

滕尼斯的分析极大地影响了 20 世纪关于现代社会的思想，但是，他的观点至少存在三个主要问题。第一，他对城市工业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分析是片面的，它强调了现代个人主义的负面特征，却忽视了它的正面特征。第二，经验证据显示，滕尼斯夸大了爱和个人归属感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遭受侵蚀的程度，虽然近来的发展表明，他的预测在 21 世纪要比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更具影响。第三，资本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天然关联的假定必须遭到质疑，因为个人主义并非产生于资本主义，二者在当代世界里也并非总是相互联合。

就第一点来说，确实，那些在传统上促进了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制度和机构——家庭、教会和村庄共同体——的一些特征，因资本主义的增长而受到了削弱，因为过去两百年来，工业和技术的空前的变化速度伴随着传统社会的大规模解体。正如我们在第一章看到的，英国的农业工人被圈地运动逐出土地，被诱或被迫进入新的城市寻求雇用，这种国内的或者跨越国界的从乡村到城市的大规模迁移的模式，在后来接触到工业资本主义的世界其他许多地方已经重复发生。

同样真实的是，现代资本主义在破坏旧的社会安排的同时，制造出了不安全状况。在绝大部分的西欧国家和美国，失业在今天似乎成了特有的地方病，青年人往往要经历寻找一份可靠工作的巨大困难。例如，在英国，1981—1992 年间的失业

率波动在 6.8%—12.4% 之间；1993 年，在从事经济活动（economically active）的青年中，22% 的男青年和 16% 的女青年处于失业状态（同期的美国失业率稍低，在 5.2%—9.5% 之间上下波动）。^① 尽管实际平均收入水平持续上升，还有为无法维持生存者设置的国家福利，但是，冗余的可能性和找工作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还是在青年人心中留下了一种经济不安全感。一项用马斯洛的五种需要来印证北美状况的研究发现，相比其他各个单项，人们更多地受缺乏商业安全感的困扰。^②

不安全感并不仅仅局限于失业和冗余问题。现代世界的持续变化的体验几乎肯定与强烈的持久秩序感和稳定的归属感相矛盾。我们曾经生活在熟识的环境中，以亲属制度为中心，与出生地紧密相连；我们现在却被迫将我们的信任托付给从来没有直接交往的陌生人。^③ 现代社会生活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得到了延伸，我们不再单靠从身体上和情感上都与我们联系紧密的人的活动，转而依赖于分散在全世界的无数个不曾谋面的人们的活动。这意味着我们被迫信任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人们。我们经验中的信任、安全、风险和危险的这种根本性变化，产生了一个无限的存在性问题，存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中心。过去的确定性已经消失了，未来总是带有或多或少的威胁性。现代

① 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 (CSO), *Social Trends* (London: HMSO, 1994).

② 报道引自 R. Lane, *The Market Exper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507.

③ A. Giddens, "A Reply to My Critics" in D. Held and J. Thompson, (eds), *Social Theory of Modern Socie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资本主义

世界中的本体论安全天生就是脆弱的。

但是，所有这些还有另外一面。不安全是我们为更多的个人自由支付的价格。伴随着共同体的侵蚀，个人从家庭、邻里和牧师的长久监视下解放出来。如果我们不确定我们归属哪里，那是因为在今天我们有如此多的地方可去，有如此多的不同团体可以去自由接，有如此多样的身份去选择并藉以表现我们个性的不同方面。^①

现代社会生活普遍存在的匿名性也有其好处。如果个体卓然孤立于大的群体，则他/她亦可有望独立支配自己的生活而无涉于他人。一个每个人都熟悉其他所有人的社会，看似安逸舒适，但不免沉闷乏味。正因为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再受限于家庭、邻里和教会的高度受控的同心圆，我们就可以自由参与各种不同的社会圈子，这些圈子之间也许只存在某个或某些方面的接触。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在生活的不同领域发展我们的不同个性，并能保持对不愿交往的人的疏远。

甚至对货币交易的信赖都有其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齐美尔（Simmel）指出货币媒介是如何将性质差异转化成标准化的数量测量，因而在某种意义上降低了人类经验的差异和多样性，因为福特汽车、毕加索的蚀刻画和妓女的性交易都被以一种共同的价值单位表现出来。然而，这还是个体自由和独立的一个源泉。货币的确是非个性化的，但正是因为一个货币经济

^① 参见 G. Simmel,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in K. Wolff (ed.),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50)。

对划了卡或者签了支票的人的个性不感兴趣，它才获得自身价值。货币交易不分性别，不分种族，不分国籍。在一个市场经济中，我的货币与你的一样，无论我是黑人还是白人、是英俊还是丑陋、是聪明还是愚蠢、是贵族还是平民。

因此，对于滕尼斯的第一个回应是，尽管与工业资本主义出现之前时期相比，爱和归属感有所削弱，但是资本主义的兴起促使个体扩大了其生活范围，尝试其个性的不同方面，培养出其在早前未能充分实现的新的才能和本领。

不过，我们还得更进一步，因为这一信条——爱和归属感丧失于向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中——本身就应当受到质疑。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联系紧密的家庭和共同体网络由于工业化的出现而受到侵蚀。“扩展家庭”（父母及其子女与其他亲属例如祖父母生活在一起，构成一个单一经济组织）逐渐为更为孤立的“核心家庭”（只包括父母及其未成年子女）所替代；同样，成员相互熟识的内聚的乡村共同体逐渐被关系淡漠、相互利用的“城市”生活方式所取代。简言之，过去的社会关系饱含的情感因素被更冷漠更具工具性的生活所取代。

这种观点几乎肯定是夸大了过去生活的亲密程度，因为社会史家已经证明，扩展的亲属制度，并非如通常所相信的那样，在工业化前的欧洲普遍存在或者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在17世纪的英国，大多数家庭规模都很小（少于五口人），只包括父母及其未成年子女；只有不到4%的家庭包括了其他亲属

资本主义

成员。^① 工业化前英国的地方共同体也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持久和稳定，据费希尔（Fischer）证明，16 和 17 世纪英国的居住迁移频率并不亚于现代，他指出，无根无依的状况至少已经普遍存在了十二代。^②

这些证据有力地驳斥了那种认为工业资本主义破坏了扩展家庭的纽带和地方共同体网络的稳定的观点。显然，工业革命导致了人们生活的巨大改变，但是前工业世界的亲密感和安全感从来没有如滕尼斯所设想的那般强烈和坚固。

如同费希尔所指出的，亲密关系已经衰落的信条基于如下的盲目假定：共同体的归属感与某一特定地域相关联。人们过于轻率地接受滕尼斯的观点，往往轻易地假定说通讯和运输的改善使得人们更自由地来往各地，因而削弱了他们与某一特定地域的联系，无情地导致了共同体感的衰落。但是，今天的许多人们发现，他们的最亲密最有意义的友谊，往往并非是与住地附近的人们而是分散于遥远各处的人们。从这种意义上说，共同体并没有消失，而仅仅是延伸到更为宽广的领域。邻居对我们的意义当然并没有完全失去，但是在许多情形下，我们生活在只具有有限责任的区域共同体中，我们的私密得以保持，我们的免遭随时监视的自由得以实现。随着对居住地和交往对象的选择权和自由度的增多，我们的最亲密关系的质量更可能得

① R. Wall, "The Household: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Change in England, 1650—1970" in R. Wall (ed.), *Family Forms in Historic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② C. Fischer, *Networks and Plac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7).

以提高而不是遭受损害。^①

不过，有必要对这一点做出更多说明，因为虽然所有的证据都显示我们对亲密关系和安全的需要在现代时期能够得以满足，但近来的一些迹象表明，事情正在起变化。

在大多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人们的家庭生活和团体生活自 1960 年代以来出现了显著变化。以英国为例，每千名已婚者的离婚率从 1961 年的 2.1 上升到 1991 年的 13.4——30 年间的增长率超过 6%。^② 婚姻解体也越来越快，1961 年，只有 1% 的离婚者的婚期在两年以内，但是至 1991 年，这一数字达到 9%。显然，婚姻不再能为人们提供终生忠诚于伴侣的现实期望，这势将对人们维系一个永久性情感根基进而规划今后的生活的能力造成极大破坏。

终生婚姻的破坏不仅影响到成年人，而且波及他们的孩子。私生率，一如离婚率，在过去的 30 年里快速上升。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③ 指出，在 1950 年以前的 500 年里，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约 95% 的孩子均属婚生；但是在 1950 年代后期，私生率开始上升，从 1960 年的 5.2% 急剧升至 1992 年的 32%。因此，跟离婚率一样，30 年间的私生率增长达到 6%。

① 参见由 Gans, Pahl 等人的讨论：P. Saunders, *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 2nd edn (London: Hutchinson, 1986)。

② CSO, *Social Trends*, 1994.

③ C. Murray, *Underclass: The Crisis Deepens*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94).

资本主义

人们常常认为，这些数字并不必然表示家庭生活趋于破裂，因为大多数离婚者都会再婚，而且许多私生子女都是由具有稳定的长期关系的同居父母所生。但是，默里的证据则表明，第二次婚姻的成功率低于第一次婚姻，同居者的同居时间短于不成功的婚姻的婚期（同居期的中值为两年，以离婚结束的婚姻期中值为10年）。私生子女也更可能只与父母中的一个生活在一起，因为将近一半的这些孩子的父母最终不会生活在一起。

离婚率的上升与同居关系的不稳定又导致了单身家庭的增加。1991年，27%的英国家庭是由单个人组成的——是30年前的比例的两倍。

1/3的婚姻趋于解体，作为替代的同居极度不稳定，1/3的孩子的父母不会结婚，超过1/4的家庭由单个人组成——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人们看来似乎是不愿或者不能相互建立一种持续的情感纽带和责任。即便是滕尼斯，恐怕也会因看到这些统计数字而大吃一惊。

在家庭纽带趋于衰弱的同时，由犯罪的威胁所导致的不安全感也增加了。在1981—1992年间的英国，申报给警方的犯罪事件总数几乎翻一番，达到550万件；同期的暴力案件增加了一倍以上^①（在美国，虽然总犯罪率较低，但暴力犯罪比英国还要普遍）。成为犯罪受害者的经历在今天变得很常见。1991年的英国犯罪调查发现，每年中9%的车主有过汽车被盗

^① CSO, *Social Trends*, 1994.

的经历。诺曼·丹尼斯（Norman Dennis）和乔治·厄多斯（George Erdos）通过计算得出，成为今天的犯罪受害者的人数是一战前同类人数的 47 倍。^①

犯罪率的异乎寻常的增加反映在人们对犯罪的极度恐惧上。在今天的英国，大约 1/5 的人们说“非常担忧”被偷窃；同一比例的人们表示非常害怕遭受袭击和抢劫，或者汽车被偷窃侵占；1/3 的人们对天黑后在住处附近行走感觉不安全（在 60 岁以上的妇女那里，这一比例是 58%），11% 的人们对夜晚呆在自己家里都感到非常或者相当不安全。在年纪较大的人们当中，6% 的人从不夜里单独出门，因为害怕成为犯罪的受害者。^②

在美国和英国，大多数犯罪是年轻男性犯下的。在 1991 年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在 20 个 14 岁男孩中就有一个被给予警告或者因有罪而被起诉，在 18 岁男孩中，这一数字是 1/10。^③这样水平的犯罪显示出，一个社会中关于文明和社会责任的根本规范正在急剧恶化，就青少年来说尤其如此。这与当代资本主义有什么关系吗？

1980 年代，英国和美国的右翼政府试图推动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营利精神的复兴。1980 年代见证了“雅皮士”（yup-

① N. Dennis 与 G. Erdos, *Families without Fatherhood*, 2nd edn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93)。

② C. Mirrlees - Black 与 N. Maung, *Fear of Crime* (London: Home Office Research & Statistics Department, 1994)。

③ CSO. *Social Trends*, 1994.

资本主义

pie) 文化的出现, 金钱和挥霍居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由于失业增多, 社会福利下降, 社会不平等程度进一步加大。在 1979—1994 年间, 英国的最富有者的实际收入增长了 62%, 而 1/10 的最贫困家庭的同期实际收入下降了 17%。^①

将这种复兴的对获取的强调, 以及贫富之间日益增长的差距, 与这些国家中犯罪的显著增多和社会责任的丧失连接在一起的做法, 似乎真实可信和合乎道理。照社会学的说法是, 所有的注意力和重心都用在了经济成功的目标上, 却忽视了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用的合乎规范的被认可的手段和途径,^② 而排在领取失业救济金的队列中的年轻人, 以一种可预知的方式做出了回应。社会不能单靠市场运行, 甚至一些自由市场主义者现在也开始对撒切尔夫人时期 (Thatcher years) 提出批评, 认为他们太强调个体获取, 却付出了道德凝聚力的丧失的代价。^③ 俄罗斯自 1990 年后的犯罪率的升高证明, 如果资本主义要避免退化成这样一种制度, 其中的个体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择手段, 丝毫不顾及他人的权利和需要, 那么, 就需要建立起一种可靠的道德秩序。

但是, 犯罪率的迅速升高发生在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包括那些由社会民主党派执政、社会不平等程度在 1980 年代

① Department of Employment, *Family Expenditure Survey* (London: HMSO, 1994).

② 参见 R. Merton,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in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57)。

③ 例如, D. Green, *Reinventing Civil Society*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93)。

丝毫不曾增加的国家。而且，早在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之前很久，在失业状况尚属微不足道、福利国家已经很好地建立且不受威胁的时候，英国的犯罪上升的趋势就出现了。那么很显然，问题的根本原因不能归结于 1980 年代的政治状况。

诺曼·丹尼斯和乔治·厄多斯回顾了英国 1860—1990 年间的犯罪率。^① 他们发现，1950 年代中期以前，犯罪率一直稳定在大约或低于 1% 的水平；此后开始急剧升高，达到 1960 年代早期的 2%，1970 年代的 3%，1980 年代的 5%，直到 1990 年代的 7%。换句话说，犯罪率的上升始于撒切尔夫人成为首相之前 20 年或者稍微更早。犯罪率上升的出现时期以及增长的速率，均与前面讨论过的离婚率和私生率的上升大致相当。

依照丹尼斯和厄多斯的看法，这两种趋势存在一种因果关系。我们知道，大多数犯罪都是由年轻男性犯下的；许多罪犯的社会化都不充分，缺乏对社会规范和价值的接受，不懂得正直做人、尊重他人以及遵守法律，这也似乎有理。丹尼斯和厄多斯提供证据说，那些在缺乏父亲的环境下或者父母未曾结婚的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其社会化不充分的可能性要高于在正常家庭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前一种类型的孩子更可能会触犯法律。他们因此推出结论：传统家庭的衰败是犯罪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然而，这一结论的问题在于，英国的犯罪率的显著上升始于 1950 年代晚期，要稍早于离婚率、私生率和同居关系的不

^① Dennis 与 Erdos, *Families*。

资本主义

稳定的上升。如果家庭的变化确实是犯罪率的变化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我们预期两者间应当会有一个 10 年到 15 年的时间滞后。而两种趋势一前一后出现的事实，则表明可能存在某种可以同时解释它们两个的第三种因素。

一个可能的第三种因素，是战后福利国家的出现。英国的普遍国家福利于 1940 年代中期建立起来，大约 10 年后，犯罪率和传统夫妇家庭的衰落开始增多。此外，福利国家于 1960 年代中期得到扩展，犯罪率以及离婚和私生率此后 10 年开始急剧升高。美国自 1960 年代实行“大社会”（Great Society）改革^①后，同样的情形大都出现。

这并不是说，国家福利直接导致了犯罪和家庭破裂，而是说，它有可能促成了这些变化的出现。以单亲家庭为例，在 1960 年代的福利改革为其提供了财政支持之前，单亲家庭并不是大多数妇女的可行选择。1990 年代的福利体系具有同样的财政激励，因而我们可以看到，为了能够得到提供给单亲母亲的各种好处，一些带有一个孩子的夫妇特意保持不结婚。^②一系列的福利权利催生和巩固了在以前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生活方式，30 年前包围着私生的污名今天都已经逝去了。

福利和犯罪之间的关联却不太容易建立。这种关联，如果它存在的话，很可能与各种文化上的变化有关（这些文化上的

^① C. Murray, *The Emerging British Underclass*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90).

^② 实例参见 Murray, *Underclass: The Crisis Deepens*。

变化则与国家福利的扩展相连), 尤其是个人责任和义务的传统伦理的丧失。我们在第五章里将会看到, 英国和美国都出现了一些迹象, 昔日的新教工作伦理逐渐逝去, 取而代之弥漫开来的, 是一种强调即时满足的快乐主义的以及自恋和自我崇拜的新情绪。普遍的国家福利很可能对此负有责任, 因为 50 年来的福利提供已经破坏了个人努力(工作和节俭)与个人报酬(收入和消费)之间的有机关联, 鼓励了不劳而获的倾向。这样, 自 1950 年代晚期以来随着人们的社会责任的日渐淡漠, 现代福利制度在无意中导致了对个人责任的侵蚀。^①

当然, 犯罪和社会责任的丧失有着多重的复杂原因, 福利国家仅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是, 有一点非常清楚, 资本主义以及与之相连的不平等和索取, 不应为此遭受谴责。维多利亚时期见证了英国自由资本主义的高峰, 而 19 世纪后半期的犯罪率却一直在下降。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见证了当今时代最糟糕最长期的衰败, 但是整个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的犯罪率却保持得非常低。只是在资本主义被迫“顺从”于大规模的国家干预之后, 犯罪率开始显著升高。无论犯罪率升高的原因是什么, 很显然,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作不应为此负责。

这就将我们带到滕尼斯的资本主义批评的第三个问题。滕尼斯的批评依赖于如下假设: 资本主义产生了个人主义文化,

^① 有关犯罪与个人责任文化的丧失之间关系的分析, 参见 J. Wilson, “Incivility and Crime” in E. Banfield (ed), *Civility and Citizenship*,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92)。

资本主义

在这种文化中，对他人的关注从属于利己的算计。然而，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既可以是个人主义的，又可以是团体主义的，而并不必然产生其中的某一种。

存在一种“普遍的、有力的和持久的”信条，认为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是天然相关的，尽管二者分别在不同的时间出现。^① 现代个人主义源起于 13 世纪的基督教忏悔室，在那里，个人为自己的罪过而向神父忏悔。接着通过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强调对独特个体的写实描绘——，同时也通过行为的礼节仪式，而获得发展。罗马法的传统强调个体的权利和义务，个人主义由此得到强化。最终在英国哲学家诸如霍布斯（Hobbes）和洛克（Locke）——洛克强调个体权利，从而对既存社会秩序构成了极大挑战——的作品中，个人主义的概念得以完善。

因此，当工业资本主义出现于 18 世纪的英国时，个人主义的思想与实践早已存在。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形塑了个人主义的文化，但是阿伯克龙比（Abercrombie）与他的合著者坚持认为，二者只是在历史的这一时点上偶然地同时存在。他们还指出，在世界其他地方，甚至连个人主义与早期资本主义的这一短暂关联也不存在。比如日本，资本主义从一种强大的集体主义儒家文化中发展出来，直到今天，日本的资本主义仍然保持着强烈的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文化。

^① N. Abercrombie, S. Hill 与 B. Turner, *Sovereign Individuals of Capitalism* (London: Allen & Unwin, 1986), p. 1。

不过，甚至在 19 世纪的英国，日常生活中也大量存在着集体主义的价值和行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承担了很多慈善团体和慈善事业的义务，这一慈善事业受到对那些不幸的人们负有“社会责任”的价值的激励。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人阶层同样踊跃地从事一些集体活动，发展出友好的团体以及为了集体目标而成立的其他组织。只是在政府开始承担责任“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的时候，中产阶级和教会的慈善工作才趋于衰落，工人阶级的志愿和合作的文化才开始枯萎。^①

因此，我们无需再从日本那里找来集体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经济共存并处的证据。它发生在 19 世纪英国的自由资本主义高峰期，但它并不是在国家的层次上出现，而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中间机构”，例如教堂和小礼拜堂、邻里、车间等，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团伙”（little platoons）^② 之所以这种文化已经消失，是因为政府的行动剥夺了这些小团伙的作为和作用。19 世纪的英国资本主义市场体制引致了有效的集体主义，20 世纪的福利国家所体现的现代“公民权利”的扩展却破坏

① Green, *Reinventing Civil Society*.

② 这一用语系由 Edmund Burke 首创，但是被 Murray 在 *In Pursuit of Happiness* 中采用。又参见 P. Berger 与 R. Neuhaus, *To Empower People*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77)。

资本主义

了它。^①

自信与自我实现

最后一组被我们视为人类幸福的必要条件的需要，是自信心和实现个体特殊才能和潜力的能力。我们已经知道，在马克思看来，这两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都无法实现，因为当工人的劳力被作为商品任意使用和买卖时，他们无法获得自信心；而当绝大多数工人都不过是他们被迫操作的机器的附属物时，自我实现的机会同样不会存在。

对于马克思的这一似乎强有力的资本主义批评，一个显而易见的回应是，借助于新技术的发展，工作组织自马克思的时代以来已有显著改变。可以分两点来讲。

首先，19世纪工业的大多枯燥无味、机械重复的特征现今已经消失，至少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如此，因此过去的情形相比，甚至现在的体力劳动都给予被雇佣者更多的操控力和判断力。在他的关于异化劳动的著名研究中，罗伯特·布劳纳^②（Robert Blauner）发现，无力、孤立和自我疏离的感觉很

① 我已经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见 P. Saunders, "Citizenship in a Liberal Society" in B. Turner (ed), *Citizenship and Social Theory* (London: Sage, 1993)。有趣的是，Abercrombie, Hill 与 Turner 在指出是“为争取公民权利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导致了现代形式的个人主义的时候，得出了类似的结论（*Sovereign Individuals*, p. 154）。

② R. Blauner, *Alienation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大程度上与机械和生产装配线有关，而在更为现代的自动化产业中，工人可以行使自己的判断力，对于自己的任务负有相当的职责。而且，自布劳纳写出他的作品后，新的“后福特式”的生产体系鼓励工厂的劳动力使用拥有更多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这就增加了工人展示其自主权和积极性的机会。^①

其次，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厂劳动都趋于衰落。在 20 世纪，工业雇佣逐渐为服务业的增长所取代，体力劳动也逐渐为非体力职业所取代。在英国，一战后初期，制造业雇佣了大约 2/3 的劳动力；至 1993 年，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 1/5。^② 再加上各个领域的体力劳动的衰落（至 1993 年，英国工人总数降至原来的 40%），所有这些变化说明，在马克思作品中占据了中心位置的工厂无产阶级，在今天的成熟资本主义经济中，只是劳动力总数的一小部分。

当然，许多服务部门的工作，与它们所取代的老的工厂工作相比，并不能为被雇者提供更多的发挥其主动性的机会——作为伍尔沃斯（Woolworths，澳洲一家零售商——译注）的售货员或者麦当劳的汉堡包师，其生活的千篇一律和单调乏味，几乎不亚于老式纺织厂中的半熟练的机械操作工。主要的改变发生在有关管理、行政、专业和特殊技术的职业雇佣中，这些

① 例如，参见 S. Clegg, *Modern Organisations* (London: Sage, 1990)。

② *Department of Employment and Productivity, British Labour Statistics Historical Abstract 1886—1968* (London: HMSO, 1971); CSO, *Social Trends*, 1994。在美国，制造业雇佣人数所占比例从 1970 年的 27% 下降到 1990 年的 17% (OECD, *Labour Force Statistics* (Paris: OECD), 1992)。

资本主义

职业要求相对较高程度的教育和培训，并为个人在相对自主和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中自行控制工作进程和发挥其才能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但是，对于职业体系中那些依然处于相对琐碎枯燥和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的职位中的人们，情况又如何呢？他们的工作经验会不会对他们的正面自信心和达致自我实现的能力构成妨碍呢？

真正的自我价值感依赖于他人对我们所作所为的承认。^①作为真实的满足的一个源泉，必须获得一种对自身的高度尊重；它不是一项“权利”，只需去维护，或者可以给予一个人而与他的行动无关。这就促使默里将“自信”（self-esteem）与“自尊”（self-respect）做了区分，前者只是一种个人感受，与其行为无关，后者则是一个人对自我的行动负责并以此赢得他人认可（因为他人认为这个人的行动值得尊重）的一个结果。为了获得自尊，你必须做些什么以赢得它。

依照默里的观点，跟那些坐拥高位的人一样，那些做着低下工作的人也完全可能获得自尊，因为自尊依赖于行为而非技能、教育或收入。默里的论点得到民族志证据的支持，一项对英国传统无产者团体生活的研究^②证明，男人对自己的“养家糊口的人”角色有着强烈的自豪感，妇女则因自己的“主妇”和母亲角色而享有同样的感觉。这些群体中的男性自尊的

① Murray, *In Pursuit of Happiness*.

② 例如，参见 J. Klein, *Samples from English Culture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5)。

获得和保持，是通过战胜逆境不幸、增加自己的影响力、自力更生、供养孩子、避免令自己的工作伙伴失望等等，它与通常是低下的和不体面的工作的内容几乎或者完全无关。妇女的情形也一样，自尊的赢得是通过保持家庭清洁、教育孩子衣着整齐和言谈得体、保持家计收支相抵避免出现断炊等等。这样的家庭，会被邻居视为、因而也自视为值得尊重的工人阶级。他们会拿自己对照城镇上的那些“粗俗”家庭，在那里，男人无法保持一份城镇工作，孩子缺乏照顾和肮脏不堪，家庭生活总是充满暴力，面临艰辛和困境时只知道托靠他人和借酒浇愁。

由此可知，阶级层级的存在并不会破坏处于下层的人们的自尊。^① 根本来讲，对自尊产生影响的，是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他们干什么工作赖以为生。这就意味着，任何人，无论其在职业体系中居于什么位置，都有可能过一种值得他人尊重的生活（例如作为一个好父母，或者成为一个好邻居）。

不过，在意识到这一点后，我们还需要接受另外一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职业地位是人们社会身份的一个主要因素，被普遍视作个人成功和“社会荣誉”的标志。作为一个好父母或者好邻居，固然可能获得自尊，但是在职业体系中的成功才是个体价值的最显明的标志。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个人，是否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善自身处境，从而赢得职业上的成功和自尊？

^① 相反的观点，参见 R. Sennett 与 J. Cobb, *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资本主义

原则上讲，资本主义是一种通过开放性的竞争来分配报酬的体系。但是在过去，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在与社会上层的人们展开的这种竞争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二战前，英国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很少有在过了 14 岁后还在学校读书的，念到大学的就更罕见了；虽然聪明和有动力的孩子在离开学校后能够而且也的确在“尽力向上发展”，但是真正能够获得重要的和有声望的职位的人相对来说还是很少。竞争是不公正的，天平是倾斜的。

许多社会学家相信，这种情形迄今并没有发生变化。与中产阶级背景的孩子相比，较低阶层背景的孩子还是很少有机会获得中产阶级职位。这种机会不足通常被视为延续至今的阶级藩篱阻碍了下层民众的证据。

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流动频率都非常高，但是在所有的情况下，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孩子都要比工人阶级出身的强。在约翰·歌德索普（John Goldthorpe）^①所做的一项重要研究中，他将英国人口划分成七个阶层，结果发现，这一阶层结构的上下流动要比通常所认为的频繁得多。工人阶级背景的女子的向上流动广泛存在，因为在第Ⅰ层级中，只有 1/4 的人是出身于同一层级，另有 29% 则分别来自于第Ⅵ和第Ⅶ层级。同样，虽然有 57% 的工人阶级出身的人仍然处于同一阶层，但是有 27% 进入了中等阶层，另外的 16% 则成为上等阶

^① J. Goldthorpe 与 C. Llewellyn 和 C. Payne,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 2nd ed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7)。

层（第Ⅰ和第Ⅱ层级）。歌德索普还发现，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孩子的成功并非仅仅是靠其家庭背景。在 59% 的上层阶级出身的人保持了其地位的同时，26% 的上层阶级出身者降至中等阶层，另有 15% 的上层阶级出身者则沦落为体力劳动阶级。根据这些发现，我们很难不得出结论：英国看来是相对开放的社会。

不过，歌德索普却对此保持怀疑，因为他强调说，来自不同背景的孩子，其获得成功的相对机会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他指出，与出身上层阶级的孩子相比，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孩子跻身上层的机会只有前者的 $\frac{1}{4}$ 到 $\frac{1}{3}$ 。他还论证说，这个三或四比一的“不一致率”与上几代人相比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在一个真正开放的社会里，人们的初属阶级与终属阶级之间不应出现统计相关（不一致率为一比一），歌德索普由此得出结论：在英国社会中，阶级体系依然阻碍着工人阶级中的有才能者的发展。

但是，只有在我们接受了如下的假定的条件下，这一结论才能成立，那就是，每一代人的不同社会阶级的成员之间不存在天资上的差异。歌德索普的观点有赖于才能和努力在各个阶级之间均匀分配的假设，但是这却不符合一个精英社会——在那里，征募完全开放，只根据成就选拔——的实际情况。这是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中，那些占据高位的最有才能的人，相应地较可能培养出相对“聪明”的孩子；而那些才能较低的人们，占据着职业层级中的较低位置，所带出的孩子平均而言才干稍逊。这样的话，三或四比一的“不一致率”，如歌德索普

资本主义

所发现的那样，并没有什么异常之处。

我曾撰文^①指出，如果顾及到各阶级间的父母的能力差异的话，由歌德索普所报告的英国代际社会流动模式，几乎就是我们所能推测的理想的精英统治条件下的状况。得出这一推断，意义深远。那种长期存在的社会学观点，认为争夺中产阶级职位的竞争对于工人阶级子女极度不公，必须遭受明确的质疑，因为似乎可以看出个人才能与努力工作之间到底是何关系。如果真是如此，就没有根据再做如下的争论：资本主义阻碍了具有足够才能的人们获取其应得的角色和职位，这些角色和职位能为个人带来自信和自尊，无论其先前出身如何。

但是，资本主义职业体系的确会影响到人类幸福的地方，却在于它使个人意识到并发展出其作为人的全部潜能的能力。

默里指出，通过工作获得自我实现，是所从事的任务与个人的技能和天资之间复杂作用的结果。太缺乏刺激令人生厌，太多刺激却又导致压力。因此，要最大程度地自我实现，就必须令所从事的任务的复杂性与个人的能力尽量匹配。从超出个人能力的职责中，无从获取乐趣，就正如从事简单容易的工作无法获得满足一样。

在欣然接受这种分析逻辑的时候，我们应当清楚地意识到，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一些工作的存在，因为有些工作是如此的平淡乏味，很难指望它能为甚至那些才智较低者提供刺

^① P. Saunders, "Could Britain be a Meritocracy?", *Sociology*, vol. 29, forthcoming, 1995.

激性挑战。显而易见，从这类工作中所能寻到的有意义的创造性实在是太少了，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缺乏激励动机，以通过组织劳动过程提高其创造性。

罗伯特·莱恩（Robert Lane）对这一问题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他意识到，资本主义市场体制擅长于满足人们作为消费者的需要，但是在他看来，更能促进人的自我实现的是工作而不是消费。正是在这里，资本主义存在一个问题，因为它必然将消费者的需要置于工作者的需要之前，“消费者……至上，工作者只是他们的臣民。”^①

当然，充实工作内容（work enrichment）的现象的确在发生；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借助于新技术的应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许多最为卑下最不体面的工作已经消失。但是，莱恩指出，相反的过程同时也在发生。随着新技术的应用，一些工作逐渐变得“去技能化”（deskilled），在以前，这些工作是需要手工、创造性和心力集中的。而且，充实工作内容的现象的出现，也不过是采用新技术以及提高效率、降低单位成本的工作实践的一个偶然的副产品。一旦工作满意度与有效的工作实践发生冲突，必然是为了后者而牺牲前者。正如莱恩所解释的：

市场，是有效组织商品和劳务的生产的卓越设置；它们被设计出来不是为了促进人类的发展，它们

^① Lane, *The Market Experience*, p. 235.

资本主义

也没有特殊的机制做到这一点。它们既不会因代理者（公司）从事了促进人类发展的事业而予以嘉奖，也不会因个人发展了自己而给予鼓励。^①

莱恩认为，有偿工作对于促进自我实现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被系统地低估了，人类幸福因此而遭受损害。我们对此没有异议。对于这一批评，惟一能够提供的辩护性回应是，人们能够而且也的确正在越来越多地从有偿工作之外寻求自我实现；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通过减少有偿劳动的时间和扩充可供选择的活动的范围，也在越来越多地提供这种可能性。

从这一点来看，资本主义这架成功的增长机器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后果。第一，它缩减了人们的有偿劳动时间，这不仅是通过逐渐减少工作周的长度和扩展休假权利，而且通过推迟大量年轻人最初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例如，1/3 的英国青年在 18 岁后继续接受高等教育），以及通过支持因个人选择、疾病或者其他因素所导致的提前退休。第二，它为个人提供了强有力的生产工具，这些工具早先只是集中在正式的工作场所比如工厂或者办公室。洗衣机、冰箱、真空吸尘器、剪草机、食物搅拌器、动力钻、家庭电脑、锁线装订机以及其它耐用消费品的广泛拥有，使得今天的一个一般家庭比一百年前的一般工

^① Lane, *The Market Experience*, p. 154.

厂所能支配的功效还要多。^①

这类物品并不仅仅被动地在家里消费，还可以被家庭成员用来生产出更多的物品和服务。^②甚至连录像机这样显然的被动工具，都可以被家庭成员用来作为“影院服务”，在一个可控的环境中放映他们想看的影片。所有这些家庭科技的传播，被格尔舒尼（Gershuny）称作是创造了一个新的“自我服务”（self-service）经济，发生于其中的生产性和创造性的工作甚至与外面的正式工作场所一样多。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负担得起分享家庭生产的酬劳的费用，尽管所需的大多数技术都还相对便宜，各个收入群体和社会阶层都负担得起大多数耐用消费品。我们同时也不能忘记，人们自己在家里做的有些工作同样枯燥无味和不值得做，正如外头工厂或者办公室的情形那样，尽管有许多工作都是被自愿做的，且无论男女都能从中获得创造性和满足感。在其针对英国南部一个工人阶级地区所做的关于家庭自我供给（domestic self-provisioning）的一项开创性的研究中，雷·帕尔（Ray Pahl）得出如下结论，虽然有些工作是人们迫不得已勉强做的，因为囊中羞涩，难以外购所需；但是大部分工作的完成，则是因为它们“提供了审美的满足、做工自豪感以及家庭团结感”。^③

① H. Stretton, *Urban Planning in Rich and Poor Countr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② J. Gershuny, *After Industrial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1978).

③ R. Pahl, *Divisions of Labou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4), p. 105.

资本主义

所有这些都说明，莱恩的将有偿工作视作自我实现的主要源泉的做法，也许是一种误导。的确，工人常常无法在其工作中充分施展其才能，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他们因而也无法从他们的生活的其他方面——这些方面兴许对他们更重要——获得有效的自我实现。正如休·斯特雷顿（Hugh Stretton）所指出的，现代资本主义也许没有克服在有偿劳动内获得自我实现的问题，但是它为通过其他途径达到同一结果提供了可能性：“彻底革新的家计部门正好摆脱了马克思所抨击的异化和剥削。”^①

假定资本主义增长机器继续保持增长，我们可以预言，在许多人们的生活中，有偿工作的中心性地位将继续减弱，通过其他形式的工作获得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将相对地逐渐增加。如果这些的确发生，那么可以想象，资本主义将能够克服实现人类幸福所必需的最后一个是最难处理的一个前提条件。曾被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作为梦想提出来的那些长期存在的许诺——安全、友爱、尊严、个人满足以及物质匮乏之痛的解除——也许将在21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得以实现。

^① Stretton, *Urban Planning*, p. 54.

第五章 资本主义的未来

人们常常说，资本主义体系缺乏计划。然而，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这一体系包含了被转移的计划，因为资本主义企业雇佣了一大批会计师、财政顾问、市场分析师、销售主管、战略规划师、制度分析师以及人力资源主管，以便帮助企业计划经营中的每一个环节。不过，他们的问题是，他们身处其中做出计划的市场环境天然地不可预测。企业必须为了招徕消费者而竞争，但是消费者的未来购买决策是无从知晓的，企业永远也无法肯定他们能否在适当的时候生产出适当数量的适当产品。随着新产品的推出、时尚的改变、人们收入的增减，消费者的需求模式相应发生变化；而新技术的发明则迅速令现有的生产线显得陈旧过时。正如我们在第一章看到的，这种为了占据市场份额而展开的残酷竞争，正是资本主义的动力所在，因为它令所有的企业保持警觉，但它同时也构成了对公司股东和雇员的风险。

正是这种市场的极度不稳定性，促使卡尔·马克思发出如

资本主义

下预言：资本主义必将走向自我毁灭。马克思辨识了市场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危机倾向”，但其主要观点在于，竞争必然导致技术创新速度的日益加快，进而将较小的企业淘汰出局，而且随着人力逐渐被机器取代，整个经济的利润率将降低。随着生产日益集中于少数大公司手中，大多数民众将沦为无所依存的庞大无产阶级。在将来的某一时候，无产阶级必将起来推翻残存的资产阶级，消灭原有的生产方式。整个人类将第一次拥有和控制赖以谋生的生产资料，历史将因此走向终结。

历史的终结？

当然，马克思的重大预言并没有应验，而且看来以后也不会。他的预言——资本主义将通过一系列竞争性的接管和买断而变得集中——倒是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因为跨越所有各大洲组织起来的巨型公司已经出现于我们今天的世界上；但是新公司却并非不能起来挑战这些庞然大物，企业的所有权也并没有局限在少数人手中。

许多今天最为成功的企业都是于那些巨型企业之后建立起来的新企业。于 1970 年代成立了微软公司（Microsoft）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现在是美国最富有的人；英国最为富有的 500 人中，接近 3/4 的人的财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打拼获得的，许多是通过制造业获得的。^① 而且，今天的资本所有权前

^① The Sunday Times, *Britain's Richest 500* (London: The Sunday Times, 1994).

所未有地分散分布，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储蓄或者投资于保险公司、抚恤基金以及其他金融机构，这些机构则将他们的月度报偿投资于股权和其他形式的资产，并将投资利润反馈回他们。远非“失去的只是锁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多数民众现今在盈利的资本主义企业中拥有巨大投资。

资本主义终将毁灭的夸张式预言，在今天已经失去了市场；人们也不会再去设想一个“人民大众”起来夺取生产方式控制权的场景。然而，几乎与马克思一百年前的预言一样，资本主义经济的确经历了从繁荣沦于衰退、又终于步履蹒跚地返回的波折。由于缺乏总体的生产计划机制，市场机制只有通过周期性的衰退来中止已经变得过时或者缺乏竞争的活动，并在一个新领域中重新配置劳动和资本。政府多年来一直试图对此有所作为，但是除非实行整个体制的国有化（这一战略在东欧遭受了引人注目的失败），他们除了设计实施福利体系以做修补之外，实在没有什么能做的了。

战后的凯恩斯主义（Keynesian）式的调整——政府竭力通过刺激或者抑制消费者需求来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由于无法应对史无前例的高通胀率与高失业率并存的困境，于1970年代不光彩地趋于衰落。计划贸易、管理汇率或者操纵利率的企图，同样地与强大的市场力量相冲突，因而迟早要被市场击溃。1970年代以后，大多数政府逐渐意识到，他们的经济已经融入了一个全球体系，对于这一体系，他们无从有效地施加

资本主义

影响或控制——尽管这仍然没能阻止他们这样做。^①

与此同时，针对已经确立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的威胁出现了。远东国家的迅速经济增长，对美国和欧盟造成了一个主要问题，因为这些国家在为西方产品提供了新的市场的同时，其廉价的劳动成本对美国和欧洲的劳动力构成了极大的压力，并诱使西方资本投向那里而不是投向国内。1960年代以来，来自日本的竞争击退了英国工业的各个领域，包括摩托车、电视机甚至汽车，整个西欧和北美的制造业趋于急剧衰落。随着中国和亚洲较小国家作为主要的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出现，这样的问题将大量涌现。

东欧社会主义的衰落导致了类似问题，且距离欧美更为近旁。这不仅引发了几个前苏联共和国以及南斯拉夫等地区的政治不稳定，而且出现了大片新的低薪市场经济区域，既有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面临更多的竞争。东欧的变革还产生了向西方移民的潮流的威胁，因为人们寻求分享西方国家的繁荣，比如德国，德国正力图弥补统一所带来的代价，它的问题已经波及其它欧盟经济。随着政府预算压力的加大以及寻找工作的竞争的加剧，所有这些不稳定又刺激了整个欧洲种族主义的复兴。资本主义不会趋于衰落，但是它在西方正面临极度的紧张。

这些威胁和紧张是资本主义确立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的

^① 一个例子是，欧盟为了保护其农业和工业，抵制来自第三世界的便宜产品的竞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同时面对世界货币市场，实行了固定汇率。

结果。无论是来自亚洲的竞争，还是东欧社会主义的衰落所引发的问题，都对西方中心资本主义国家的战后繁荣和稳定构成了威胁，但是它们都是资本主义最终胜利确立其无可替代的全球体系的产物。资本主义今天所面临的困难，不是其迫在眉睫的衰落的前兆，如同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而是它的最终胜利所导致的问题。

1989年，就在柏林墙的倒塌之前几个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处的一名规划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对于许多人来说，这篇文章似乎抓住了资本主义扩展全球这一主要变化的意义。大胆地揭去了马克思的黑格尔式的外衣，福山宣称我们现在面临着历史的终结：

我们所见证的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或者战后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的过去，而且是历史的终结：就是说，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以及作为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普遍化。^①

他论证说，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都处于以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代表的极权主义思潮的

^① F.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p. 4. 又见他的这些思想的进一步发展：F.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London: Penguin, 1992)。

资本主义

威胁之下。作为一战前的西方思想特征的自由主义信仰，在这一期间遭受侵蚀，因为知识分子预言说，或者是自由资本主义即将为世界社会主义所取代，或者是出现一种全球性的“集中”，工业主义的逻辑将导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都趋于某种包含了普遍的国家控制和对经济及社会生活的管制的状态。只是到了 20 世纪的尾声，西方自由主义始才重获了自信，因为迄至 1989 年，所有可能的替代制度都趋向于衰亡。

伴随 1945 年柏林的被占领以及投向日本的原子弹的爆炸声响，法西斯主义势力烟消云散；而共产主义理想的力量则是直到晚近，随着中国对马克思主义作为其主导思想的放弃以及苏联的突然解体，才被摧毁。福山承认，自由主义的理想在世界许多地方尚未实现（例如中国，继续处于极端不自由的政权控制之下），但是他的论文主旨只在于，不会再有某种替代性的自称代表了一种不同的和“更高”形式的社会组织的意识形态出现了。他相信，至 1989 年，世界已经到达了这一终结点。我们已经走到了历史的终结，因为显而易见，不会再有什么东西能够挑战或者替代自由主义理想了。

惟一可能的未来挑战，福山认为，来自宗教原教旨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的复兴。但是，两者都无法构成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根本威胁，因为伊斯兰世界的神权政体在穆斯林国家之外并没有广泛诉求，而新的民族主义运动只将其目标限定在从其他种族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并不寻求开创新型的政治和经济组织。福山承认，冲突将继续发生，尤其是在仍然“受困于历史”的国家与已经到达历史的终点的国家之间（海湾战争是个好例

子)，但是他预言的是主要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些意识形态在过去曾将世界抛入冲突斗争。随着历史的终结，人们将更加关注于经济而不是政治，更加关注于技术问题的解决而不是英雄梦想的实现。他警告说，随着历史的终结，人们将迎来“多世纪的厌倦”。^①

要对福山的观点做出评价，首先需要牢记，对于未来可能会怎么的任何大胆想象，我们都应当抱持必要的谨慎小心。困扰着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的哲学难题，同样适用于福山的理论，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仅从当前的趋势推断未来是危险的，当前趋势有可能急剧翻转，完全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正如马克斯·韦伯所理解的——福山似乎忘记了这一点——社会生活总是伴随着终极价值的冲突斗争，所谓掌管了人类的想象并赋予人类行为终极意义的“诸神之争”。^② 因此，如果政治在将来退化成一系列技术安排，或者竟然没有新的意识形态出现以对抗自由市场体系的软弱的形式理性化，那将是令人惊讶的。事实上，我们在第三章里看到，已有迹象表明，社会主义理想的破灭所留下的真空已经被作为人民党诉求的深绿意识形态所填充，因为，环境毁灭的显见威胁可被利用来为社会和经济的重大改造做辩护，在这一新的安排中，自由主义的闪烁光芒将迅速被清除。

①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p. 18.

② M. Weber, "Politics as a Vocation" in H. Gerth 与 C. Wright Mills (eds), *From Max Webe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48)。

资本主义

所以，对于历史已经终结的宣称，我们应当抱持一种怀疑态度。我们还应当谨防福山的理论所证明的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的假定，因为这与美国之外以更多的官僚化或者法团化为特征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相抵牾。福山提到西方自由主义理想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胜利，但是许多最为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并非是基于自由原则组织起来的，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政治之间也并没有必然联系。^① 而且，如我们在后面将看到的，即便在核心资本主义国家，自由主义理想是否通过重获自信而实现了新生，也并不是能够轻易肯定的事。

福山的假定中隐含着一种令人担忧的种族中心主义倾向。他认为，资本主义的胜利代表了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资本主义的胜利。自由市场的理论家已经从福山的论文中看出了辩护的意味，他认为，19 世纪的自由主义理想将在全球范围内得以恢复。但是，几乎不存在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因为资本主义的胜利并不必然代表自由市场的胜利。福山没有意识到，从 20 世纪的意识形态动荡中生存下来的资本主义并不止一种，这是他的作品根本缺陷。

^① 资本主义既可以在自由主义政体也可以在极权主义政体中发展繁荣，虽然一个自由经济也许是一个自由政治的条件。见 M.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福山犯了与马克思同样的错误，假定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与它的“政治上层建筑”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有关这一论题的一个进一步分析，见 B. Jessop,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the Best Possible Political Shell?” in G. Littlejohn (ed), *Power and the State* (London: Croom Helm, 1978)。

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

随着社会主义的威胁的消失，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现在受到另外一种资本主义模式的挑战，对于这一模式，美国曾在二战后给予扶持。阿尔贝尔（Albert）将这一选择模式的资本主义称为“莱茵模式”，因为它主要与德国、瑞士和荷兰等国家相连，尽管这一模式的因素也可以从斯堪的纳维亚，尤其是日本，发现出来。与之对照，他将另一种模式称为“新美洲”模式，这一模式基于美国，但在某种程度上也见之于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盎格鲁—撒克逊国家。^①

在第四章里，我们已经看到这两种不同的资本主义体制的分歧之处，美国主要强调个人成功、竞争和短期财政收益，而德、日等国则着重于集体成功、合作和长期收益。不过，这并非它们之间的仅有的差异。阿尔贝尔举例予以说明，莱茵模式更强调培训，它的公司主要依赖于向银行借贷，它们与银行有着紧密的和长期的关系；而新美国模式中的公司则更倾向于依靠从股票市场筹集的资本。新美国模式的收入分配存在更多的不平等，国家福利不是非常发达，虽然在这后一指标上，日本更接近于美国，而英国更接近于德国。

在哪一种模式更为成功的问题上，阿尔贝尔没有迟疑：“在最后的大约 10 年，莱茵模式……显示出自己是两者中的更

^① M. Albert, *Capitalism against Capitalism* (London Whurr Publishers, 1993).

资本主义

有效者，也是更公正者。”^①他指出，美国资本主义拥有巨大的竞争优势，包括过去遗留下来的大量资本投资、丰富的原料和能源储藏、对世界上许多最聪明的人们的吸引力、基于作为商业和大众文化的世界语言的英语的文化盟主权以及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美元——这允许美国政府印发出 5 000 亿美元，无需兑换即在境外流通。然而，尽管有这些优势，整体而言，美国的表现要差一些。

跟英国的情形一样，美国的制造业趋于衰落，很多新的工作岗位都是在低薪的服务行业。美国的制造业产出现已被日本赶超。至 1990 年底，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政府预算赤字超过 30 000 亿美元（相当于政府 3 年的总收入）。在社会方面，美国城市充斥着无家可归、吸毒和犯罪，而婴儿死亡率是日本的两倍高。从文化上看，学校制度长期存在危机，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是，美国儿童的科学知识得分是所有工业国家儿童中最低的，一半以上的美国成年人无法在世界地图上指出英国、法国或者日本的正确位置，成年文盲率高于波兰。根据阿尔贝尔的观点，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了“一个家庭失序和贫困扩散、日益碎片化和缺乏同情心的社会”。^②

在阿尔贝尔看来，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个人主义文化。他相信，从长期看，这将导致社会失衡。曾经，宗教道德

^① M. Albert, *Capitalism against Capitalism* (London Whurr Publishers, 1993)., pp. 18 - 19.

^② 同上书, p. 53.

和对神圣宪法的普遍信奉，产生了强有力的社会一致，如今这一民族基础逐渐遭受侵蚀；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自私和对投机牟利的追逐。我们在第四章里已经看到，资本主义无法维持一个人人幸福的健康社会，除非它基于某一坚固的道德基础之上。阿尔贝尔认为，新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是已经不再有这一基础了，荣誉和信任已经消失，整个系统退化到了自私和腐化之中。美国工业资本家自己攫取的收入是他们付给雇员的平均收入的 110 倍，而在德国，这一数字是 23 倍，在日本是 17 倍。

美国人不再节俭。1980 年，美国的储蓄额占 GDP 的 19%；10 年后，下降至 13%。与此对比，德国的同期储蓄额从占 GDP 的 22% 上升至 26%，日本则从 31% 上升至 35%。如同英国，美国变成了充斥着信用卡消费者和短期投机者的国家。新的美国英雄是诸如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一位美国房地产商——译注）和伊凡·博斯基（Ivan Boesky，一位美国投机商——译注），他们用数以百万计的美元投入后保债券（一种利润高风险大的公司债券——译注）交易，然后买断价值低估的公司以剥夺其资产。以往的努力工作和长期投资的中产阶级伦理已经消失了。

在莱茵模式的国家里，银行向公司提供长期贷款，以便后者能够投资于也许无法立即获得利润的新产品。与此不同，新美国模式依赖于从股票市场所获得的要求短期收益回报的资金。结果是，由于担心被人联合起来接管，公司不得不为股东提供一定量的股息，长期计划因此而被抛弃。拥有绝大多数主

资本主义

要的英国和美国公司的多数股权的巨型金融机构，能够通过改变其投资份额，对被它们遗弃的公司造成破坏性后果。由此产生一种变动不居、充满不确定性的气候，对好的商业活动构成不利影响。阿尔贝尔总结道：“金融专制威胁着自由企业精神。”^①

在莱茵模式的资本主义中，个人自利行为受到强大的集体责任和舆论的影响。阿尔贝尔坚持认为，这一体系仍然是基于自由交易，不过法律的运作和政府的活动确保了更大的稳定性和经济合作。例如在德国，恶意出价收购根本不存在，1/3 的公司只发行“记名股票”，不经公司同意，不得出售或者转让。是联邦银行所维护的强通货，而非被接管的持久威胁，保持了德国工业的高效率。德国制造业仍能占到 GDP 的 30%，而美国的这一比例是 20%。

莱茵模式非常重视培训。日本大公司的终生雇用制度，意味着公司愿意出资培训其雇员，而并不担心他们会跑到对手的公司去。在德国，大约一半的学校毕业生进入学徒期，与之相比，英国只有 14%。日本公司还为其雇员提供各个方面的福利，而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Sozialmarktwirtschaft）是以政府所提供的一套稳固的社会保障制度为支撑的，福利服务的资金筹措主要是通过直接税收、好的城市交通以及稳固的国家教育体系。在任由市场去决定价格和工资的同时，德国政府负起敦促

^① M. Albert, *Capitalism against Capitalism* (London Whurr Publishers, 1993)., p. 79.

雇主尊重雇员参与和关注其工作条件的责任，通过对垄断的管制、减免小公司的税款、为较贫困区域提供帮助，它寻求保持一个“平坦的运动场”。^①

虽然日本在休假权和工作时间方面与西方相比尚显不足，但德国是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作时间最短和工资最高的。与日本一样，德国的工会与雇主（以及与消费者组织）在协同管理团队中共同合作，形成了强烈的共同归属感和公司忠诚。社会不平等程度远远低于新美国模式国家，在消灭贫困和社会剥夺方面，德国要比美国成功得多。

莱茵模式做得比新美国模式好，阿尔贝尔令我们对此深信不疑。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意识到，处于优势地位的是新美国模式。因为有迹象显示，在德国、日本及其他一些国家，公司结构正在变化，公共福利承受着重压，股票市场基金日益获得信赖，银行在金融投资方面的传统角色因此遭到挑战。之所以出现这些变化，一个原因在于，伴随新的通讯技术的采用和新的金融手段——例如，未来货币市场——的发明，出现了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在阿尔贝尔看来，金融的全球化使得华尔街和伦敦拥有了渗透和破坏莱茵模式的工具。

不过，莱茵模式遭受威胁，还有至少另外两个原因，这反映了这一模式天然的弱点。一个原因是经济的，另一个是文化的。

^① 许多这些政策都扩展到了整个欧盟，只有英国继续抵制它们（例如，通过退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社会条款”）。

资本主义

经济因素在于，莱茵模式是一个高成本的资本主义体系，它发现自己很难与亚洲及其他地方的新型低成本资本主义国家展开竞争。在一个日益强调自由贸易的世界上，有效的莱茵模式国家，比如德国，越来越难以支付其高昂的工资和昂贵的完全非赢利的社会供给，而亚洲新型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削弱前者而赢得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在一个传统穷国开始参与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世界里，莱茵模式资本主义似乎愈来愈易于遭受攻击，除非退而建立更高的关税壁垒。

第二个因素有助于解释，何以明显缺乏效率的新美国模式竟然得以取胜，那就是它的对个体差异和自由的文化宽容。在指出莱茵模式似乎有些缺乏魅力和激情的时候，阿尔贝尔做出这一暗示。“莱茵河资本主义，”他承认，“受到形象问题的损害：它似乎过时了，它无法点燃梦想和激情，它了无情趣。”^①他将这归因于好莱坞和美国媒体的文化霸权，后者已经成功地将美国资本主义的炫目光环推向整个世界。他相信，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的广泛吸引力不过是基于其“明星效应”，它只有风格而缺乏实质。但新美国模式的广受欢迎不仅仅依赖于媒体形象。

阿尔贝尔自己意识到，与德、日等国相比，美、英等国更为开放、更能容忍个体差异。他举出移民的例子，与莱茵模式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英国和美国在历史上更愿意接受移民，更乐意赋予新来者以公民权。移入英美的人们尽管常常受到不

^① Aibert, *Capitalism against Capitalism*, p. 204.

好的对待，但是他们的公民身份不会被拒绝。而在德国，即便说土耳其语的客籍工人已经移居多年，国籍法也拒绝给予基本的公民权利。英美的市政当局不会被赋予法定权利，去强行干预异教徒的居所。而在德国，新近移民往往被禁止在少数高级种族聚居区附近居住。甚至在今天，英美的移民规定也相对宽松自由，而在莱茵模式国家里，比如瑞士，外来移民根本不可能被容许在这里定居。

阿尔贝尔同意，莱茵模式开放性差，刚性强，因而更倾向于抵制而非顺应其他文化。例如，德国和日本的异族通婚远远不及英美普遍。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一个事实，莱茵模式资本主义建基于根本上保守的国家文化，注重集体一致远甚于个体差异。这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效率，却不利于自由文化的形成。

移民和国籍法的差异只是两种体制的文化分歧的诸多表现之一。例如，在英国，身份证的采用遭到了自由主义者的强烈抵触；而在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这根本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无论何时搬迁，那里的成年人都有义务向警方注册登记自己的地址。和平时期的征兵是莱茵模式中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特征，但是在那些更接近于新美国模式的国家里，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显然并不存在这一制度。在德国、比荷卢经济联盟（Benelux，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的经济联盟，1948年作为一个关税联盟建立——译注）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所有年轻男性都必须服某一种兵役；在瑞士，每一位成年男性必须履行逐年登记的军事义务直至55岁，同时还要加入当地步枪俱乐部以保持其射击技能。而在新美国文化里，

资本主义

这些要求均遭到文化抵制，在这种文化里，个人主义价值受到保护，政治权威与公民社会的明确区分受到持久关注。

看来，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的“无组织”特征，在导致了经济无效率的同时，却有助于避免社会服从和社会一统的倾向，而后者正是许多莱茵模式国家的特征。正如迪尔凯姆所指出的，现代社会需要在违背常规的“社会失范”和因社会规则和公共目标约束过甚而导致的“宿命论”之间取道而行。^①如果说新美国模式拐入了两条反常道路中的第一条的话，那么莱茵模式则是太过于偏向第二条了。

例如，在日本，公司的家长制作风——它创造了终生雇用的安全模式——表达和强化了社会服从，这在西方人看来令人惊讶。服从从学校里就得到培育，在那里，“填鸭式制度”以自我表现的牺牲为代价，强调死记硬背式的学习；进入工作场所，服从被进一步强化。日本公司都有自己的颂歌，期待着雇员牢记在心；自己组织运动会和社交俱乐部，期待着雇员去参与。他们都有自己的道德规范，强调“对工作的热情，精力充沛地投入，健康的友情，认真思考，爱国精神，诚实正直，生活清洁，积极向上”，^②所有这些规范通过公司杂志和周末共同出游得到提升。这种文化非常适合于生产出努力工作、忠诚和服从的劳动力，但却无法培育出自由思考的个体。日本可以

① E. Durkheim,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Toronto: Macmillan, 1993).

② R. Dore, *British Factory, Japanese Factory* (London: George Allen Unwin, 1973), p. 209.

成功地将便宜可靠的索尼随身听推向全世界，但是在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方面可就没那么成功了，在创造性领域——例如，新的电脑软件的生产——展开的与其他国家比如美国的竞争中，日本只能勉力支撑。

川德幕府时代遗留下来的封建武士义务的痕迹，至今仍可在现代日本公司文化中见到。在这个社会里，个体不被信任，雇员被期待将公司的利益放在自己家庭利益之前；直到近来，日语中没有表达“隐私”（privacy）的词汇，同样缺乏的词汇还有“利己”（selfishness）和“孤独”（loneliness）。正如（Ron Dore）所指出的，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根本没有发展西方自由理想——精神独立的个体，自己判断如何行动是最好的、应当遵循何种道德规范——的空间：“嵌入组织的个人无需做出道德选择；组织的标准和规范已经指明了路线；组织约束使其保持德行。”^①

欧洲的莱茵模式资本主义文化似乎同样排斥个体独立和个体差异。在瑞典，政府于1930年代所做出的为所有公民提供经济安全的承诺，已经成为一个试图通过服从达到统一和团结的更为广泛的计划的组成部分。那些行为举止偏离了官方标准（例如饮酒超过据认为对其身体有益的量）的人们，受到国家机构的严密监控，这些机构有权“处置”他们，即便他们并没有违法。犯罪行为更多地被视为一种异常“疾病”，而不是个

^① R. Dore, *British Factory, Japanese Factory* (London: George Allen Unwin, 1973), p. 215.

资本主义

人运用其自由意志独立做出道德选择的结果。直到近来，有关居住、教育、工作、福利等的政策全都着意于促进一种同一的文化，这可以从“为民掌舵”（folkshelm）的理想中表现出来，其间的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一种归属感，但没有人被允许与众不同。同一种文化为我们带来了有效的沃尔沃汽车工厂，制造出极度安全的沃尔沃汽车，但同时也带来了对于侵入个人生活各个方面的集体干预的认同——在英国或者美国，这样的干预是无可容忍的。^①

在另外一个莱茵模式国家，瑞士，秩序保持得更为严厉。一如日本和瑞典，政府明确无误地利用学校向其公民灌输它认为合适的规范和价值，然后这些标准又被异乎寻常地强化，一旦需要的话就借助于法律。有七个州做出规定，没有结婚的同居者违法。瑞士法律规定，粗心大意的父母可被剥夺对孩子的监护权，而且一并被剥夺法庭追索权。而且，遵从不仅仅被警方和移民机构所维护，而且也为居民自己所坚持，这是一个自我管制的社会，集体道德标准通过大量非正式监督得以强化。正如伯尔尼青年权力机构（Bern Youth Authority）的一个官员所言：“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比瑞士）的规定更多，更不容异说。伯尔尼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乡村警察，苏黎世的情形甚至更糟。”^②

① 这类“干涉”的例子，参见 R. Huntford, *The New Totalitarians* (London: Allen lane, 1971)。

② 引自 R. Segalman 与 D. Marsland, *Cradle to Grave* (Basing - stoke: Macmillan, 1989), p. 92。

因而，莱茵资本主义在许多地方都获得了经济成功，因为它接人和强化了相对强调遵从的国家文化。计划的或管制的资本主义在产生出加尔文或者黑格尔的社会中一片繁荣，但是它却总试图踏入培育出了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和滚石乐队（Rolling Stone）的文化领地。

我们在第四章看到，资本主义并不必然与个人主义相连，但是在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里，个人主义价值的确比在德国和日本得到多得多的维护。对于今天的要求更高程度的可预测性和遵从的大公司来说，这势必构成一个问题，因为个人主义精神在许多方面都与现代法团资本主义的要求相冲突。^①但是对于个人来说，这些文化的奇特的吸引力并不难理解，而且，新美国资本主义的激发民众热情的能力也并非——正如阿尔贝尔力图使我们相信的那样——都能够为好莱坞的神话制造工业所解释。

后工业资本主义与后现代文化

然而，有迹象表明，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国家的个人责任和自力更生的文化正面临威胁。在他的对新美国模式资本主义的批评中，阿尔贝尔的重要观察之一是，在以往支撑着这一模式资本主义的传统价值正逐渐趋于消失。强调个人权利和自

^① 参见 N. Abernombie, S. Hill 与 B. Turner, *Sovereign Individuals of Capitalism* (London: Allen Unwin, 1986)。

资本主义

由的力量仍然强大，但是对个人主动性和社会责任的相应强调则逐渐被毁坏。每一个人都知道他的权利，但是很少有人接受其应有的义务。阿尔贝尔将这一变化归因于宗教的衰落，但是原因也许要复杂深奥得多。

最早意识到这一趋势的社会学家之一是约瑟夫·熊彼特 (Joseph Schumpeter)。早在 1943 年，他就指出，作为两项至关重要的发展的一个结果，美国的资产阶级文化已经处于衰败的终端。第一个发展是，随着大公司的成长，资本主义所有权已经变得非个人化。“所有权实质的蒸发”侵蚀了独立企业主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不再能够激发道义责任的缺乏个性的管理主义：“非物质化、非职能化和所有权的缺失无法引发和唤醒道德忠诚，而这正是所有权的关键形式所能做到的，最终，将不会再有人真正在意和支持它。”^①

第二项发展是，资本主义最先释放出来用以反抗封建秩序的理性批判精神，现在转而将其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自身。资本主义促进了一个知识社会的成长，创造了一个新的智识阶级，这一阶级并不直接负责实际事务，但是却对批评现有秩序和挑战其道德规范基础报以极大热情。对于这一阶级而言，不存在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任何事物都在批评之列。宗教被攻击为陈旧不堪，资产阶级家庭被视为邪恶放荡，雄心、竞争、节俭和个人努力被嘲笑为愚蠢而徒劳。资本主义就这样制造出

^① J.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George Allen Unwin, 1943), p. 142.

一个意见领袖阶级，他们不再信奉或者认可辛勤工作、个人努力、家庭责任以及基督般慈善等传统资产阶级价值观念。这一阶级的影响，致命而深刻，不仅影响到大众，而且波及资产阶级自身，因为甚至连资产阶级都对自己的信条丧失了信心。因此，熊彼特认为，大公司的发展侵蚀了资本主义所有权的正统性；与此同时，一个新的阶级正起而挑战它的道德权威。这一分析具有非凡的先见之明，二战后高等教育的扩展和服务业中产阶级的增加，显著地扩大了这一新阶级的影响；它的对资产阶级价值观念的日益增多的批评，影响也日渐至深。

由尼采（Nietzsche）和索列尔（Sorel，索列尔·乔治斯，1847—1922，法国政治哲学家。——译注）的作品所引发的 20 世纪的“厌恶理性”，使得许多公共事务知识分子遗弃了对理性和进步的信仰。^① 认知相对主义（否认存在区分真理和谬误的客观基础）迅速产生出道德相对主义信仰，正确与错误的绝对评价遭到抨击，任何断言某种道德标准优越于其他标准的企图都被视为可疑。其结果是，以往为中产阶级和“可敬”的工人阶级共同分享的道德一致被破坏殆尽。复兴这种道德一致的尝试，包括玛格丽特·撒切尔于 1980 年代所发出的回归“维多利亚价值”的呼吁、约翰·梅杰（John Major，英国前首相——译注）于 1990 年代所推行的“回到基础”政策、丹·奎尔（Dan Quayle，布什执政时期的副总统——译注）对美国肥皂剧

^① N. Dennis, *Rising Crime and the Dismembered Family*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93)

资本主义

所表现的那种“松懈的道德标准”的抨击，遭到今天的公共事务知识分子的激愤批评，他们否认存在确定不移的道德，声称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的权力，无论这一生活方式是否有生命力或者将产生何种长远社会后果。今天，一切都过去了，只剩下吹毛求疵受到责难。

就这样，对多样性保持宽容的自由传统，退化成了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诊断的那种基于非理性的和不受限制的个人主义精神基础之上的自我满足文化。^① 清教徒般的视工作为天职的精神消失了，中产阶级和“可敬”的工人阶级共有的传统节制在主流知识分子文化中寻找不到支持，这种文化强调即时满足、自恋式的对快乐的追逐以及个人欲望的满足。大众消费，为信用卡的爆炸式激增所刺激，抛弃了旧式的“仁慈道德”（goodness morality）——幸福和个人报偿与工作和精神美德相连，转而追求一种“娱乐道德”（fun morality）——在其中，任何即时满足的失败都成为焦虑的自省和求助于心理分析医师的原因。不再存在某种能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提供合法性的广为接受的道德价值，以往支撑着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个人主义精神，现在起着反面的破坏作用。工作被视为不合时宜的令人讨厌的对满足的障碍，而不再是自我实现的方式；对个人美德的关注被蔑视为陈旧或者自以为是。

如今，我们将过去被视为反常和违法的行为视为正常和合

^① D. 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London: Heinemann, 1976).

法，而将过去正常和合法的行为加以侮辱和怀疑。^① 15岁以后还保持童贞变成了令人窘迫的事，信仰上帝和认可基督徒的生活方式被视为离奇古怪，保持对伴侣的性忠诚被视为眼光短浅和心胸狭窄，低薪工作被唾弃为缺乏尊严，社会安全欺诈被接受为合法，结婚被认为过时，留在家里照顾孩子的传统“家庭主妇”被视作同情对象，以往的“低层阶级”价值观现在被认为可接受和平常，老的资产阶级伦理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被社会学家所称的“后现代”文化^② 迅速打翻在地。

在后现代时代，我们无法确信自己的道德判断的正确性，因而只好避免评判他人。甚至政府也变得在道德上相对，在提供福利的时候不再要求接受者履行某种义务或者假定他们对自己的状况负有责任。有关道德义务的语言已经很少被使用了。如今，只有不同生活方式的选择，每一种都有同等的正当性，道德规范成了个人的品味，因为不再有某种“元叙事”（meta-narratives，指的是支撑西方文明的普遍真理与客观真理的合法性——译注）的存在，藉以对各种世界观和生活方式做出判断。一切都必须被容忍，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没有人是错的；一旦某种无法承受的生活方式被选择并造成了个人不幸和痛苦，应当受到谴责的是“社会”而不是个人。自由主义遗产遭

① Gimmelfarb, *The Demoralization of Society* (New York: Knopps, 1995).

② 例如，参见 J.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S. Lash and J. Urry, *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7)。

资本主义

到扭曲，被人掠夺来作为废黜道德的特许证。^①

熊彼特和贝尔都相信，他们正在见证资产阶级时代的终结。正如其他的社会—经济制度一样，资本主义需要一种共享的道德框架，在这一框架里，资本主义才能运行；它需要受到激励的个体按照特定的方式去行动；它需要某种象征体系，借以将市场交易所带来的不平等状况视为正当；它需要一套核心价值，藉以通过相互义务和社会责任将人们联结在一起。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比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相信这样的道德能够保护一个社会中个人的强大和自由，因为他无法相信，受到良好教育的理性的人们竟然不会懂得，个人自由如何有赖于对他人的尊重、个体自利如何需要所有人对社会义务和责任的认可。^② 今天，在相对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洪流中，密尔的信仰立场被揭批为乌托邦，他的功利主义道德规范被一扫而光。

所有这些都未否认，通过诉诸一套绝对的道德价值观，当代资本主义仍然能够得到防护和被证明为正当。面对英美等国日益破碎败坏的道德，新保守派知识分子近来付出巨大努

① 自由主义有一个核心的两难问题，那就是，由于无法抑制过分的行为，容忍将最终导致自身的毁灭——参见 S. Mendus, *Toleration and the Limits of Liberalism*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9)。

② “道德，保护了每一个人免受他人伤害，无论是直接的保护，还是通过对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的约束；道德既包括一个人主要在内心拥有的那些，又包括他通过言语或者行动表现出来的那些。” (J. S. Mill, “Utilitarianism” in J. Gray (ed.), *John Stuart Mill on Liberty and Other Essay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96)。

力，致力于证明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能够与犹太教和基督教共有的（Judaean - Christian）伦理兼容并存，以及牟利动机并非仅是对他人需要的漠视。^① 但是，这些出版物的真正意义，却在于这些作者现在感觉到有必要澄清这些争论，因为这本身就显示了“常识”智慧在多大程度上已经逝去。在我们的后现代文化中，为那些希望重申以往的道德规范的人们留下了空间，正如也为那些试图探索出新道德（或者，干脆认为无需什么哲学伦理规范）的人们留下了空间一样。资本主义当然能够在知识分子的道德争论中得以护卫，但是，真正有意义之处却在于，这场争论确实发生了，没有哪种见解主张能够再拥有特权。

在后现代时代，面对人们的如下追问，父母、教师和政治家无法给予（即便他们愿意）明确的回答：为什么应当牺牲现有所得、为未来的职业接受训练？为什么应当约束自己、直到20岁以后才养育孩子？为什么应当尊重他人的财富而不能占为己有？为什么应当接受公民责任而不能只要求福利权利？为什么应当尊重权威或者认可既有行为规则而不能无拘无束独断独行？为什么应当自力更生、视成就为骄傲、接受义务、履行责任？

^① 例如，参见 M. Novak, *The Spirit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 (New York: Simon&Schuster, 1982)，或者文章 in J. Davies (ed.), *God and the Marketplace*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93)。有趣的是，像 Norman Dennis 和 Chelly Halsey 这样的自称“伦理社会主义者”，与这些作者一样，都对公共道德的侵蚀予以关注。——参见 N. Dennis and G. Erdos *Families without Fatherhood*, 2nd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93)。

资本主义

然而，如果不能为这些问题提供清晰、权威和明确的答案，西方自由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就成了问题。如果说，在“终结历史”的时刻，所有的替代性社会影像已经倒塌瓦解，世界的其他部分正忙于发展和扩展自己的资本主义事业，西方的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反而因文化衰竭而退化，那么这不啻是个讽刺。衰落的征兆就在眼前，政府或者任何其他人却似乎难有作为。看来，福山是错了，我们今天正在见证的，与其说是自由主义现代性的重拾自信，毋宁说是崇奉社会进步和个人启蒙的历史性的自由主义价值的丧失，尽管，它曾经促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接着又战胜了所有的替代制度。

译者后记

本书译校完毕，已是午夜时分。举目窗外，灯影稀疏，不禁轻轻舒一口气：“早晨从中午开始”的日子，可以结束了。

本书乃对资本主义的评述之作。篇幅短小，言简意赅，具体内容，无需赘言。间有言涉中国者，兴许不妥，敬请明辨。

有机缘接受此项翻译任务，实有赖于荣飞兄前后奔忙穿插。编辑同志的时时催迫，保证了译文的如期完成。诸多友好，时有记问，不胜感念。

翻译本非易事，译者亦非适于书斋中者，学识浅陋，固不待言。失当之处，恳祈指正。

张浩

2004年12月3日于北京大学

封面	页
书名	页
版权	页
前言	
目录	
正文	